通天译丛 | 熊越 主编



有组织犯罪

关于政府的真情实话

The Organized Crime

The Unvarnished Truth About Government

[美]托马斯·J. 迪洛伦佐 著

山维 熊越 等译

熊越 董子云 校



有组织犯罪

关于政府未加修饰的真相

Organized Crime

The Unvarnished Truth About Government

[美] 托马斯·J. 迪洛伦佐 著

山 雏 熊 越 等译

熊 越 董子云 校



感　谢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目　录

丛书总序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拥趸。近年来，相关的译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便是明证。

在民国时期，中国已有奥地利学派的译著。比如在1938年，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在之后的“黑暗时代”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也打着批判的旗号零星地出版过一些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如《自然价值》、《资本实证论》等书。但总的说来，数量极少。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邓正来、冯克利、姚中秋等陆续翻译了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系列著作，如《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等书，为奥地利学派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冯兴元和2008年姚中秋、张旭昆分别主编了“奥地利学派译丛”，又进一步打开了局面。这两套丛书中的《货币的非国家化》、《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权利与市场》、《货币生产的伦理》等书都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著作。世纪文库则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和《人的行动》这两本堪称奥地利学派基石的经典。此外，还有《米塞斯评传》、《银行的秘密》、《货币、银行信贷与商业周期》、《终结美联储》、《欧元的悲剧》也相继出版。

还有一系列即将出版的著作。比如，朱海就翻译的《动态效率理论》，董子云、李松等翻译的巨著《人、经济与国家》，李杨、王敬敬等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此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也将推出一个奥地利学派译丛，包括《资本家与企业家》、《资本及其结构》等作品。

在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之外，我们又有了门格尔、罗斯巴德、科兹纳、德索托、拉赫曼、许尔斯曼、彼得·克莱因、汤姆·伍兹、亨利·黑兹利特、荣·保罗、马克·斯库森、瓦特·布拉克、罗伯特·墨菲、菲利普·巴格斯。我相信，接下去一定还会有菲特、哈特、霍普、加里森、萨雷诺等人的作品在中国问世。放眼望去，前景大好。

然而，还有一些很有翻译价值的文献，因为篇幅过于简短或是内容过于小众等原因无法得到出版商的青睐。但在我的眼里，它们都意义非凡。如果这些书最终仅仅因为商业因素而无缘与中文读者见面，不免令人遗憾。所幸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选择——电子出版。借助网络的力量，这些文献可以以电子书的形式绕过一切障碍，直达奥派同道。这套书就是为这些难以通过传统渠道出版的著作而生的。

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实体书出版而有所懈怠。相反，我们会坚持自己的质量标准。

奥地利学派的衰落是 20 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为此各国的人民都付出了惨痛的教训。我们愿意为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添砖加瓦，这样我们或许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 21 世纪。感谢米塞斯研究院

慷慨提供版权，感谢各位译者的辛勤付出。

熊越

上海松江

2014.1.23

序言 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

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如果得益于学术经济学家们的影响，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比它原本的水平降低了几个百分点，由于自由贸易的财富增加效应，这些经济学家的工资就已经物超所值了。到此为止，弗里德曼都是正确的，但在他做出这一评论的时代，经济学界的“主流”却大多在通过罗织种种“市场失灵”的传说和建议无穷无尽的政府干预，支持寄生福利国家/监管国家的财富毁灭效应。

多年以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为中心的市场失灵理论家，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他们炮制出各种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就算没有彻底脱离经济现实，通常来说也离经济现实相去甚远。事实上，一个可以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现实性理论，在过去（和现在）常常被视为缺乏想象力和不够学术。据说只有无法理解和看上去平凡的数学处理才配得上“经济科学”。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一直饱受物理学嫉妒之苦，他们试图用模型去处理无法模型化的人的行动，以便让自己的“科学”看起来更像物理学和更科学。

市场失灵理论家的第二个特征，是坚持应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的“涅槃谬误”（the nirvana fallacy）。游戏的玩法如下：首先，构建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完全的信息、同质的产品和价格、免费或无成本地进入和退出行业以及“多家”公司，以此来排除掉所有真实世界的竞争。其次，比较真实世界的市场和这个乌托邦的涅槃状态，并谴责市场是“不完美的”或“失灵的”。

市场失灵理论的第三个特征，是由完美的政府（已假定它不会失灵并且能纠正市场的失灵）来进行干预。

在经济学领域，有两种思想学派从不同意这种国家主义伪装是合理的：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至少是其“弗吉尼亚学派”分支——运用经济学家对激励的理解来研究政府及其全部附属物（选民、官僚、政客、利益团体等）的行为。对简单假设政府能正确感知市场的缺点的人来说，以此方式来理解政府究竟如何运作能治愈他的愚蠢。

奥地利学派从未同意过愚蠢的涅槃谬误“经济建模”法，其原因一目了然——它在智识上不诚实。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因为市场参与者（和任何人一样）只拥有不“完全”的信息，而谴责市场“不完美”，而是会探讨市场参与者运用对他们可用的信

息并获取新信息的方式。主题始终是理解经济世界如何运作，而不是像市场失灵理论家那样，为政府干预提供看似“学术”的辩护。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研究政府如何运转，并且不会简单假设它作为市场失灵的纠正者，是某种仁慈而全能的机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官僚主义》一书，或者穆瑞·N. 罗斯巴德关于政府在整个历史中的阴谋诡计的诸多著作都是例子。在奥地利学派的文献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

笔者把本书视为一本遵循**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文集——一本关于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现实研究的文集。“主流”经济学家们满足于建立一个又一个难以（或者不能）解释真实世界的数学模型，和他们不同，笔者的重点一直恰恰相反——运用经济理解来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世界如何运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实现这个任务不可或缺。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强制与监管”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监管的方方面面；“政治与窃贼”当然是关于政府的本性的；“集权对自由”讨论了集权主义者们为了尽可能不受公众的影响，对垄断和集中政治权力永无休止的追求；“货币与国家”介绍了中央银行的种种罪恶，它在美国一直被其最初的支持者当做腐败的发动机；“工人与工会”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各种神话和迷信，这些神话和迷信常常蒙蔽了公众对劳动市场真相的思考；而“关于市场的真相与谎

言”概括了一些主要的市场失灵神话，这些神话有的长期以来一直被不正当地用于提出经济干预主义的目标，有的则是一些较新的神话。

托马斯 • J. 迪洛伦佐

2012 年 5 月

第一部分 强制与监管

第一章 价格控制四千年

通常来说，需求和供给可以在能源市场自由发挥作用，所以汽油的价格会时起时落。每当汽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个产业就必然会受到国会价格控制的威胁——美其名曰“反价格欺诈法案”或其它同义词。

反对价格控制——不管政客们怎么称呼它——的理由已经为人所知几百年了。通过人为刺激需求，并去除供给的部分或全部利润，价格控制必然会造成短缺。它们还会诱使供应商尽可能地偷工减料，并常常导致政府实施荒诞的限量供应方案，而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然而，反对价格控制的理由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学教材上的学术探讨。价格控制接二连三地造成灾难，已有四千年的历史记录。罗伯特·薛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和伊蒙·巴特勒（Eamon Butler）于 1979 年首次出版的《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一书漂亮地记录了这段价格控制的历史。

两位作者开篇引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作者让-菲利普·列维（Jean-Philippe Levy）所说的话，指出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的埃及，“国家”在谷物生产和销售的监管上“真是无处不在”。“各种级别的法令规定了一切价格”。这种“控制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检查员队伍非常庞大”。埃及农民对价格控制的监督非常愤怒，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农场。到了该世纪末期，“埃及的经济崩溃了，也政治也不再稳定”。

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价格控制的规则。国家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农场劳工，此人应每年给这个劳工 8 古尔（gur）玉米”。“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放牧人，此人应每年给这个放牧人 6 古尔玉米”，以及“如果一个人租用了一艘载重 60 吨的船只，此人应为此每天支付六分之一谢克尔（shekel）银币的租金”，等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像这样的法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抑制帝国的经济发展”。而一旦废除了这些法律，“人民的命运就大大好转了”。

古希腊也对粮食实施了价格控制，并建立了“一只检查粮食的队伍，目的是把粮食价格设定在雅典政府认为公正的水平。”希腊的价格控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粮食短缺，但古代企业家通过黑市绕开了这些不公正的法律，让数千人免于饥饿。尽管**规避希腊的价格**

控制法会被实施死刑，但这些法律“几乎不可能执行”。希腊的价格控制法所造成的短缺创造了黑市的机会，使公众大大受益。

公元 284 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是把大量货币注入流通，造成了通货膨胀，接着又“规定了出售牛肉、谷粮、鸡蛋、服装及其他物品的最高价格，他还规定，用更高价格出售自己货物的人会被处以死刑”。薛廷格和巴特勒引用了一位古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解释，结果是“人们不再向市场供应必需品，因为它们得不到合理的价格，这大大加剧了粮食的短缺，最终许多人因此丧命，这条法律也被弃之不用。”

到了更靠近现代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一些殖民政府所实施的食品价格控制几乎让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饿死。宾夕法尼亚州特别对“那些军需商品”施加的价格控制，让军队需要的几乎每样商品都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大陆会议在 1778 年 6 月 4 号明智地采纳了一项反价格控制的决议，该决议写到：

> 鉴于经验已经告知我们，对商品价格的限制不但与其初衷背道而驰，还产生了许多恶果——我们决议，应建议各州废除或暂停一切有条款限制、监管或控制价格的法律。

薛廷格和巴特勒也写道，“这项政策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到 1778 年秋，军队的补给就相当不错了。”

法国的政客们在大革命之后重蹈覆辙，在 1793 年颁布了“最高价格法”（Law of the Maximum），这条法律首先对谷物，接着对一长串其他物品，实施了价格控制。可想而知，“在一些【法国】城镇，许多人食不果腹，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而饿倒在街上”。几个省的代表团写信给位于巴黎的政府，宣称在新价格控制法实施之前，“我们的市场一直有供给，但就在我们规定了小麦和黑麦的价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谷物了。市场上只剩下其他不受最高价格法监管的品种。”在这部灾难性的价格控制法害死了数千人之后，法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它。后来，在罗伯斯庇尔被押往刑场的途中，他穿过巴黎街道，人群纷纷喊道，“肮脏的最高价格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美国的中央计划者在经济政策上的极权主义思维显然和纳粹如出一辙。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期间，美国的计划者们相当欣赏纳粹的经济控制（包括价格控制），所以它们在战后都被保留了下来。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都在教导美国战地记者亨利·泰勒，这样的政策是愚蠢之举！薛廷格和巴特勒在书中重述了戈林的话：

> 我们发现，你们美国在经济领域上所做的很多事情，都给我们造成过很大的麻烦。你们想控制人们的工资和物价，控制人们的工作。如果你这样做就必须控制人们的生活。没有国家能做到只控制一部分。我试过，但是失败了。也没有国家

> 可能一直控制下去。这我也试过，同样失败了。你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好的计划者。我觉得你们的经济学家应该看看在这里发生过的事。

在 1948 年的一个星期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占领军当局无法制止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他最终结束了德国的价格控制。这酝酿出了“德国经济奇迹”，当然，这并不是奇迹，只是通过让市场而非政客来设定价格，回归了常识。

价格控制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加州发生能源危机的原因。四千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独裁者、国王、专制君主和政客都认为价格控制是对公众最终极的“不劳而获”的承诺。而四千多年来，结果也一直是相同的：短缺、产品质量降低、由罪犯经营的黑市横行、贿赂、国家产能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创造出大规模的价格控制官僚机构和警察国家，以及权力危险地集中到价格控制者手中。

第二章 另一场战争

笔者以前有位 MBA 学生曾是市区一家大医院的急诊科主任，他有一次说道，他和同事们大约 90%的时间都花在治疗贩毒团伙成员的刀伤和枪伤上。在准备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曾在战争时期担任外科医生，他说这让他受益匪浅。在所有的类似医院里，这种伤害都以巨大的代价占据着主要地位。美国各个城市里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是政府禁毒战争的直接结果，如果“战争”结束，这些暴力也将结束。

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震惊。在一个自由而合法的市场里，企业之间或买卖双方之间的任何争端，都可通过协商或法院——如果需要的话——来解决。如果一个商人相信他受到了欺骗，他可以寻求由法院来保护他的财产。当然，他也可以不再和不可信的商人做生意，并敦促他认识的其他所有人也这样做。

在政府让某些产品或服务非法之后，这种相对文明的解决方案就不复存在了。一个毒贩不可能找到法官并对他说：“法官大人，我送了一吨可卡因给这位史密斯先生，但他拒绝全额付款。我希望你能强迫他履行合同中的义务。”相反，毒贩——和禁酒令时代里的酒贩一样——只能采用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强制执行他的商业协议：暴力。

然而，这里还有一种更为不祥的动态过程在起作用。一旦暴力成

为非法市场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这些市场中赚取的巨额利润将吸引那些在暴力和残忍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社会群体前来竞争。最暴力的群体将上位。

各个贩毒团伙之间只是生意伙伴关系，但是，不同于合法市场的正常生意伙伴关系，在以暴力手段消灭竞争对手这件事情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在合法市场里，只能通过生产比各个竞争对手更好和/或更便宜的产品才能“消灭”它们。在非法市场里，竞争对手往往只是被人谋杀。借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人们用谋杀来创建入行的“准入门槛”。

在这种谋杀和残害中，警方经常是“沉默的同伙”，因为已有的毒枭可以轻易地贿赂警察，成为“线人”并向警察通报任何新入行的人。这样，通过逮捕他们的竞争对手，警方就为他们做了脏活。

在合法市场里，一个由多年的优秀表现和/或低廉价格建立起来的品牌是一笔能带来利润的宝贵资产。在非法市场里，品牌是通过格外野蛮的暴力行动建立起来的。贩毒团伙恐吓对手的能力是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唯一算数的“品牌”。

可以说更糟糕的是，这种暴力行为还存在规模经济。如果一个贩毒团伙在洛杉矶特别臭名昭著，这一事实将使它更容易进入并主导在芝加哥、纽约、迈阿密等城市的非法毒品市场。

在非法毒品市场里使用暴力创造出非凡的垄断利润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儿童入行。他们充当了警察的“眼线”，或者帮贩毒团伙把

毒品送给客户的“跑腿小弟”。在大多数州，对于和毒品有关的罪行，18 岁以下的孩子通常会被判缓刑，并且在一些州，刑期无法延长至超过 17 岁。参与非法毒品交易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这些孩子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批最为冷酷和暴力的犯罪分子。

终结毒品战争会让美国各个城市的暴力出现引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降低。与毒品战争有关的医疗费用也会直线下降，医院将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其他各类医疗服务上，鉴于婴儿潮一代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将使用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这在现在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好处。唯一的输家将是由毒品战争提供资金的各种政府官僚机构，当然还有毒枭自己。

第三章 谁来监管监管者

对政府来说，失败就是成功。我把这叫做迪洛伦佐政府第一定律。如果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未能降低贫困率，他们反而会被赋予更多的税金和权责作为“奖励”。如果政府运营的学校没有把孩子教好，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拨款，拥有更大的权力去干预教育。如果美国宇航局的航天飞机爆炸了，政府反而会奖励他们更多的财政预算（而私人航空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破产）。2007 年美联储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他们的职权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二定律是，政客们的糟糕政策所导致的问题，他们自己很少甚至从不负责。在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政客更不负责任。除了个别例外，总体而言，他们总是把我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对现状更准确的描述是经济法西斯主义或者裙带主义）。此举无异于采用越来越多的中央计划，故意摧毁我们仅剩的经济增长引擎。即使这些监管都被冠以可笑的“公共利益”之名，其实是不负责任之极。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三定则是，除了个别例外，政客们都习惯撒谎。所谓的“看门狗媒体”其实更应该被叫做“哈巴狗媒体”。这是因为指出政客们的谎言往往会终结一个记者职业生涯。如果你这样做，你的消息源会跟你一刀两断。

政府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金融市场未受监管，而且急需政府更大规模的中央计划。人们指控自由放任导致了最近的“大衰退”。美联储的官僚们游说要求建立一个据说能够补救这个问题的巨型监管机构。这些都是谎言，因为根据一本美联储自己的出版物（《联邦储备体系：目的与职责》），美联储已经对这些活动（**部分**名单）具有管理和监管的权力：银行控股公司、州许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的外国分支、协议公司、州内授权的支行、外国银行的代理、外国银行的非金融行为、国有银行、储蓄银行、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下属机构、储蓄机构控股公司、银行的金融报告流程、会计标准、紧急情况下的商业“连续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银行的证券交易、银行的信息技术、国外投资、银行跨境借贷、分支银行制度、银行并购、谁可以拥有一家银行、资本“充足标准”、用于购买证券的信贷、平等机会贷款、按揭信息披露、准备金率要求、电汇转账， 银行间负债、社区再投资法令（次级贷款）的需求、所有国际银行业务，面向消费者的租赁、消费者金融信息隐私、活期存款的支付、“公平信用”报告、会员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诚实借贷和储蓄实情。

除此以外，美联储也利用“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合法的利率限价并制造通货膨胀和繁荣-萧条周期。同时，金融市场也受到证券管理委员会、通货监理官、储蓄机构管理局和其他数十个州政府管理机构的严密监管。这就是华盛顿特区对金融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四定律是，只有在能够借此增加国家机器的力量、财富和影响力的时候，政客们才会听从自己那帮学术顾问的建议，哪怕他们知道这些建议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这些学者乐于参与这个腐败游戏，因为这也增加了他们的名声和财富。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已经有海量的经济学文献记录了最近一个世纪政府为促进“公共利益”进行监管所导致的种种失败，但在“大衰退”发生之后，却鲜有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或社论作者谈及这些文献。

在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经济活动的某种政府监管。而借1877年最高法院对穆恩诉伊利诺伊案（*Munn v. Illinois*）的判决，联邦政府权力才出现第一次明显扩张。穆恩兄弟俩拥有一家谷物储藏公司，而伊利诺伊州强势的农业游说集团想要通过立法规定谷物储藏最高价格的方式来窃取他们的财产。这样的限价法令曾因违反美国宪法中的合同条款而被判违宪。可是最终这些一心想要劫掠的农民赢得了这场官司。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将此称颂为“公共利益”

的胜利。由此见得，第一个主要的“公共利益法规”就毫无疑问是一次法令性劫掠。它牺牲了公众的福祉来使很小的利益集团获利。普通民众本可以从自由市场中获益更多。

国家主义学者在谈论政府监管的时候唱着“公共利益”的高调，还制造了诸如市场总是“失败”，需要明智善意的政府监管来保护公共利益的谬论。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腐败（或者两者皆有）。尽管他们身边有层出不穷的证据证明监管总是为了保护特殊利益（事实上所有政府行为都是如此），很多学者仍然坚持这种论调。

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雷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在他 1963 年的《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vativism*）一书中所写，二十世纪的大企业之所以谋求政府监管，是因为“行业领导者始终能够控制监管，并将其引导到他们想要的方向。”总体而言，政府监管反而促进了那些他们想要监管的人的利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监管的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

做政府顾问意味着声望、职位和金钱，受此诱惑，大部分学术经济学家无视如上所述的现实，在一战前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五十年间创造了各种各样空洞无物的“市场失灵”理论。当时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是弗朗西斯·巴托尔（Francis Bator）写的《剖析市场失

灵》（*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这一整类文献都曾经是（现在也是）以这样的欺骗性技巧为基础：对比真实世界的市场和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论概念（完全竞争），然后指责真实世界“不完美”，同时假设政府监管及相关政治行为能够完美地“纠正”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将这样的闹剧称为“涅槃谬误”。将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与一个理想化的“涅槃”相比较，永远会使人相信市场并不完美。只是市场失灵理论家们从不用同样的理想化标准衡量政府干预。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从一开始就不参与这场滑稽剧的经济学派。

值得赞扬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后来也和奥地利学派学者们一起揭露了许多市场失灵/监管永远有益的谬误，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期刊论文和专著，并重新发现了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 1971 年总结的古老真理：“毫无例外，监管总是由利益集团发起，并且设计运行为之牟利”。

这类研究逐年进展，证明了大企业总是支持并游说要求繁琐的政府“安全”和环保监管，因为他们明白执行这些监管代价不菲，很可能让较小的竞争者破产，并让其他有意进入市场的竞争者望而却步。企业们早就发现，长期维持一个卡特尔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政府来强加一个卡特尔协议。相反，私人执行的卡特尔协议总是会因为成员的作弊行为而失败。比如，联邦州际贸易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监管就使得铁路和卡车运输业卡特尔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州际贸易委员会为铁路和卡车运输业设定了垄断价格，并禁止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限制了价格竞争，导致了民航业的卡特尔，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监管逐渐解除，事态才有所好转。二十世纪初期，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着手监管，创造出垄断专营权，结束了此前美国电力行业一直存在的激烈竞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享受了数十年政府认可的垄断。

在这个政府认可的垄断越来越成为常规的历史时期，设立美联储也是为了方便创造银行业的卡特尔。在《美国货币与银行史》（*A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中，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写到：

> 这个国家的金融行业精英们……创造了联邦储备系统，作为一个政府建立并支持的卡特尔机构来帮助这个国家的银行扩大货币供给……而不用立即承担因储户和票据持有者要求提现的后果。

换言之，给予美联储更多的监管权限，无异于送酒鬼一瓶威士忌，递凶手一把枪，或者给银行抢匪一个滑雪面罩。这只会让事情更糟，而不是更好。

第四章 监管与股市

如果不是政府监管导致企业把无法估量的时间和资源转移到迎合政府监管部门，而不是通过创造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并削减成本和价格来追求利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本应该要高上好几千点。因为人们所期望的未来盈利能力是股票定价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监管破坏了股票的价值。

政府监管已经让美国各家公司从进取的企业变成了行动迟缓的官僚巨兽。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自由主义》（*Liberalism*）中所写的：

> 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民营企业官僚化纯粹是干预主义的结果，干预主义迫使他们去考虑一些因素，而如果它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政策，这些因素不会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中起到任何作用。当为了避免被各种国家机构不断被骚扰，一个企业必须留意各种政治偏见和情感时，它很快就会发现，它不再有能力基于盈亏的坚实基础进行计算。

米塞斯在 1962 年时写下了这段话，但比起今天的全能利维坦国家，当时的政府算是微乎其微了。在它们各种监管的打击下，法院和

监管机构已经去除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三大因素：私有财产、契约自由和结社自由。由于监管措施影响了美国的每一个企业，真正的私有产权在商业世界中几乎不复存在。

对企业的政府监管多到让人头皮发麻。位于华盛顿的竞争企业协会每年都会发布一本关于联邦监管适用范围的会计信息《一万条戒律》（小克莱德·韦恩·克鲁斯编）。这本出版物的 2011 年版表明，各个企业遵守联邦法规的货币成本估计为 1.752 万亿美元，金额相当于该年度整个联邦预算的 50%。这一金额超过了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接近该年度所收缴的所得税收入额的两倍。《联邦公报》（*The Federal Register*）列出了超过 8 万页的法规附属细则，不少于 58 个联邦监管机构勤奋工作让它们每年新增数千页。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实施了成千上万页的附加法规。

显然，除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各家美国公司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遵守政府的文书工作、规定和法规，而不是专注于制造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利润减少了，工作职位被摧毁了或者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股票价格也遭到抑制。随处可见的监管法令所造成的产权不稳定导致投资者对他们达成合同的价值心存疑虑，因为规章制度在不断变化，有时似乎无章可循。

通常，大多数政府监管对消费者的好处甚微（如果有的话），而这些监管正是以消费者的名义颁布的。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结论，他曾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编辑了久负盛名的《法

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多年，当时该期刊曾就监管的影响发表了数百篇学术研究论文。在编辑和发表了几百份这样的研究论文之后，科斯教授（在 J.F. 韦斯顿的《变化社会里的大企业》中）总结道：

> 比起之前的整个时期，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美国，就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已经有了更多的重要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既有定量的又有非定量的……从这些研究论文中得出的主要教训显而易见：它们都倾向于认为这些监管要么是无效的，要么是它具有显着的影响，总体效果却是恶劣的，以至于作为调节的结果，消费者得到了更坏的产品，或更贵的产品，或更坏和更贵的产品。事实上，人们是如此一致地发现了这样的结果，以至于创造出了一个难题：在所有这些研究论文里，人们会期望发现至少有一些政府项目是利大于弊的。

有商学院的大学很少讲授专门与企业家精神相关或者一般来说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德相关的任何事，但会提供许多关于“商业法”、“行政法”、“商业道德”和 “企业社会责任”的课程。所有这些课程关注的都是如何让学生成为好的企业官僚，这样的官僚会迎合国家的各种政府代表，却不会创造利润。即使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命令，学校会教学生会计。因为政府监管部门对每个企业的束缚，

越来越多顶级企业的高管背景是律师、说客或公关（政府操纵的工具），而不是制造和工程。

监管还险些在商业世界中摧毁了言论自由。出于对政府监管惩罚、税务审计和其他形式骚扰的恐惧，极少有企业界人士站出来反对政府监管。许多美国公司都被监管国家吓得不轻，他们把数十亿美元给了政治活动团体，为更多的监管和干预游说。据华盛顿特区的国会研究中心（Capitol Research Center）估计，美国各大公司每捐给米塞斯研究院这种亲自由企业组织一美元，就会捐给反自由企业组织三美元。它们中有些公司似乎认为，它们在“购买”监管者的青睐，但实际上它们是把国家在经济上“绞死”它们的“绳子”拱手让人。其他公司只是左翼活动团体勒索的受害者。

联邦官僚机构完全没有能力管理它自己的预算，更不用说成千上万家私营企业的各种预算决定。政府企业因为懒惰、迟钝、低效和腐败而臭名昭著。它们应该负责由成千上万家私营企业做出的经营决策这个概念是一场正在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闹剧。

第五章 我们的极权监管官僚机构

在哈耶克 1944 年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第 5 章里，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警告道，国家并不需要直接控制所有或甚至大部分生产资料，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发挥极权控制。他援引了德国 1928 年的例子，“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德国经济的“53％”。哈耶克写道，除此之外，私营工业在德国受到了如此严厉的监管，国家**间接**控制了“几乎是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正是通过这样的极权控制，德国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于是，几乎没有一个个人目标不依赖国家行动才能实现，而指导国家行动的‘社会价值尺度’实际上必定包括所有个人目标。”换句话说，政府监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受消费者偏好驱动的追求利润大多被监管官僚的突发奇想取代。

这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令人震惊，但就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程度而言，现代美国足以媲美上世纪 30 年代的法西斯德国。首先，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占了国民收入的 40％左右。这比例每年会相差几个百分点，但近年来它一直在 40％附近。正如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和我在我们的书《地下政府：预算外公共部门》（*Underground Government: The Off-Budget Public Sector*）里讨论的那

样，这并没有把存在于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政府机构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包括在内，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至少是45-50%，这离哈耶克顺便提到的纳粹德国的53%并不远了。

至于监管，在联邦一级有九个内阁级部门分别监管、控制和监管住房、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矿业、农业、劳工和一般商业。在几十个联邦监管机构之外，州政府也提供了大量的监管。例如，阿拉巴马州的网站列出了进行监管的监管机构和委员会：退休、地质、卫生、教育、保护、自然资源、工业关系、农业、老年人、旅游、出差、退伍军人、环境管理、司法鉴定科学、业务拓展、康复、银行、保险、劳动力、运输、青少年服务、儿童事务、电影制作、港口、残疾人、艺术、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森林、道德、露天开采、酒精饮料、拍卖和"以诚信为本的举措。"而阿拉巴马州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州；大多数其他州可能有更长的监管职能名单。

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切政府计划都必然失败，哈耶克写道："【人们越来越】相信，如果想落实有效的计划，管理就必须'与政治分家'并交由专家——常设的官员或独立自主的机构——掌握。"此外，"为一个经济独裁者而呼吁是转向【中央】计划运动中的一个特有阶段"。这的确描述了许多上述的监管职能，但这尤其描述了现在充斥在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里的那些中央计划"沙皇"。截至2010年，被政治任命授予了"沙皇"地位的官员包括如下几类：阿富汗、爱滋病、自动恢复、边界、加州水、汽车、中东、波斯湾、巴基斯坦、南

亚、气候、家庭暴力、毒品、经济学、能源、环境、诚信为本的举措、政府绩效、大湖、绿色就业、关塔那摩基地关闭、卫生、信息化、智能化、科学、经济刺激法案、支付、监管、苏丹、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技术、恐怖主义、城市事务、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石油、制造、网络安全、安全学校、和伊朗。

反对这一主张其实将是非常困难的：相比在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时的纳粹德国，今天的美国经济受到了国家更为严格的控制、监管和管制。靠着骗自己民主之神会设法让他们免于集权的奴役，美国人已经顺着通往奴役之路走了很远。正如哈耶克警告的，“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信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制的……”。

第六章 反托拉斯，反真理[1]

美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起诉微软公司时（经过十年的“调查”结果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这样为诉讼找借口：这是在保持美国消费者保护法规的悠久历史，这一历史始于 1890 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实际上，反托拉斯监管的历史一直是一部针对美国最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企业的政治迫害史，这种迫害通常是由它们的酸葡萄竞争对手煽动的。

在同行评审的《国际法律与经济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1985 年 6 月刊里，我说明了被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及其同僚指控为“垄断”的各个行业的生产增速，是在 1890 年谢尔曼法案之前的十年里经济整体平均水平的四倍（一些行业是快了十倍）。在这十年的价格通缩期间，它们的降价速度还快于价格水平的下降速度。“托拉斯”遭受政治攻击正是因为它们已经让产品越来越便宜，足以让它们效率较低但有政治关系的各种对手沮丧。反托拉斯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喧闹。

微软反托拉斯案中的法官（托马斯·潘菲尔德·杰克逊）实在是

[1] 这里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反垄断（Antitrust）和反真理（Anti-Truth）的拼写极为相似。——译者注

太心存偏见，以至于被任命他的三人联邦法官小组调离了这起案件（即开除）。他的偏见的一个例子，是在一次杂志采访中，他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比作了约翰·D. 洛克菲勒（以及阿尔·卡彭[2]）。在把盖茨比作卡彭的时候，杰克逊法官是大错特错，但当他把盖茨比作洛克菲勒时却没那么离谱。正如多米尼克·阿尔门塔诺（Dominick Armentano）在他的《反托拉斯与垄断：剖析一次政策失灵》（*Antitrust and Monopoly: 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一书中所证明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让精炼石油的价格从 1869 年的 30 美分/加仑下降到了在 1897 年的 5.9 美分，同时创造了无数的新产品并刺激了整个行业的创新。为此，洛克菲勒遭到起诉，并被迫拆散了他的公司——尽管在他据称"垄断"了石油工业时，他还有着 300 多个竞争对手。

在他的经典之作《反托拉斯与垄断》中，多米尼克·阿尔门塔诺仔细考查了 55 起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反托拉斯案件，并得出了结论：在每一起案件中，被告公司都在**降低**价格、**扩大**生产、创新、创造新产品，并且一般来说都在**造福消费者**。受到伤害的不是消费者，而是这些公司低效的酸葡萄竞争对手。例如，美国烟草公司在 1911 年被判犯有"垄断"罪，即便公司在原材料成本增加了 40%的情况下，让香烟（每千支）的价格从 1895 年的 2.77 美元下降到了 1907 年的 2.20 美元。

勒尼德·汉德法官在 1944 年认定美国铝业公司犯有通过采用

[2] 阿尔·卡彭（Al Capone）是美国著名的黑手党头目。——译者注

“卓越的技能和远见”来“垄断”未尽利用的锭铝市场的罪，法官说这些“卓越的技能和远见”“预先阻止”了不那么有技能和远见的企业的竞争，这可能是反托拉斯史上关于荒谬空话的最佳范例。他谴责美国铝业非常善于正确预测其产品的市场需求并提供需求，以此来“排斥”价格较高的竞争对手。

汉德法官吟诵道，美国铝业以“伟大”的组织”来“拥抱每一个新机会”，并且，它为组织配备了“精英业务人员。”他说道，这种“罪行”必须公之于众。

1962 年，政府禁止占有鞋子市场 1%的布朗鞋业公司收购在当时同样高达 1%市场的金尼鞋业。政府离谱地宣称，一个有 2%市场的公司据称威胁到了行业内的竞争。

1969 年，IBM 曾在电脑市场占有 65%的市场份额，并被联邦政府起诉涉嫌垄断电脑业。在政府最终放弃了这一案件之前，IBM 在这个官司中深陷了十三年。与此同时，该公司被英特尔、微软等公司蚕食了市场。政府对 IBM 这种攻击不可否认地削弱了该公司。

1962 年，政府强迫施温自行车公司自行剥离它的经销商网络。来自外国的竞争随后迫使施温走向了破产。

通用汽车从未被起诉过违反反托拉斯法，但该公司对反托拉斯的恐惧驱使它在 1937 年到 1956 年采用了一个这样的政策：决不让自己在“三大”汽车制造商中的市场份额超过 45%。这使得该公司在竞争中输在了外国汽车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的手上。

反托拉斯监管机构禁止美国无线电公司从美国的执照持有者那里收取专利费，因此该公司转而把它的产品授权给了各家日本企业。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电子产业在美国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

通过禁止它收购国内航线，反托拉斯监管杀死了泛美世界航空公司。没有了这些为其国际航班“引流”的航线，该公司走向了破产。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垄断是不可能的。政府的垄断专营权、保护性关税、特许经营法、各种“所需证书”和像反托拉斯监管这样的其他垄断监管把戏，才是垄断的真正根源。

第七章 反托拉斯卢德分子

卢德分子（Luddites）是在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纺织机工人，他们通过破坏机器，并以传说中的舍伍德森林的卢德王（King Ludd）之名发表声明宣布废除这一新技术，以此来抗议机械织布机的引入。卢德分子们未能理解——今天的新卢德分子们同样未能理解——的是，那些“节约劳力的技术”可以减低生产成本和价格，这增加了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因而可以在该行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非更少。

在 2011 年，当奥巴马政府阻止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T-Mobile USA）的提议并购时，我们又一次看到新-卢德分子们的身影。根据 2011 年 8 月 31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阻止并购可以“帮助美国工人保住工作”。用司法部反垄断副部长科尔的话说，“【奥巴马】政府的观点是，通过创新和竞争，我们可以创造工作岗位。”并购常常会“通过减少冗余”减少工作岗位的数量。科尔补充到，“因而这一行动可以防止工作岗位的流失。”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创造工作岗位背后的规则就是，如有必要，可以保护和增加那些成本上升的“冗余工作”。美国制造业的国外竞争对手们想必已为奥巴马政府欢呼喝彩。

事实上，与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学分析”相反，商业上减少“冗余工作”是另一个“降低成本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方法。当一个公司以这种方式提升了竞争力，其市场份额增加，**该公司因而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创新”的确能创造工作岗位。奥巴马政府没明白的是，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这样的并购是一次创新。这是一种被提倡的降低通讯服务成本的新方法。在手机领域这样高度竞争的行业中，不停的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奥巴马政府对提议合并的态度是卢德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结合。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们相信这样一种迷信：财富不是生产创造的，而是囤积黄金创造的。奥巴马重商主义者们显然相信，必须囤积已经存在的工作（而不是黄金）。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是动态的，当更新、更好的工商实践取代更旧、更低效率的（在服务顾客上的效率），就业机会也会被不断地创造和破坏。

与往常在反垄断案件中的表现一样，通过宣传合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竞争，奥巴马政府为其对合并的阻止进行了辩护。但是，这究竟怎么会发生呢？当时美国有超过 180 家手机公司，世界各地还有数百家在美国市场的潜在竞争者。在有数百家竞争者伺机而动，等着利用它们的错误定价决策的情况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

德国电信美国公司可能永远都无法提高价格，更不用说把价格提升到垄断的水平。

提议合并的方案的目的显然是降低价格，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实现，因为生意场上没有这样一定的事。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奥巴马政府对合并提议的阻碍，阻止了这两家公司变得更有竞争力和提供比现在更多就业岗位的努力。

第八章 公立医疗保健对经济学法则

美国政府在不断接管经济中的医疗部门，其中的核心是在奥巴马任内通过的一项法案，它会最终把私人医疗保险挤出这个行业，或是在事实上将这个行业国有化。这项法案额外增加了医疗保险公司的税负和其他成本，同时建立了一个政府医疗“保险”的官僚机构，以在表面上与私人企业进行“竞争”。这些都是最终在美国实现公立医疗这个社会主义白日梦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在其他许多国家的表现已经如此精彩了。就像所有政府垄断一样，这一个医保机构也会有国税局般的“慈悲”，和邮政部门般的“高效”。

许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了美国医疗保健供给的经济史。1992 年胡佛研究所出版了一份报告，题为《医疗保健中的投入与产出》。在这份报告中，弗里德曼指出，在 1910 年的美国，有 56%的医院为盈利性私人企业。之后数十年政府对公立医院进行补贴，使这个数字下降到 10%。尽管这个过程耗时数十年，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美国政府已经掌控了几乎整个医疗业。残存的私人医疗业仅占极少比重，且受到了相当苛刻的监管，我们几乎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的附庸。这些“私立”医院

的管理层所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都在应付政府法令，而忽视了护理病人这个目标本身。

弗里德曼的关键结论是，与所有官僚体系一样，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行业，也制造了“投入”增加而“产出”减少的情形。在诸如仪器采购、基础建设和医疗人员薪水方面加大开支，事实上却降低了医疗保健行业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产出”。比如，1989 年医疗开销相比 1965 年上升了 224%，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却下降了 44%，且床位利用量也下降了 15%。弗里德曼研究了 1945-1989 年的这段时间，发现即便排除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每位患者的医疗开销也几乎上涨了 24 倍。政府对医疗保健控制的加强，导致的是服务减少而成本急剧上升。

由于缺失所有的市场反馈机制，所以所有政府运营的官僚部门当中都存在这样的结果。因为在政府中不存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利润，所以不存在可靠的机制来奖励好的表现和惩罚坏的表现。事实上，在所有的政府企业中，事情恰恰相反：在承诺用更多钱能“做得更好”之后，糟糕的表现往往会被“奖励”更多的预算。

政府每涉足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成本就会激增。1970 年政府预测医疗保险中医院保险（hospital insurance）的份额将是每年“仅有”29 亿美元。由于实际开支是 53 亿美元，对成本就有了 79%的低估。1980 年政府预测医院保险的开支为 55 亿美元；实际开支是这个

数字的四倍多——256 亿美元。然而，每当政府要开始接管某个行业，它总会承诺**降低**该行业的成本。

为了应对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成本激增，政府随后在医疗保健行业上赋予自己更加不同寻常的权力，在医疗保险的头 30 年里推行了 23 项新税款[3]。

无论在加拿大、英国还是古巴，所有由政府垄断的医疗保健，都经历过行业成本和需求的激增，后者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医疗保健是“免费”的。（它当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成本隐藏在你的普通税账单上了。）每当一种商品的标格为零，其消费者需求都会大幅增长，医疗保健也不例外。同时，官僚体系惯常的惰性，只会导致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一年不如一年。随着成本开始失控，那些曾经承诺**降低**成本的政客们将会颜面扫地，随即而来政客们使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惯用伎俩——一般是推行价格上限，且通常打着“全面控制预算”的幌子，巧妙而委婉。

价格上限通常会刺激商品的需求，同时也会降低商品的供给，由此产生了短缺现象。因此这种情况下非价格调控的配额政策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便意味着，只有政府的官僚机器，而不是病人和医生，才能在“谁有权获得治疗，何种医疗技术得以应用，多少医生

[3] 参见 Ronald Hamoway,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re,” in Roger D. Feldman, ed. *American Health Care.*

护士将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业”等等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由此，我们可以预测政府的行为将会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极权主义式的严格监管。

所有采取过社会化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都经历过价格监管造成医疗服务短缺的噩梦。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加拿大人在车祸中受到三级烧伤，因此需要做面部修复手术，他要接受治疗需要等五个月。同样，骨科手术的等待时间也长达五个月，神经外科手术为三个月，甚至对于心脏手术也长达一个月。[4]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来，许许多多较为富裕的加拿大人，在需要紧急治疗时涌向美国医院的原因。

《纽约时报》在 2000 年 1 月 16 日刊登了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一篇名为《医院人满为患让加拿大人等待和南下》的文章。作者提供了许多例子，讲述了加拿大的国有化医疗保健体系如何造成了极为严重以至于威胁患者生命的医疗服务短缺。比如，一位 58 岁的老太太在蒙特利尔医院的走廊与其他 66 位患者一起等待她的心内直视手术，自动门整夜开开关关，把零下的寒流带入室内。这位老人已经为这场心脏手术**等了五年之久**。

[4] 参见 The Fraser Institute publication by Baccus Barua, Mark Rovere, and Brett J. Skinner, *Waiting Your Turn: 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 2011 Report*.

在多伦多 25 家大医院中，有 23 家医院在同一天由于医生短缺的原因拒绝出动救护车。在温哥华，突发心脏病的患者在救护车里等候救治，车却居然在停车场里“等待”了数小时。至少有一千名加拿大医生及更多的护士选择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以避免他们的工资受到价格监管的影响。詹姆斯·布鲁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几乎没有加拿大人会推荐自己的免费医疗体系作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

加拿大这种价格监管所引发的短缺，也体现在病人在医疗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上的严重的短缺。每个美国人人均拥有的核磁共振成像机的数量是加拿大的 8 倍，放射线癌症治疗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5]是加拿大的 7 倍，结石粉碎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是加拿大的 7 倍，且心脏切开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也是加拿大的 3 倍。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华盛顿州，拥有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数量却比有着三千万人口的加拿大还多[6]。因此，若美国继续走国有化医疗的歧路，未来美国也会重蹈加拿大的覆辙。

[5] 译者注：治疗服务单位（therapy unit）是一个包含一定数量医生、护士、床位和仪器设备，衡量医疗水平的单位量。——译者注

[6] 参见 John Goodman and Gerald Musgrave, *Patient Power: Solving America's Health Care Crisis.*

第二部分 政治与窃贼

第九章 花钱才能玩：干嘛小题大做？

2009 年，华盛顿当权派和全国媒体都装作对这一事实愤怒：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在贩卖政治好处。州长显然在就巴拉克·奥巴马空出来的美国参议员席位“出价”，因为作为州长他有权任命继任奥巴马的人。联邦检察官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提供了或许是最大的笑料：他声称，如果亚伯拉罕·林肯知道芝加哥政客一直在做这种勾当，会在自己的坟墓里翻过身去。

实际上，林肯会对这种说法的愚蠢感到沮丧。作为普利策奖得主，林肯传记作家大卫·唐纳德（David Donald）曾指出，在竞选总统以前，林肯曾经成为伊利诺伊州的主要政治幕后操纵者。年轻时林肯曾说，他的主要愿望是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德威特·克林顿”，这指的是纽约州前州长，人们认为是他发明和完善了制度化政治腐败的“分赃制”。

作为总统，林肯一个最早的动作就是让国会在 1861 年 6 月召开特别会议商议太平洋铁路法案，这最终导致了当时美国史上最大政治贪污腐败（动产信贷公司丑闻）的出现。林肯个人受益于这一立法，得到了作为总统为政府补贴的横贯铁路选择东起点的权利。他选择了爱荷华州康瑟尔布拉夫斯——他曾于 1857 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大片土

地。林肯的许多共和党名人同僚，从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到贾斯汀·莫里尔和奥克斯·埃姆斯，甚至谢尔曼将军，都因为太平洋铁路立法而积累了财富。

贩卖政治好处——包括任命政府官职——正是定义华盛顿政治（以及美国所有其他政治）的东西。在近几十年里，除了国会议员荣·保罗（Ron Paul）这个唯一的例外，几乎每个华盛顿政客都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贩卖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好处上。为了竞选“捐献”、回扣、亲朋好友的高薪职位、私营部门的职位承诺和货币施舍等，他们“贩卖”了立法和法规。这就是政客们要做的，这就是政治。布拉戈耶维奇州长只是在做一个政客典型的不诚实的一天的工作。

在贩卖政治好处上，政府已经变得如此娴熟，以至于关于政治勒索科学已经写出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学术论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弗雷德·S. 麦克切斯尼（Fred S. McChesney）的《白花钱：政治家、抽租与政治勒索》（*Money for Nothing: Politicians, Rent Extraction, and Political Extortion*）一书。关于政府补贴企业和其他团体以换取“政治献金”已经有了很多著作，但麦克切斯尼集中在一个更加隐蔽的现象：政客们威胁说，除非该企业和行业为自己的竞选付钱和“捐献”，否则就要用监管和税收来对该企业或整个行业施加恐吓性的费用。他将其称之为“政治勒索或敲诈的一种形式。”

例如，政治勒索或敲诈可以威胁实行价格监管，或威胁撤销职业执照、公司章程或建筑许可。或者，它可以威胁通过特别消费税或尤

为繁重和昂贵的监管来提高做经商成本。威胁的目的是从被威胁的企业那里征求竞选“捐献”。政客们甚至他们有自己对政治敲诈和勒索的叫法。他们称这种立法“挤奶员法案”，因为他们从那些被他们称为“现金奶牛”的企业里“挤”出了政治献金。

也有意在从受威胁的企业里“榨”出现金的“榨汁机法案”。以及出于相同目的——用威胁立法从企业游说者们那里“取”出现金——的“取件器法案”。麦克切斯尼教授举了这些例子：

- 周期性地提议产品责任立法，以便从辩论双方那里获取竞选现金。
- 提议通过立法来限制期货交易，这从期货交易者那里取走了大量现金。
- 提议对药品进行价格监管，这从制药业榨走了数百万美元。
- 提议对有线电视进行价格监管，这也起到了相同的效果。
- 完全禁止吸烟，或者对烟草产品征收更加极端的税，这种提案总能从烟草公司那里取走数百万美元。
- 对酒精饮料增加消费税的各种提案是可靠而真正的榨汁机立法。
- “对富人征收”更重的税并“让他们支付公平的份额”的各种提案是取件器立法的经典案例。

在每种情况下，一旦他们从被威胁的个人、公司或团体那里榨取到“足够”数量的现金，恐吓性的立法就会被丢弃。换句话说，这和

黑社会暴徒的做法——索要贿赂以换取允许一家企业在“他们的”街区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同。最终被判处十四年徒刑的布拉戈耶维奇州长，是被芝加哥政治机器（在 2009 年迁到了白宫）所用的政治牺牲品。他们因为布拉戈耶维奇做了他们自己在整个政治生涯里都在做的事情而追捕他，其明显的目的是试图欺骗公众相信，芝加哥政客不是真正的窃贼和骗子团伙——很多人认为他们是。

第十章 美联储和“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的犯罪

几年前，“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ACORN）”，也就是巴拉克•奥巴马离开法学院之后受雇的那个左翼激进组织在新闻报道中出现，原因是该组织的一名“税务顾问”给两个分别假冒成皮条客和妓女的人提供逃税的建议，而这一过程被录了像。假冒者告诉“顾问”，他们希望用政府补贴的贷款来开一家妓院，以便安排他们将从中美洲非法带入境的几十名少女。在录像里，“顾问”欣然给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申请到政府贷款，同时还不让当局知道他们申请贷款的真正目的。

这个故事的确肮脏，但与“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在过去三十年来的主要功用相比就相形见细了。在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监理署及其他政府机构联合进行的合法敲诈中，“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一直是一个重要参与者。敲诈始于吉米•卡特总统于 1977 年批准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RA）， 该法案使得“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这样的“社会团体”能够成功地从银行敲诈出几十亿美元。根据社区再投资法案，这些社会团体可以“抗议”银行的扩张

或合并。他们向美联储提出抗议，同时要求希望扩张或合并的银行给“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几百万美元，而这些钱据推测应该是通过“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借给了次级借款人。当然，“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总是在这笔钱中扣除一大部分来作为自己的工资和费用。已经破产的华盛顿互惠银行曾吹嘘自己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的贷款上赚取了 3750 亿美元，而在全国银行（Countrywide Bank）也在 2008-09 年的次贷危机中破产之前，美联储因其在这种贷款中赚了 6000 亿美元而给它们颁了一个奖。

“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和其他类似的左翼“社会团体”将其从银行骗取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政治活动，例如进行民主党选民的大规模登记，支持政府里各个级别的左翼政治候选人（越左越好），组织集会，抗议，或为其“人民平台”的各项政纲准则进行游说等等。“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的“人民平台”曾经承诺：“我们将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所有美国方式变成一种方式，直到我们能共享财富……”。其实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

社区再投资法案本身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谎言：“从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社区的人身上可以赚到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这些利润唾手可得，但是银行会系统性地对这部分利润视而不见。”他们认为银行家已被偏见所蒙蔽，必须由政府迫使他们赚取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这几十亿美元利润。

而事实是，美联储迫使社区再投资法案约束下的抵押贷款机构向不合格借款人发放不良贷款，使其从中赚取几十亿美元。当《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彼得·布莱米洛和莱斯利·斯宾塞质问波士顿美联储官员艾丽西亚·芒奈尔关于美联储宣称的 90 年代早期的系统性贷款歧视时，芒奈尔被迫承认她其实并没有证据。她和其他美联储官员（以及克林顿政府）还是在继续强化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执行。这表明社区再投资法案的目标其实一直是强制的财富再分配，而并不是与种族歧视做斗争。歧视的指控其实只是一个诈术，用来恐吓那些不乐意进行合作的抵押贷款机构。

第十一章 价格欺诈：真正的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最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是让联邦所得税和通货膨胀指数挂钩，并把联邦所得税等级的数量从十五级减少到了三级。在此之前，只有得到了更高的生活费报酬，普通中产阶级工人才会被推到更高的税收等级。其结果是，一些年的生活成本提高实际上通过减少人们的总体税后拿回家的工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让国家变得富有。

根据这项腐败的计划，美联储将印出大量的钱，造成价格通胀。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成本增加，反过来造成“等级攀升”和更高的纳税。联邦政府的预算变得充足而纳税人蒙受损失。政治家从来不必为投票增税而承担责任；通货膨胀替他们增税了。这是一种真正的没有代表的税收形式（不是说有代表的税收就好一点了）。

联邦政府不能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掠夺中产阶级，这要归功于所得税与物价指数挂钩。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房产税的传导来这样做。每次房产价值上升，就像它们很大程度上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七年所做的那样，房产税的收入就会自动上缴，政客都不需要去投票加税。房产税评估替他们干了脏活。

因此，当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房地产泡沫时，房地产价

值惊人的增长伴随着同样惊人的房产税增加。(泡沫破灭了以后，地方政府急于提高财产税率，以免损失房产税收入——由房产价值×税率确定)。

例如，在马里兰州，地方政府据说在 2005 年征收了比 2000 年多 35%的房产税。那段时间政府“服务”的质量或数量不太可能增长三分之一。市民们仅仅是为相同——或更糟——的服务多付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钱。

第十二章 农场抢劫[7]

1996 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自由农场”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结束大部分农业补贴。当时，农业补贴的主要形式是各种价格支持——国家强制施行的高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最低价。

终结价格支持肯定会使农产品市场更有效地运转，但政府自愿终结一项有利于一类强大的政治选民（即富裕的企业农场主）的补贴方案的确是罕见的——甚至是有点奇怪的。现实情况是，补贴并没有结束；它们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形式。

公共选择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是，政客们总是会竭尽所能地掩饰对不合格群体（比如企业农场主这帮百万富翁）的补贴。如果他们可以通过保护主义，或者价格支持补贴他们，会比简单地给百万富翁商人开一张支票更可取。后一种政策将使纳税民众很容易发觉事有蹊跷。但是，各种价格控制在农产品市场产生了如此显而易见的扭曲，政府显然认为终于是时候——稍稍——摆脱它们了。在价格控制的地方，出现了“过渡费”，它大概是为了暂时缓解贫穷的百万富翁农场主们的痛苦和折磨——他们不再享有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一切的保障。

[7] 作者在这里用了这样一个多少有些拗口的标题，是因为他在英语中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把武装抢劫（armed robbery）变成了 farmed robbery。——译者注

这个策略是民众被政府的诱购（bait-and-switch）[8]方案愚弄的又一例证。过渡费从来都不是真正过渡性的，并且，人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打算让它们是过渡性的。农业游说团体的力量从未减弱，并立即投入工作为增加新的补贴并使其永久化而游说。他们已经成功了。每年都会有一堆如雪片般飞来的“补充开支法案”，这些法案把企业农场的福利增加到了美国纳税人必须每年支付数百亿美元的数额。

通过把这些计划称为“过渡”计划，国会保证了自己能从农场主们那里得到一笔永久性的竞选捐款，这些农场主可以依靠游说和一年年数百万美元现金的付出，换来这些计划的立法延期。

《今日美国》（*USA Today*）在 2005 年 2 月 1 日关于德克萨斯棉花农场主的文章里，解释了养殖抢劫这一制度是如何运转的。文章关注了尤金·贝德纳茨，他收获了四千包棉花。总之，那年的棉花产量有望超过 750 万包，是五十多年来的最佳收成。

这也意味着，这将是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农场游说集团对纳税人收入的最大盗窃。新系统的运作方式是，如果棉花的市场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价格支撑位，那么政府将用纳税人的钱把农场主卖棉花的实际价格和武断得出的价格支撑位之间的差额付给农场主。

当时，棉花的市场价格为每磅 35 美分，而价格控制的价格被定为每磅 52 美分。一包棉花约重 500 镑。所以，贝德纳茨先生能为其棉花

---

[8] “bait-and-switch”是零售中使用的一种欺诈形式，但也适用于其他情况。首先，商家用低价商品的广告诱骗客户，但是当客户访问商店时，他们会发现广告中的商品不可用，或者销售人员会迫使客户考虑类似但价格更高的项目。——译者注

得到每磅 17 美分的差价。因此，政府无缘无故就给他了一张 34 万美元的支票。而消费者或纳税人没有得到任何类型的任何回报。德州棉农一共在那一年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总计 6 亿 375 万美元的利益。

通过这一计划，棉花、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农场主变成了强盗，而其他一些农场主，如糖农，也在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通过政府授权的供应减少，把价格推高到全球价格的三到四倍来掠夺纳税人。所有用糖来生产的东西也都变得更加昂贵。

实际上，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通过提高物价增加了生活成本。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这个谎言：自由市场导致了价格上涨，我们需要政府——通过仁慈而全能的监管——来“拯救”我们。

第十三章 裙带主义的缔造者

“大衰退”的最初几年间，联邦政府一宣布用数万亿美元紧急救助华尔街财阀，便有鼓吹政府救助的人士祭出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神话。他们认为汉密尔顿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开创者，且显然将此论据看作是一个秘密武器。人们称汉密尔顿会赞成紧急救助，因为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对幼稚产业征收保护性关税，并通过对各种行业的补贴和“出口奖励金”，把欧洲式重商主义引入了美国。（他著名的演讲《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

华尔街的喉舌之一《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VS 荣·保罗》的文章，指出应当无视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于公司补贴的批评。因为与荣·保罗及其志同道合的追随者相比，汉密尔顿才是伟大的政治家和经济天才。

随后，《华尔街日报》也加入了对汉密尔顿溜须拍马的大军。商业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撰文称，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中央银行还不够集中化，美联储需要进行更多的中央计划，而非相反。戈登盼望出现一位统治金融市场的经济铁腕人物。戈登支持政府的紧急救助，并且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托马斯·杰弗逊！

杰弗逊反对美国第一所中央银行，也就是汉密尔顿一直拥护的美利坚银行。杰弗逊是硬通货的支持者，不放心让政客来管理货币打交道。而在戈登看来，这种思想是本次大衰退发生的原因。事实上，正是美联储常年以来奉行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加上联邦政府威逼利诱使抵押放贷者将数万亿不良贷款（由房地美和房利美证券化）贷给不合格借款人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这些对汉密尔顿疯狂而盲目的崇拜表明，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神话成一个天才的中央经济计划者，是美国裙带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石。依靠中央银行制度下巨额的公共债务以及“合法”地生产假币，这一体系才得以生存。

造成这次大衰退的主要原因正是裙带主义，而不是像戈登等人所说的那样，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真实的汉密尔顿

建国时，有些人想把英式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政府引入美国，汉密尔顿便是这些人中的思想领袖。他们在作为英式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受害者时，坚决反对这种制度甚至发起了一场革命。但当他们成为了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便是另一回事了。也许可以用喜剧演员梅尔·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当国王真好。

正是汉密尔顿首创了“美国模式”一词来形容公司补贴、保护性关税、中央银行和巨额公共债务政策。他指出这些政策将会是美国的“幸事”。与其不同，他的政治死敌托马斯·杰弗逊熟识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受到了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理查德·坎蒂隆等人的理论熏陶。而汉密尔顿则忽视经济学，或对此一无所知。相反，他一直在传播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等公关辩护者提出的英式重商主义。

汉密尔顿支持巨额的公共债务，并不是为了建立美国政府良好的信誉或者是为任何政府工程筹资，而是出于马基雅弗利式的考虑，以图将富人的经济私利与政府连结起来。他说，购买政府债券的大部分是富人，因此他们自然会成为一股有力的游说力量，鼓吹增加税收和扩大政府规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国库里存在足够的税收收入，用来支付他们所持国债的利息。汉密尔顿说对了：国债持有者和承销国债的投资银行家们一直对大政府情有独钟。这也是为什么本次大衰退一爆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便能首先得到政府紧急救助的原因。国家就像黑社会组织一样，首先照顾自己的利益。

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列叙了他支持裙带主义帝国的主要论点。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 1905 年出版的汉密尔顿传记中写道，汉密尔顿在报告中鼓吹“旧的英式重商主义体系，

将之改头换面，以适应美国的情况。”杰弗森曾撰文说，汉密尔顿所支持的保护主义、公司福利以及中央银行等等“阴谋”，会将腐败的英国政府体系引入美国。杰弗森和萨姆纳说对了。

几代美国人所生活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本质上是汉密尔顿式的重商主义：国王式的总统通过行政命令统治国家，罔顾制约其权力的宪法；州政府成了中央政府的傀儡；公司补贴疯涨；政府累积起数十亿美元债务；美联储里的中央计划者们拙劣的政策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繁荣-萧条周期（和周期性的通货膨胀）。这是汉密尔顿对美国的诅咒——如果美国要重现自由与繁荣，就必须驱除这条诅咒。

这个诅咒终将被美国人对自由和繁荣重燃的热情所驱除。

第十四章 煽动主义的诅咒

在 2011-2012 年的所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只有荣·保罗拥护华盛顿和杰斐逊的美国外交政策理念。为此，他和过去七十年里所有其他志同道合的政治家，都被误导性地抹黑为“孤立主义者”。在这种语境之下，“孤立主义者”是真正的奥威尔式的。通过倡导和平和自由贸易，并只支持正义的和防御性的战争，荣·保罗在倡导的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最大程度的交往。

人类文明的源头实际上正是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自由。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所享受和利用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全都来自世界各地数百或数千人的努力，他们都专门从事于某件事并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细致地把它办好，于是我们才有了我们的面包，我们的牛肉，我们的啤酒和其他的一切。对贸易的限制才是真正“孤立主义的”，而没有任何东西比战争更能限制世界人民之间的互利互惠的贸易。战争导致孤立主义。在自由市场里，人们和平而有利地相互作用；而当他们身陷战争之中时，他们互相残杀。

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和合理的自由市场，通过追求自己的私利，个人将专门从事他们最擅长的东西，将这些东西卖给别人，并利用所得收益来购买那些他们不那么擅长生产的东西。

最穷的人就是这样生存下去并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伴随自由市场的心境中不存在“适者生存”。穷人中的穷人也并不需要自己生产食物，自己建造房屋，自己缝制服装（其他人也不需要）：国际劳动分工使他们能够依靠别人来提供这样的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可以支撑下去。

另一方面，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巨著《人的行动》（*Human Action*）中所写，战争“破碎”[9]了国际劳动分工。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把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人未曾想象过的程度。只要允许资本主义繁荣，普通人就能享受国际劳动分工作的成果，他的生活水平提高，每周工作的时间减少（这也多亏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投资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一切，通过破坏国际劳动分工，它把一个又一个国家丢进了**孤立主义的**深渊。世界人民曾在无数方面受益于陌生人的努力，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不再能享受到这些好处。各个国家不再能享受国际贸易的好处，同时，它们形成政治联盟发动战争。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最终的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对资本的大规模破坏。

当然，总是有一些人会从战争中获益：君主、独裁者，以及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描述的，喜欢沉溺于“帝国荣耀”的“政治家”们；通过防务合同中饱私囊的政治关系户；臭名昭著的学者和“记者”们，他们为了换取地位和金钱，为国家运作亲战争宣传机器；以及通

[9] 原文是：“一到平民变成了兵士的时候，市场经济就破碎了。”——译者注

常来说的国家。战争乃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没有什么东西比战争更能扩张国家及其所有职能部门。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同样没有什么东西比非防御性的战争更能破坏自由和繁荣。并且，正如穆雷·罗斯巴德在其名为《正义战争》（Just War）的文章中所评论的那样，美国历史上唯一真正公正和防御性的战争，一直只有美国革命和南方对共和党在 1861-1865 年发动的入侵的防御。

真正的“孤立主义者”寻求破坏世界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他们是一群可以被称之为“**煽动家**”的人。上面提到的自大狂和寻租者们用自己的撒谎、纵容和操纵行为煽动战争。他们自己通常从未参与过战争，甚至没有加入过和平时期的军队，并理所当然地被许多评论家称为“鸡鹰”[10]。

在其首次就职演讲中，亚伯拉罕·林肯对南方的奴隶制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辩护，甚至承诺支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这一点，同时，他在同一次讲话中威胁为了收税开战。由于他无意解放任何奴隶，而为了收税而发动战争会使他成为一名国际战犯，他需要去为了侵略自己祖国发明一个借口（顺便一提，这正是美国宪法第 3 条第 3 款[11]对叛国罪的定义）。于是，他编造了“永久同盟”这个概念。林肯暗示国父们会和他意见一致：如果任何一群人试图离开国父们创建的“自

[10] 鸡鹰（chickenhawks）是一个美国政治术语，它是鸡（意为懦夫）和鹰（意味着某人主张战争）的复合体。鸡鹰被用来描述那些强烈支持战争或其他军事行动，但在适龄时却积极逃避兵役的人。——译者注

[11] 美国宪法第 3 条第 3 款为“叛国罪”：“对合众国的叛国罪只限于同合众国作战，或依附其敌人，给予其敌人以帮助和鼓励。无论何人，除根据两个证人对同一明显行为的作证或本人在公开法庭上的供认，不得被定为叛国罪。国会有权宣告对叛国罪的惩罚，但因叛国罪而剥夺公民权，不得造成血统玷污，除非在被剥夺者在世期间，也不得没收其财产。”——译者注

愿”联盟，中央政府将有“权利”入侵这些州（states），谋杀数十万它们的公民，轰炸它们的城市，把一些州烧为平地，并掠夺它们的财富。当然这正是林肯的军队所做的，这一切的名义都是维护一场七十年前的政治交易。至于萨姆特堡（Fort Sumter）[12]，真实情况是林肯在事件（其中无人受伤，更不用说死亡）之后写信给他的海军指挥官古斯塔夫·福克斯，感谢他协助唆使南卡罗莱纳人打响了第一枪并挑起了一场战争。

美西战争纯粹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从来没有丝毫可能性给普通美国人带来任何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已故的 19 世纪伟大自由意志主义学者威廉·格拉哈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写下他的著名文章《西班牙征服美国》（*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美西战争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和西班牙帝国一样的帝国，而非国父们的立宪共和国。但是，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自大狂吹牛大王得以在这个疯狂的冒险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生涯。

美国人也没有任何理由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二十世纪——如果不是所有世纪的话——最大的浩劫。正如吉姆·鲍威尔（Jim Powell）在《威尔逊的战争》（*Wilson's War*）一书中所写，全部的“成就”不过是加强了共产党在苏联的力量，以及纳粹在德国的崛起。但政治阶级及其所有支持者却得到了大量的权力、荣耀和财富。国防承包商们富得超过了自己最狂野的梦；卑微的政府官僚成为了强大的经

[12] 萨姆特堡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一要塞。1861 年 4 月 12 日南方邦联军队在此打响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枪。——译者注

济独裁者；国家主义知识阶级开始把自己视为极为重要的社会工程师阶级。所谓的进步分子几乎一致地赞成战争，例如，因为他们常常一起出现的信念：（1）在美国和欧洲，可以并且应该用政府来创建地球上的天堂；（2）苏联式的战时中央计划，可以是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经济的苏联式中央计划的示范项目。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花了八年时间想终结大萧条，却遭到彻底的失败，他的大规模干预政策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在此之后，正如罗伯特·史汀奈特（Robert Stinnett）在他的《欺骗日：罗斯福和珍珠港的真相》（*Day of Deceit: The Truth about FDR and Pearl Harbor*）一书中用文件证明的，他操纵了日本侵略珍珠港。在罗斯福看来，进军欧洲战事将成为一切政府开支计划之母，这无疑会终结萧条，至少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他糟糕的失败上移开。毕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声誉和遗产危在旦夕。（战争并没有结束大萧条；它只是结束失业，因为在只有 500 万左右美国人失业的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征召了上千万男性。）

越南战争造成了 5.5 万名美国人和数十万越南人无意义的和不必要的死亡，煽动家的阴谋也对让美国陷入这场灾难性的战争负有责任。然后，当然还有煽动家们的最新“胜利”——伊拉克战争。连中央情报局都承认，这场战争基于一个谎言——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威胁到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千名美国士兵在那里白白送命，还有数十万人终身残疾，数十万伊拉克人被杀。至少对普通美国纳税人

而言，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想想煽动主义的恶心历史，下一次你会看到一个奸笑和虚情假意的政客敦促入侵伊朗、叙利亚、朝鲜，或者他认为美国的炸弹应该投向的任何其他遥远的地方。

第十五章 国家的媒体走狗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和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提出了一个媒体中“自由派”偏见的理论。该理论着力于对媒体如何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严谨探索，并分析了政府在这种自身利益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简而言之，他们的论点是由于政府变得如此巨大而又无处不在，因此一般记者报道给公众的大部分信息，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自身，包括它的所有政客、官僚、及其特殊利益附庸。比如，一个环保新闻记者，必须培养和环保机构官僚们的关系，因为他们是环境政策最新消息的主要来源。一个劳工新闻记者，也必须培养和美国劳工部官僚们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关于劳工政策最新消息的主要来源，诸如此类。

结果便是，任何对政府机构过于批判的新闻记者，便必然要承受他的消息来源，他的职业生命线被切断的风险。因此，记者们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保全，要求他们实际上成为国家的走狗和传声筒。他们会容忍并偶尔报道对政府相对无关紧要的批评，但他们更可能

去妖魔化那些作出这种批评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为的是愚弄公众，使他们相信在华盛顿存在着真正的公共政策辩论。

每当有国会议员荣·保罗这样的人露面，挑战任何国家中央计划机构（比如美联储）的正当性和存在，媒体便会忽略并（或）妖魔化他和与其观点相关的所有人。

詹森和梅克林的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它省略了在媒体中国家主义偏见来源的其它一些重要元素。穆瑞·罗斯巴德在他两篇名为《国家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State*）和《解剖国家》（*Anatomy of the State*）的论文中，填补了我们理解中的这些空白。罗斯巴德写道，所有政府都极为依赖一系列关于其所谓的伟大和仁慈的神话和迷信，外加与之相伴的关于自由、志愿主义（voluntarism）、私人企业和公民社会的"恶"的谎言、神话和迷信。比起政府官僚，这些神话和迷信更多是学界和媒体中的各种知识娼妓在传播。学术界的"御用历史学家们"，鼓吹着一个又一个志愿主义和自由市场"失败"的鬼话，主张政府更多干预我们的生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这种现象的完美样本，而《纽约时报》和民主党的权威保罗·克鲁格曼，是这种御用历史学家的绝佳典范。

而媒体忽视像国会议员荣·保罗这样的人，还有其他的原因。或许有少数例外，但绝大多数的媒体成员都已为福利/战争国家充当了多年的传声筒。他们与任何政府官僚或政客别无二致，都是国家

机器的一部分。他们也是国家蛊惑大众的重要工具，这样民众就会对国家永无止尽的扩张，和各个职能部门（尤其是媒体）的敛财袖手旁边。而国家的扩张，总是伴随着经济繁荣降低和民众自由减少。

因此，“主流媒体”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收钱的职业骗子，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样谬论：“更高的税赋和更多的政府开支将使我们更加繁荣”；“要求所有人在经过机场安检时裸体拍 X 光合乎宪法”；“宪法赋予了美国总统轰炸地球上任何国家的权利，而无需首先咨询任何人，特别是国会”；“国父们认为把所有人的自由交到五位终生任期的政府律师手上是个好主意”；“医保社会主义将减少医保花销”；“衰退和萧条都是因为贪婪和‘动物精神’突然爆发造成的”；“资本家们通过销售那些对人有害甚至致命的产品致富”；“如果总统怀疑一些美国公民是‘敌方战斗人员’，他便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去下令杀死他们”；等等。

在他们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用于散播荒谬谎言之后，一个像国会议员荣·保罗这样受过良好教育、雄辩且学识渊博的人的出现，绝对吓坏了“主流媒体”，因为他威胁彻底揭露他们的真面目——骗子和自由社会之敌。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和大多数媒体会对互联网（尤其是那些支持自由的网站）表现出敌意。这些不设防交流的源头，预示着一切国家权力所依赖的谎言帝国将破裂成碎片。

第三部分 集权对自由

第十六章 自由与联邦主义

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被剥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的最重要工具，即联邦主义或州权。州权要么被扔进了忘怀洞[13]，要么被诋毁为种族主义者工具，这绝非偶然。杰斐逊的州权传统，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理解托马斯·杰斐逊为什么信奉“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以及“一种有限宪政的政府的确可行”的关键。自由的敌人始终存在，并且无处不在，他们反对政治上的非集权化，支持政治上的垄断。

州权是什么？

州权的理念与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政治继承人的政治哲学最为紧密相关。杰斐逊本人从未提出过“州拥有权利”这个经常被当成稻草人来打的理念。“州”本身当然是没有权利的；只有个人才拥有权利。杰斐逊理念的精髓在于，如果人民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的主人而非奴仆，那么人民必须拥有控制政府的工具。在杰斐逊主义的传统看来，这个工具便是民众在州层面和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的政

[13] 忘怀洞是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一种文件销毁工具。根据小说的描述，忘怀洞是个带门的大火炉，把文件扔进去，历史就消失了。它是真理部纪录司的重要工具，可以随意“修正”历史。——译者注

治团体。这就是人民如何监督、控制、惩罚、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废除政府的手段。

毕竟，是杰斐逊撰写了《独立宣言》，主张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应人民的同意而生，并且，只要政府侵犯了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有**责任**去废除这个政府并以另一个政府取而代之。人民将像他们在通过宪法时所做的那样，通过各州组织的政治会议来实现这一点。毕竟，在建国先贤们看来，各州应该被视作独立的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是独立的国家那样。《独立宣言》特别谈到它们是“自由和独立”的，就像其他国家那样，独立到足以征税和发动战争。

这便是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的继承者们，19 世纪中期南方民主党人，要举办全州政治会议（以及公投）来决定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国父的自愿联盟里。这也是为什么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在考虑退出联盟，并最终决定反对它时，于 1814 年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举办了政治会议。美国宪法第七条解释到，各州可以根据州级政治会议上来自州内各个社区（而不是各州议会）的代表的投票结果，来决定是否加入联盟，为了遵照《宣言》里的诺言，各州也有权投票脱离政府并成立新政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杰斐逊不仅是美国脱离大英帝国宣言的作者；他根据自己的 1798 年肯塔基州决议案，主张这一理念：州可以否决被视为违宪的

法律，他还相信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是整份文件的基石。杰斐逊是一位“严格的宪法解释者”，相信必须不遗余力地迫使中央政府只掌握由**各州**在第一条第八款中授予它的那些权力。

州权或联邦主义决不意味着州政府的政客就莫名其妙地比联邦政府的政客更道德、更智慧或更清廉。该理念说的一直都是：（1）人民更容易监督和控制离他们更近的政府；以及（2）一个分权的政府体系，包含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州，能为公民提供一条脱险通道，以逃离一个更加集权或垄断的州所施的暴政。假如说，马萨诸塞州变成了一个神权统治的州，那么那些不愿在这种神权统治（或者任何一种神权统治）下生活的公民便可以逃往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或者其他的州。对于杰斐逊主义者而言，州权理念绝不像当代政治科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将各州变成各种政府政策的“实验室”。这会把各州公民当成笼子里的一群实验小白鼠，而这不太可能是杰斐逊本人对自己的看法。

分裂（或分裂的威胁）一直是旨在维持美利坚联盟和宪政政府的可能手段。这种观念认为，如果中央政府明白违宪的法案会导致分裂或否决，他们可能就只会提出符合宪法的法律了。由此，我们有意让否决和这种威胁起到相同的效果。这便是为什么伟大的英国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1866年11月4日（罗伯特·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十七个月之后），对李将军写了如下的话：

> 我在州权中看到了对主权意志的专制唯一有用的检查，并且，分裂给了我希望，它并非民主的毁灭，而是民主的救赎。你们国家的制度【指联盟国宪法】未能为旧世界带来本应属于他们的有益和自由的影响，因为这些缺陷和对原则的滥用正是联盟国宪法要明确且明智地弥补的。我相信，通过建立真正的自由——没有共和体制与生俱来的危险和混乱——这种伟大的改革范例能造福所有的种族。因此，我认为你在为我们的自由、进步和文明而战；我为里士满的失败而悲伤，远胜于我为滑铁卢的胜利而欢欣。

除了把分离权视为人们有效制止暴政政府的“唯一”手段，阿克顿勋爵也提到了这些事情：联盟国宪法删去了美国宪法里的“全民福利条款”[14]；规定了总统任期为一次性的六年；禁止了保护性关税和公司福利[15]（疏浚港口的资金除外）；以及实行一个总体上更为非集权化的政府制度。当然，该体系从未有机会成为现实，因为邦联遭到了在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军队的入侵，并做了国家在那种情况下总是会做的事——征用资源并强化集权以发动防御战争。

---

[14] 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译者注

[15]政府官员以征税人资金对私人企业的补助，通常是透过预算开支的方式，来补助那些与政治人士联系接近的企业。——译者注

李将军明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话，并且与他观点一致。在 1866 年 12 月 15 日的回信中，李将军写道：

> 我考虑到保留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是我们的和平与国内外安全的基础，然而，我也相信维护保留给州与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不仅对整个体制的调节与平衡必不可少，也是延续自由政府的保障。我认为这是稳定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相反，把各州合并进一个巨大的共和国（它必然会对外咄咄逼人，对内专横暴虐）将是这种堕落的确切先兆，这种堕落淹没了在它之前的一切。**

阿克顿和李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有着先见之明：政府权力的集中化是 19 世纪末世界政治制度的标志，并且是整个 20 世纪的人道瘟疫，因为它是接受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

第十七章 否决原则的起源

中央集权政府权力的拥护者看不起杰斐逊的否决原则（nullification）理念。所谓“否决原则”，指的是一州或各州的公民就各条联邦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应该有发言权，并且，在这些法律被视为违宪的时候，他们应该有权在自己的州内否决这些法律。

这个理念在美国的开国先驱中广受拥护，但与此最密切相关的人则是 1798 年《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的两位作者，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应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朋友之邀，杰斐逊撰写了《肯塔基决议》来作为工具，否决约翰·亚当斯总统所实施的令人憎恶的《镇压叛乱法》（Sedition Act）。《镇压叛乱法》有效地使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变成了非法行为。

联邦党人一获得权力，乔治·华盛顿一退休，该法案就实际上宣布了自由政治言论在美国不合法，这显然违背了第一修正案。点燃这种极权主义冲动的火花，是《费城极光报》（*Philadelphia Aurora*）编辑本杰明·富兰克林·巴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孙子）的一篇社论。巴赫是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的追随者，曾公开批判

联邦党在经济上的中央集权计划，即保护性关税、国有银行、公司福利、高税率和巨额公共债务。在一篇社论中，他把约翰·亚当斯称为“年老、易怒、秃顶、眼瞎、瘸腿、没牙的亚当斯。”

艾碧该·亚当斯（Abigail Adams）据说对巴赫对她丈夫的描述感到非常不满，她和一些亲联邦党的报纸开始号召惩罚巴赫。结果便是《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镇压叛乱法》于 1798 年 7 月 14 日生效，并将发表“针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虚假、诽谤和恶意著作”视为犯罪。当然，就像之后所有极权社会的所作所为一样，政府自己将决定什么是不当和违法的言论。这条法律将会在约翰·亚当斯离职以后失效，因此它只能用来针对杰斐逊党的成员和支持者。

许多杰斐逊主义者都很厌恶这种国王般宏伟的招摇表现——亚当斯一家以此著称并对此相当直言不讳。1798 年 11 月，一位名为大卫·布朗的人在马塞诸塞州的戴德姆立起了一根自由之竿[16]，上面写着“不要《印花税法》，不要《镇压叛乱法》，不要《外侨法》，不要土地税，打倒美利坚暴政；和平和总统隐退；副总统【杰斐逊】万岁。”他为此被处以罚款，并被判处监禁 18 个月。

根据《镇压叛乱法》，许多支持杰斐逊的报纸撰稿人都因为批评政府而遭到逮捕。除此之外，联邦党暴民也经常攻击这些同情民

[16] 通常树立于广场，公民们可以在竿子下发表政见。——译者注

主共和党或批评约翰·亚当斯的报社和报纸编辑。在佛蒙特州的议员马修·里昂批评联邦党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与九成选民的利益和意见背道而驰”后，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党国会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德竟然在众议院内用一根山核桃木手杖将他打倒在地。

在里昂在一篇报纸上撰文称亚当斯“对可笑的浮华，愚蠢的谄媚和自私的贪婪有着不受控制的渴望”后，亚当斯政府召开了大陪审团起诉里昂。这位独立战争老兵被迫带着镣铐在自己的家乡游街示众，接着他被关进了监狱。他在狱中再次参选并轻易获胜。

这种专横的行为，促使杰斐逊写下了1798年的《肯塔基决议》。他著名的“决议”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 决议如下：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州，绝不是出于无限服从联邦政府的原则而联合起来的；相反，是在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规定下，出于特殊的需求组成了联邦政府，并在将一些特定的权力授权于联邦政府的同时，保留各州剩下的大量权利。无论何时，当联邦政府行使未经授权的权力时，其行为是无权，无效和无执行力的……通过这一契约组建起来的政府，无权对其所有的未经各州授权的权力做出排他或最终的裁决；因为这会使其用自由裁量权（而非宪法）来裁量其权力；但就像其他契约的情况一样，双方都没有最终裁量权，各方在裁量自身和纠正违规问题上有着均等的权利。

麦迪逊的《弗吉尼亚决议》与此大同小异。当杰斐逊被选为总统后，《镇压叛乱法》被废除了。新总统立即中止了所有进行中的联邦起诉，并赦免了所有被《镇压叛乱法》定罪的人，包括里昂议员。

在杰斐逊的总统任期之内，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利用《肯塔基决议》来否决杰斐逊总统在英国海军为应付对法国的战事而窃取美国货船并绑架美国船员之后实施的贸易禁运。正如詹姆斯·J. 基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在他的《主权各州》（*The Sovereign States*）一书中的描述，1809 年 2 月 5 日，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宣布针对英国的贸易封锁“对本州公民无法律效力”，并且谴责此法案“不公、压迫和违宪”。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和特拉华州都否决了《禁运法案》。

1812 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通过不参与战事有效地脱离了联盟。他们反战立场的政治工具便是否决原则。基帕特里克描述了康涅狄格州议会的声明：

> 不要忘记，康涅狄格州是一个自由的主权和独立的州；而美国是一个联合而非统一的共和国。本州州长有着崇高而庄严的义务，“去维护本州作为一个主权、自由和独立的州的合法权利和基本权利”，正如他“要支持美国宪法”，并且，支持后

者的义务施加了一个附加的义务去支持前者。如果建立在其上的支柱受损或毁坏，整个建筑也无法支撑下去。

这份声明附和了杰斐逊把宪法当做各州之间契约的这种对州权的解释。南卡罗莱纳州否决 1828 年《关税法案》；俄亥俄州反对美国银行企图在该州设立分行；以及威斯康星州和其他几个州政府否决 1850 年的《逃奴法》时，也都接着采用了类似的论证。它绝不像一些不诚实或不称职的历史学家所错误断言的那样，是奴隶主为奴隶制“辩护”而炮制的诡计。

第十八章 七月四日的真正含义

许多美国人似乎对这一事实一无所知：他们最喜爱的假日——七月四日——是在庆祝一次暴力分离行动。“独立日”庆祝的是殖民地从大英帝国中分离出去，这是美国的首次分离战争。

在撰写国家的分离宣言（对大多数人来说叫《独立宣言》）时，美国最著名的分离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写道，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旦这种同意不复存在，人民就有权利和责任“改变或废除”该政府，并“建立一个新政府”。

在杰斐逊总统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进一步为分离权辩护：“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解散这一联邦，或者想改变它的共和体制，我们也不会干扰他们，这样做就为安全树立了标志，表明只要理智能够自由地进行对抗，即使是错误亦是可以容许存在的。”有关分离问题的争论是可以接受的；而在托马斯·杰斐逊的脑子里，并没有使用暴力和政府军队去制止分离的想法。（与此相反，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的**首次就职演讲中，却威胁“入侵”和“血洗”任何企图脱离的州。）

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杰斐逊也从未改变这一观点：作为自由的手段，分离权是重要的。他认为所有美国人，无论地理位置在何处，都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一部分，并且从未考虑过暴力反对任何想脱离联盟的州或地区。在 1804 年 1 月 29 日给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博士的信中，他写道：

> 我们是留在一个联盟里，还是各自建立自己的“大西洋联盟”或者“密西西比联盟”，我认为这对双方的幸福并不重要。在未来，西部联盟的各州也会认同该国，就和我们现在认同这个联盟一样；并且，我预见到未来某天可能会出现分裂，但我感到有责任和欲望像促进东部那样热忱地促进西部的福利，为我们未来家庭的两个部分竭尽全力……

在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为了回应他们强烈反对的路易斯安纳购买案[17]而企图脱离并组建他们自己的联盟的情况下，杰斐逊在 1803 年给约翰·C. 布雷肯里奇（John C. Breckenridge）的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杰斐逊写道，如果真的出现“分离”，那么“上帝保佑他们双方，若留在联盟里对他们好就让他们留下，如果分开对他们更好就让他们分开吧。”

[17] 1803 年美国以 1500 万美元自法国购得大片土地，东自密西西比河，西至落基山脉，北自加拿大，南至墨西哥湾。——译者注

开国元勋们的最初的美利坚联盟是一个建立在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各州的人民的同意之上的自愿联盟。它不是一个通过暴力、恐吓、审查和军事入侵来结合的联盟。**苏维埃**联盟曾经如此，美利坚联盟在 1865 年[18]之后的时代里也**变成了**这样。

[18]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译者注

第十九章 选举美国参议员并非明智之举

民选美国参议员让一小撮富豪得以对政府政策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这是因为赢得参议院选举需要为电视广告、竞选顾问、公关和现代竞选的其他要素募集数百万美元。因此，美国参议员长期以来都处在他们的主要“竞选资助者”——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是美国公民——的控制之下。并且，这些捐助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与参议员所在的州的选民的利益一致。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美国最初的宪法体系要求由州议会来任命参议员。在第十七修正案于 1913 年获得批准之前，参议员并不是民选的。

克莱尔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拉尔夫·罗森（Ralph Rossum）教授在他的《联邦主义、最高法院和宪法第十七修正案》（*Federalism,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Seventeenth Amendment*）一书中，阐述了任命参议员制度的背后逻辑。开国元勋们认为，州议会应该任命参议员，并指导他们如何在国会中投票。这是为了确保参议员不会被特殊利益腐化。罗森教授写道，“在制宪会议和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

中，时常会提到州议会指导参议员的能力，并且人们总是认为这种能力是存在的。”

在纽约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中，《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约翰·杰伊（John Jay）称：“参议院应该由州议会所任命的人构成……我相信州议会会指导参议员们，并且参议员们也会与州行政机关进行定期沟通。”在马萨诸塞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费希尔·艾姆斯（Fisher Ames）称美国参议员是“国家的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45 篇中写道，由于这一任命参议员的机制，美国参议院“既不想侵犯各州的权利，也不想侵犯各州政府的特权”。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62 篇中，麦迪逊进一步写道，任命机制“在联邦政府的形成中，给了各州政府这样一种工具，因为必须保证州政府的权力。”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增强了各州公民作为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的主人而非奴仆的能力。

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州否决《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的时候，由州议会发布的《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指导了各州的美国参议员投票废除了这些法案。当那些承诺忠于自己州议会意愿的参议院违背约定时，参议员的任命机制常常使得他们被迫辞职。为了支持麦迪逊政府实施的贸易禁运（这是州议会所反对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从参议院辞去了职务。在他的州议会反对他与新英格兰的联邦党就一些立法问题进

行合作之后，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大卫·斯通（David Stone）在1814年选择了辞职。在反对他的州议会的指示——反对重新向美国第二银行颁发特许状——之后，缅因州参议员法勒·斯普拉格（Peleg Sprague）也在1835年辞职了。

在美国参议院因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拒绝向银行重新颁发特许状而对其进行“审查”时，七位美国参议员宁愿辞职也不愿贯彻自己州议会的指示：投票删去杰克逊总统的责难。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参议院约翰·泰勒（John Tyler），他在1841年成为了美国总统。

由州议会来任命美国参议员的原有制度，所做的正是人们设计它要做的：限制中央政府的专制倾向。就像乔治·梅森大学托德·茨维斯基（Todd Sywicki）教授在1997年的《克利夫兰州法律评论》（*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中所写的那样，在1913年第十七修正案通过以前，“参议院在维护州政府主权和行动独立的领域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各州议会没有把立法权授予华盛顿，而是坚持把立法权留在自己的手上……结果便是，在第十七修正案通过前的时代里，联邦政府的长期规模保持得相当稳定且相对较小。”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就终结州议会任命参议员的制度并代之以直选参议员出现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改革运动。对那些支持将无

限权力交予中央政府之手的人而言，民主之“神”提供了一个聪明的借口。

第二十章 虚假的美德：对历史撒谎的政治

1961 年，《生活》（*Life*）杂志邀请普利策奖得主，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班底》及 19 部其它小说的作者）在美国“内战”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记录下他如何看待那场战争的意义。沃伦以一篇论“战争的象征价值”的长文作为回应，这篇文章最终出版为一本名为《内战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的小册子。

在政治正确的瘟疫主导美国社会之前，沃伦写道，除了奴隶制扩展到新领地的问题外，1861 年还有“一连串战争的原因”，包括关于分离是否合宪的争论，“南方对北方逐渐增加的债务，经济对抗，南方对包围的恐惧，北方的野心，以及文化上的冲突……”。

罗伯特·潘·沃伦相信，除了奴隶制问题以外，战争还有许多经济上的原因。“1861 年的莫里尔关税实际上早于萨姆特堡的开火，但它是共和党胜利的标志和即将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并且，在后来的四年里，没有哪场国会会议是未能提高关税的。”

沃伦所说的是，一旦北方的人口增长到足以确保在国会中对南方的优势，它就会（通过倾向一方的国会多数）利用这种优势以最

有利于北方制造商的保护性关税在经济上掠夺南方。这发生在萨姆特堡之前；林肯任内十项关税税率的增长，使平均关税税率从 15% 提高到了 50%，这是共和党政策的基础，而非战时融资的举措。这样的税率实际上随着共和党的政治优势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 1913 年启用所得税。

“更重要的是，”沃伦写道，“国有银行体系的建立……国家钞票的发行……加上【对有政治关系的公司的】政府补贴。”“汉密尔顿扩大国债的梦想”也实现了，并且“这些债务意味着一种公民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新税务关系，包括新的所得税。”这一切极大地集中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这当然是战争的影响——如果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的话。

他写道，“由于内战，出现了全面战争（total war）的概念。”他指的是蓄意屠杀数万名南方平民，摧毁整座城镇和城市，以及掠夺数千万美元私有财产（并且，他指的不是“奴隶财产”）。通过引用林肯在 1862 年的演讲，沃伦嘲笑了林肯为屠杀平民“辩护”的蹩脚尝试，在这次演讲里林肯说道，“平静旧日的信条对天翻地覆的今天来说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情况是新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重新行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抛弃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国际法——后者禁止在战争中蓄意谋杀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林肯非法中止了人身保护令，不经审判便大规模逮捕

和监禁了成千上万的北方政治异见人士，关闭了数百家反对派的报社，驱逐反对他的国会议员（俄亥俄州的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操纵北方的选举，非法安排了西弗吉尼亚从弗吉尼亚州分离，并在实质上宣布自己是独裁者，鉴于这些事实，林肯的“重新思考”声明也意味着应该废除宪法本身。

《内战的遗产》一书的主题是战争为（在接下来半个多世纪里垄断联邦政府的）北方留下了“美德的宝库”。沃伦说道，这是战争留给北方的“心理遗产”。他写道，“北方人坐拥美德的宝库，感觉得到了历史的补偿。”“他口袋里的，不是某个中世纪流浪汉所兜售的教皇赎罪券，而是一张赦免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罪恶的赎罪卷，一张无限制的赎罪卷。”

因此，这种所谓的“美德的宝库”让美国政府变得极为傲慢，并将其作为以下事件的万能理由：它在南北战争结束仅仅三个月后便发起了针对平原印第安人的二十五年种族屠杀战争；在“重建”的可笑幌子下在战后对南方人进行数十年之久的掠夺；在菲律宾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后，美利坚帝国将菲律宾人视作障碍而屠杀了二十万菲律宾人；以“为了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名义，参加了与我们美国人毫不相关的一战，等等。这一切都是以美德、自由和民主之名完成的。

罗伯特・潘・沃伦把荒唐的“美国例外论”更准确地描述为了“道德自恋”，这种自恋是“国家政策的一种糟糕基础”。无论如何，它是我们“在 1917-1918 年和 1941-1945 年两次参战，**和我们以‘无条件投降’为口号并对其他国家进行普遍的精神改造的正义外交**”的理由。

为了摆出地球上最道德的人的架势，美国人必须忘记关于自己历史的许多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政府主导下的学校制度要么在课程中删掉这些事实，要么把它们扭曲得面目全非。用沃伦自己的话说是：

> 我们已经忘记，1860 年共和党曾经保证保护南方的奴隶制，并且他们在 1861 年业已准备好将奴隶制在南方合法化，以换取南方留在联邦里。我们已经忘记，在 1861 年的 7 月，参众两院几乎全票肯定了战争本身是为了维护联邦的完整，而不是为了对任何南方州的制度做出干涉。我们已经忘记……《解放奴隶宣言》是受限的、临时的：只有当分离的那几个州在第二年一月一日之前还没有回归联盟，才会在这几个州里废除奴隶制。

此外，沃伦写道，我们肯定还忘了，大多数北方州“拒绝给予黑人投票权”，并且林肯当时是一个比当时所有人都更持有白人优越主义的人。“我们已经忘记，1858 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

敦，曾坚决宣布‘我不打算，也从未打算过，给予白人和黑人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只有在历史书中粉饰好了关于林肯及其战争的真实历史，才能“根据这种美德的宝库学说，把战争视为一次充满正义的自觉运动，以至于天堂中存有足够的余额，像圣徒们的功绩一样，可以抵消参与者后人（当然也可以惠及当代）的所有过错和疏忽。

沃伦进一步引用了历史学家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的话，他评论道，这种所谓的美德的宝库对他的家乡新英格兰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是，“【在内战之后】降生的一代里，该地区再也没有给国家提供过教师和学者，相反，它提供的是一帮杂种政客”，脑子里都是通过自己的政治关系“牟取暴利”。

沃伦说，有了这种过剩的美德，美国人只需要宣布自己的政策意图，甚至不需要再考虑检验这些政策所做的是否是他们所曾诺的（比如，为了民主让世界变安全）。因为“正义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动机如此肯定，以至于他不需要检查后果。”此外，美德的信条会让我们不由自主而笨拙地撒谎……并试图为谎言辩护，欺骗自己并把谎言视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真理。”

罗伯特·佩恩·沃伦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些关于自己历史的谎言，这些谎言是“宣传家们精心操纵的杰

作，有时是违背历史的”。大部分美国人“南北战争是国家力量与威望的源泉”。

自罗伯特·佩恩·沃伦在 1961 年写下这些话以来，谎言像暴风雪中的雪片一般年复一年地堆积。这种基于谎言的傲慢，准确的描述了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外交政策，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例外论”的喧嚣。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通常被称为“鸡鹰”（支持无穷无尽的战争，但大部分人自己却从未服役）的人不过是林肯邪教的正式会员。

第二十一章 林肯神话如何（以及为何）诞生

在 2009 年的《不受欢迎的林肯先生》（*The Unpopular Mr. Lincoln*）一书中，历史学家拉瑞·泰格（Larry Tagg）利用了数以千计的一手文献资料来说明他的观点：**在活着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是至今所有美国总统中最遭人嫉恨和斥责的。但在林肯死后，他却变成了被描绘至今的那种和善的、慈祥的、圣洁的形象。泰格教授解释道，这种“改头换面”是共和党宣传机器的杰作，这得到了新英格兰牧师的大力协助。

至于在林肯活着的时候，北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泰格写道：

> 在林肯的时代，南北双方的大佬们批判他的激烈程度是令人吃惊的。针对他的公然偏见残忍、强烈而无情，其广度和深度都常常是令人惊讶的。很明显的事实是，不仅有许多与林肯先生有私交的人在强烈地唾骂他，成百上千仅仅听说过他的人也在排斥他。

拉瑞·泰格并不是新邦联党[19]。他是伊利诺伊州林肯市的当地居民，并且他在致谢中感谢了著名的林肯学者哈罗德·霍尔泽。泰格继续说道，在林肯在位的时候，因为他“随意逮捕、中止人身保护令和镇压报社”等作为，在北方各州他被广泛地谴责为“血腥的暴君”和“独裁者”。泰格引用了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的言论，称林肯是“一个被当做一等的二等人。”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kroft）则称林肯“无知、任性，并且身边环绕着一群差不多跟他一样无知的人”。

威斯康辛州拉克罗斯《民主党人》报在 1864 年 11 月的社论中宣称要刺杀林肯。“如果这个讨厌的政府让亚伯拉罕·林肯再当四年总统，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位勇士为了公共福利把匕首插进这位暴君的心脏。”《纽约时报》在 1864 年 5 月的社论也同样严厉：“没有活人曾像亚伯拉罕·林肯这样被指控了如此众多、如此巨大的政治罪行。他被无穷无尽地谴责为一个作伪证者、一个篡位者、一个暴君、一个颠覆宪法者、一个祖国自由的破坏者、一个不计后果的亡命之徒、一个不顾奄奄一息的国家的最后垂死挣扎的没有勇气的不务正业者。”纽约时报继续说道，在地狱里都没有地方“有足够的痛苦来赎清他的罪孽。”

[19] 主张把南部从美国再度分离出去。——译者注

在《不受欢迎的林肯先生》里，最有趣的章节莫过于题为“突如其来的圣人”的最后结语。泰格教授在这里解释了共和党是如何在新英格兰牧师的协助下，凭空创造出林肯“神圣”和“受人爱戴”的神话的。对他们来说，刺杀行动可谓天赐良机，因为这让他们有了机会通过把他们的大政府政治议题绑到即将被神化的林肯身上来神化这些议题。就像泰格所解释的，共和党“把林肯的死亡视为宣传上的意外之财——林肯可以被塑造成代表北方，代表自由……”他引用了爱荷华州参议员詹姆士·格莱姆斯（James Grimes）的话，称共和党神化林肯的宣传行动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在那之后不可能再谈论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真相了。”

泰格教授解释道，决定把林肯的葬礼作为大规模宣传工具的人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他“让烈士的遗体成了一次对南方的邪恶的巡展”。葬礼游行的路线长达 1600 里，并且，斯坦顿禁止任何人掩盖行刺的子弹所造成的损伤，以便让遗体尽可能看起来阴森可怕。

许多几个月前还在唾骂林肯的新英格兰牧师也参与其中并神化林肯。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可以说是这些人中最大的伪君子了。泰格写道，多年来他一直在布道坛上恶毒地攻击林肯，但在林肯死后，他“对林肯只有溢美之词。”

共和党也继续使用着凶狠的策略，它曾在战争期间用这些招数来恐吓北方民众。泰格写道，“民主党的各种出版物迅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为其反对林肯而忏悔的话，他们就会面临被暴民们（就像在战时第一个夏天烧毁他们办公室的那些人）摧毁的风险。”

共和党的暴民大军也在竭尽全力地限制北方的言论自由，就像他们在战争期间所作的那样。一位林肯葬礼的围观者因为“为杰佛逊·戴维斯叫好”而“被送葬队伍袭击并几乎被撕成碎片”。一位芝加哥人被人无意听到在酒店大堂里说“林肯活该”，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立即枪杀。泰格称，但是“并没有逮捕人，没有人想逮捕”开枪的人。

泰格指出，在北方到处都有美国人因为类似的声明而被关押。“在每个城市，那些对林肯的死讯欢欣鼓舞的人，一经发现都被丢进了当地的监狱。”一份马里兰州报纸的编辑“在发表了对林肯的批评之后被一个暴民杀害。”共和党暴民的流动打手从一家反对派报社流窜到另一家，就像他们战时在北方所做的那样，并“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将报社的东西全部丢到大街上。”

几代人以来，反对共和党的媒体被迫成为政府的传声筒。在“重建时期”，北方的军事占领者命令南方的官员表达神化林肯的训诫，许多南方报纸也被命令这样做。泰格教授写道，违抗这些命

令意味着“没收财产和投入监狱的恐怖”。毫不奇怪，在整个南方就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林肯的崇高形象”。

这就是林肯的神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通美国人对这个国家最臭名昭著的总统几乎一无所知。

第二十二章 中央集权的逆向淘汰

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暴君都是州权、联邦主义和分离的主权的敌人。暴君们对垄断的政治权力情有独钟，而如果人民可以有避险途径的话，垄断的政治权力绝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人想用独裁的权力统治社会，就必须摧毁异见者并废除催生异见者的途径。和 20 世纪的其他暴君一样，阿道夫·希特勒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这一观点。在 1999 年马里纳–霍顿·米夫林版《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第 566 页，希特勒附和了林肯、汉密尔顿、斯托里、马歇尔和韦伯斯特的观点，他写道：

> 美利坚联盟的各个独立州……并没有属于其自己的独立主权。因为并不是这些州组成了联盟，相反，是联盟构成了这些被称为州的部分。

这是希特勒在重申林肯在 1861 年 3 月 4 日的首次就职演讲上所表达的观点，当时林肯说道：

> 联盟比宪法早得多。事实上，它是通过 1774 年签订的《联合条款》组成的。通过《独立宣言》……1778 年的《邦联条款》 ……以及制定《宪法》，它得以成熟和延续。……从这

> 些观点我们可以随之得出，任何一个州，都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动议，便能合法地退出联盟。

希特勒写下这些文字的背景，是想为他自己废除德国各联邦州的权利辩护，他很自然地参考了林肯异常而反历史的理论来支持他自己的例子。

希特勒嘲笑了被他称为德国的各个“所谓的主权联邦州”，因为它们“无能”而“分裂”，阻碍了德意志帝国的中央集权之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都很清楚这种“碎片化”是让自由免于暴政的重要源泉。欧洲人开始逐渐通过政府集权慢慢消灭这种宝贵的自由，而希特勒也想通过把整个欧洲变为一个由他自己管理的大“德意志帝国”，来加快这一过程。

希特勒赞扬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通过逐步削减德意志各联邦州的主权并使德国政府中央集权化，证明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伟大”。希特勒写道，这是最令人感到高兴的一步，因为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恐怕正受到“犹太人在 1919 到 1921 年及后来……精心挑起的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威胁。

他进一步谴责联邦主义是“各主权州的联盟，这些州根据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禁用了他们自己的主权权力”，以此来放弃一部分——但并非全部——主权以结合成一个“公共的联邦”。这准确

地描述了最初的美国州权或联邦主义的宪政体系，而希特勒极力反对它。

希特勒写道，俾斯麦很好地破坏了德国联邦主义和独立州权的大部分残余，但他做得还不够。“为其生存，本国（德国）在今天有义务一步步缩小各独立联邦州的州权，这不仅仅是出于一般物质的考量，也是出于理想的考量。”希特勒写道，因此，“得出了一条基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准则，那就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德意志帝国。”

阿道夫·希特勒随后宣称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论断：“无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其组织内部都在朝着某种统一发展。在这一点上德国也不例外。在今天，论及各省的‘联邦州主权’是十分可笑的。”他把联邦主义的观念谴责为“肮脏的党派利益”的杰作，此外，他还许诺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将完全彻底消灭各联邦州的州权：

> 由于对我们而言，国家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本质在于其内容：民族与人民，所以显然所有事都必须服从于国家的主权利益。尤其是，我们不能授予民族内的任何单个联邦州和代表民族的联邦州以联邦州主权和关于政治权力的主权。

希特勒要求，“单个联邦州的胡闹……必须停止。”他写道，未来的德国，单个联邦州将不再参与“国家权力和政策制定”。希特勒同时预言，“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会在“某一天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主人”，这“将重塑一个民族的生活”。人们将成为国家的仆人，而不是其他的关系。希特勒相信，唯有首先废除德国联邦州的州权，方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十三章 政府造成的死亡：缺失的一章

近年来，学者们试图记录下 20 世纪期间，各国政府对本国国民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的程度。这些记录并非是对战争死亡人数的估计，相反则是政权针对异见者谋杀的数字。目前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社会学家 R.J. 拉梅尔（R.J. Rummel）的《权力会杀人》（*Power Kills*）和《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以及几位法国学者所撰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拉梅尔教授所说的这种杀戮人民（democide）[20]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灭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所有反对者。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在俄罗斯，“那些抵制（把他们的财产）集体化的富农被枪毙，其他的则被流放”。在乌克兰的农民抵抗时，斯大林制造了一场大饥荒，在几个月内杀死了大约六百万人。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人的政权也犯下过类似的罪行。在每个案例里，所有大屠杀的原因都是为了消灭中央集权政治权力和中央集权计划整个社会的反抗者。

[20] 这个词是拉梅尔自己创造的，“demo”这个词根表示“人民”，而“cide”则表示“杀死”。——译者注

《共产主义黑皮书》估计，苏联至少杀害了两千万本国公民；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杀死了六千五百万人；越南的社会主义者谋杀了一百万人；北韩杀死了两百万人；在东欧有一百万人丧命；拉美十五万人；非洲一百七十万人；阿富汗一百五十万人。除此之外，拉梅尔教授估计，纳粹政权杀害了两千一百万平民。

在《权力会杀人》一书中，拉梅尔教授写道，当这种“杀戮人民”的政权的政治权力“与某种像社会主义这样的专制意识形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这些政权往往会对本国民众更加心狠手辣。他写道，并且，当这些政权的领导人发现一个社会群体的持续存在与他们的信念和目标无法相容时，他们的极权权力使得他们有能力摧毁该群体。根据拉梅尔教授的看法，战争或叛乱时常能为这种“杀戮人民”提供方便的借口和掩饰。

根据这一推理，我们发现在关于“杀戮人民”的文献中，存在明显的疏忽，即由于林肯政权在 1861 至 1865 年间入侵并发动全面战争，导致三十五万以上南方各州民众遇害。历史学家在很长时间里都将南北战争的死难者定为三十万左右，而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则加上了因战争而死的五万南方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儿童。一些历史文献的全新估计则称，真正的遇难者数字接近四十五万。

林肯从未承认南方各州已脱离联盟，从未承认分离行为的合法性。他声称，南方各州的分离不过是一小撮吞火人（fire eaters）[21]的“叛乱”，因此不具有合法性。他一直认为，每个南方人——从罗伯特・E.李到普通自耕农——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因此，他发动的是一场针对本国国民的全面战争，符合拉梅尔教授所定义的杀戮人民行动。

南方人所拒绝的意识形态是“神秘”而永久的联盟，如林肯所说，这个联盟是永远不能退出的。南方人相信的联盟是出于自愿的，各个自由而独立的州拥有主权，它们有权选择加入或不加入联盟。林肯是一个超级民族主义者，对此持反对意见，愿意使用国家武力屠杀成百上千的本国公民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1861 年美国的人口大约是 21 世纪初的十分之一。若按照今日的人口来算，在南北战争中死亡的南方人口相当于今天的三百五十万人。这使得林肯政权比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还糟糕许多。如果四十五万左右南方人死亡的新估算得到认可，林肯政权在杀戮人民上的糟糕程度，将两倍于波尔布特和北朝鲜共产主义者，四倍于越南共产主义者。

[21] 在美国历史里，吞火人是一群激进的南部奴隶制拥护者，他们希望把南方各州分裂为一个新的国家，即美国邦联。这个群体的领袖是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瑞特。 他们谋求重新开放国际奴隶贸易，而这自 1808 年以来是非法的。——译者注

第二十四章 美帝国主义的诞生

在约翰·登森（John Denson）编辑的《战争的成本》（*The Costs of War*）一书中，历史学家约瑟夫·施特龙贝格把 1898 年的美西战争称为美利坚帝国的一次“试车”。这场战争与国家防务毫无关系，纯粹是美国政府的一次帝国主义行径——它使得美国政府获得了对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权。这场战争让已故的 19 世纪知名自由主义学者，耶鲁大学的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撰写了题为《西班牙征服美国》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描述了战争如何导致美国从一个宪政共和国蜕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就像它在战争中击败的老牌西班牙帝国那样。

萨姆纳也预言了将要发生什么，以及美国的今天：世界警察——在一百多个国家有军事存在，并无休止地介入地球上每个人的事务。他在《战争与其他文章》（*War and Other Essays*）中写道，

> 有人告诉我们，为了保证加利福利亚州的安全，我们需要夏威夷。为了保证菲律宾的安全，我们该需要什么呢？……为了“保证”我们所控制的领土的安全……我们应该需要占领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显然，这意味着……为了保证在地

球上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安全，我们必须占领整个地球，谬误就这样暴露了。

施特龙贝格对美西战争作为美帝国主义“试车”的重要性的分析是敏锐的，但是，真正的试车早在三十年前，在施特龙贝格所说的美国政府对“国内独立民族”（即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就已经发生了。这场战争通过把印第安人妖魔化为“野兽”；通过对所有人和物（包括妇女、儿童和动物）的大屠杀；通过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为美利坚帝国主义设置了真正的样板。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防止南部独立的战争本身就是对平原印第安人二十五年战争的“试车”。

谢尔曼的灭绝战

防止南部独立的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发起了一场争对平原印第安人的新战争。1865 年 7 月 27 日，仅仅在战争结束的两个月之后，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便收到了美国五大军区之一的密苏里军区的指令。美国政府从未试图隐瞒这一事实：对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是在间接补贴受政府资助的洲际铁路。铁路公司是共和党的财政支柱，后者在 1865 至 1913 年间基本上垄断了美国的政治——从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著名铁路工业律师/说客，中伊利诺斯铁路公司的亚伯拉罕·林肯胜选开始。

谢尔曼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战争一结束，“我的思想感情就立即回到了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上……我投身于与铁路建设各方的交流，亲自拜访他们，并且，我向他们保证，我将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鼓励。”迈克尔·费尔曼（Michael Fellman）在《公民谢尔曼》（*Citizen Sherman*）一书中，引用了谢尔曼在 1867 年写给尤利西斯·S. 格兰特的信，信中写道：“我们绝不会让几个贼头贼脑、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阻止和停下我们（建设铁路）的脚步。”

在《倾听寂寞的汽笛声》（*Hear that Lonesome Whistle Blow*）一书中,迪·布朗（Dee Brown）写道，林肯的老友格伦维尔·道奇（Grenville Dodge）被任命为将军，他最初建议将那些印第安人变为奴隶，以便能强迫他们给爱荷华州到加利福利亚州的铁路挖路基。政府却决定尽量杀死印第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然后将剩下的幸存者关押到被（委婉地）称为“保留地”的集中营里。

在格兰特成为总统之后，他把他的老友谢尔曼任命为美国军队的元帅，并任命另一位“内战”英雄菲利普·谢里登将军指挥西部战场。费尔曼写道，“因此，联盟内战三巨头努力制定并通过了对印第安人的军事政策，直到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成了谢尔曼有时称之为‘印第安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方案”。其他一些前联盟军官也加入了屠杀。其中包括约翰·波普、奥利弗·霍华德、纳尔

逊·迈尔斯、阿尔弗雷德·特利、爱德华·奥德、克里斯托弗·阿古尔、爱德华·坎比、乔治·阿姆斯特朗·坎斯特、本杰明·加里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特。

《谢尔曼：一位士兵对秩序的热情》（*Sherman: A Soldier's Passion for Order*）的作者约翰·马扎拉克写道。“谢尔曼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与他对战争期间顽抗的南方人，以及对战后获释的南军战俘的看法一样：一个秩序社会合法力量的抵抗者。”马扎拉克继续写道，“美国内战期间，谢尔曼和谢里登将军对南方实施了摧毁财产的全面战争……如今，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这支军队时常彻底地毁灭印第安人的村庄……谢尔曼坚持认为，对印第安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全面的战争——就像他对邦联所用的那样。”

《谢尔曼：一名士兵的人生》作者李·坎特写道，谢尔曼、谢里登、格兰特和其他“内战英雄们”都认为，印第安人是次等人，在种族上比白人差，他们经常用这种信念来为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辩护”。谢尔曼还相信，如果不能受到白人严格管治的话，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将会沦为“野兽”。他写道，“印第安人清楚地展示了那些不再受白人控制的黑人的命运。”费尔曼写道，谢尔曼寻求“对美洲大陆进行种族净化”。谢尔曼宣称，“所有印第安人要么被我们杀死，要么作为一个赤贫的种族保留下来”。费尔曼用文件证明了，谢尔曼“预先授权谢里登在他和他的下属们袭击印第

安人的村庄时，如果感到有必要，除了男人，还可以尽可能地屠杀妇女和儿童。”

谢尔曼和谢里登的部队对印第安人的村庄发起了一千次以上的袭击，大多数是在一家团聚的冬天里进行的。他们命令士兵杀死所有人和包括狗在内的所有动物。他们甚至对美洲野牛发动了消灭战，因为它是印第安人主要的食物、冬衣和其他物品（印第安人甚至用野牛骨来做鱼竿）的主要来源。

“印第安战争”实际上**延续**了林肯政府在防止南部独立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灭绝政策。一次最早针对印第安人的攻击是臭名昭著的 1864 年 11 月沙溪大屠杀。在科罗拉多州南部的沙溪有一座夏安人和阿拉帕霍人的村庄，美国政府曾保证这座村庄会是安全的。但是，另一位联邦军“英豪”约翰·奇温顿上校执行了政府践踏这一承诺的计划。S.L.A. 马歇尔（S.L.A. Marshall）著有三十本关于美国军事史的著作，他在《血色草原：印第安战争》（*Crimsoned Prairie: The Indian Wars*）一书中描述道，奇温顿命令他的部队：“我希望你们杀死所有的印第安人，剥下他们的头皮，不论大小；不留后患。”

马歇尔描述了部队是如何“在奇温顿……的旁观与批准下，开始一整天血腥、疯狂的屠杀、劫掠和破坏”的。当奇温顿回到丹佛时，奇温顿“和他的入侵者们，挥舞着战利品——超过一百张印第安人头皮——绕着丹佛城展示了一圈。他们被誉为攻城略地的英

雄，这正是他们追求的。”一家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报纸赞扬道，“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一次载誉而归。”

迪·布朗著名的《葬我心于伤膝河[22]：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史》（*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一书给出了沙溪屠杀中一段更令人恶心的描述。“当部队走向【一群印第安妇女】，她们跑出去让士兵们看到她们是一群妇女并请求宽恕，但士兵们把她们全部射死了……这是一场对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无差别屠杀……印第安妇女们没有抵抗。所有人……都被剥掉了头皮。”

当谢尔曼的“最终解决方案”终于实现时，这种消灭战或种族灭绝已经在 1865 至 1860 年间重复了数百次。1868 年，印第安事务局负责人托马斯·墨菲这样评论卡斯特（Custer）对印第安妇女和儿童的屠杀：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耻辱，一场无与伦比的不公，一场充满反抗的国家犯罪，无论多久，这场屠杀必将令我们或我们的后人面临上帝的审判”（引自迪·布朗《葬我心于伤膝河》）。

卡斯特将军认为他下达的“杀死或吊死所有战士”的命令对他的士兵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把他们和老人、妇女和儿童分开”（引自迪·布朗《葬我心于伤膝河》）。所以，他

[22] 1890 年 12 月，美国陆军在南达科塔州伤膝河战胜了印第安人，史称伤膝河大屠杀，这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结束。——译者注

决定杀死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马歇尔曾是二战欧战战场的美国政府官方历史学家，他把谢里登对卡斯特的命令称为“对美国部队所下达的最残忍的命令”。人们相信谢里登曾说过“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这是谢尔曼和格兰特（御用史学家们最近在可笑地把他描绘成种族英雄）都赞同的政策。

人们常常用这些“内战英雄”在阿波马托克斯[23]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野蛮行径，来为美军在 1899-1902 的菲律宾反美帝国主义战争中大屠杀成千上万菲律宾人的行为“辩护”。为了替这场大屠杀“辩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菲律宾人称为“野蛮人、杂种、一个未开化和无知的民族。”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自己都没办法说这么好。

[23] 阿波马托克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旧村庄，位于林奇堡附近，1865 年 4 月 9 日南军的李将军在此向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投降，从而结束了美国南北战争。——译者注

第二十五章 保罗·克鲁格曼政治正确的“内战”妄想

在 198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詹姆斯·M. 布坎南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第一件事，便是这个奖“并没有让我在所有事情上都立即成为专家”。布坎南充分注意到——并且惊讶于——之前的一些获奖者出尽了洋相：他们把奖项看成一种能让他们对一切事物夸夸其谈的许可，而不管他们是否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

最近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就没有布坎南的这种谦逊和务实精神。作为一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经常做所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都会做的事——假装他的确无所不知。一个例子便是他在 2012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博客上的《通往阿波马托克斯之路》一文。在提到了《时代》杂志的一篇博客对开战 150 周年纪念特别“不友好”之后，克鲁格曼对“内战”进行了一番滑稽的、小学生般的“演绎”。

克鲁格曼声称，他一直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象征意义” 着迷，“李作为贵族身着军礼服，”相比之下格兰特将军“由

于策马疾驰而泥泞不堪、衣冠不整。”克鲁格曼显然不知道，在1860年战争的前夕，罗伯特·E. 李正在担任美军军官的第三十二个年头，主要担任的是军事工程师。他很难说是一位“贵族”或统治阶级成员。相反，格兰特却是他富有的岳父名下一片850亩的奴隶种植园的监工。这座坐落在圣路易斯的种植园名叫“白色避风港”（听起来这名字或许是三K党起的），今天这里则是一座国家公园。（在“白色避风港”的网页上，国家公园管理处委婉地把格兰特称为奴隶种植园的“管理者”，而不是用在历史上更准确的词“监工”。）

在1862年，李遵照他岳父的愿望，释放了他妻子所继承的奴隶们。直到《1865年密苏里解放奴隶法》迫使他们解放奴隶之前，格兰特的岳父在白色避风港的奴隶都没有被释放。与“全知”的克鲁格曼的主张相反，李将军在正式投降前换装的这一事实并不会把这位服役三十六年的老兵变成一位“贵族”。

克鲁格曼接着声称，北方在战争中的胜利，是“擅长和平的一方”在“礼数上”的胜利。事实并非如此。北方“擅长”的其实是发起针对南方民众的全面战争。林肯政府制定了第一部联邦征兵法，接着命令数千名北方人在野蛮而血腥的拿破仑式突击——这场战争的特征——中送死。当数万名北方人逃跑时，林肯政府开始每天公开处决逃兵。当纽约人为了抗议征兵而发起暴乱时，林肯派了

一万五千名士兵进城，他们杀害了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征兵草案的抗议者。[24]林肯同时也招募了数千名欧洲雇佣兵（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说英语），把他们武装起来送往南方，以此来告诉詹姆斯·麦迪逊、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后人们，身为一个美国人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传记的作者李·坎特记录了无数林肯新兵被以抢劫、掠夺和强奸的罪名而遭到特别起诉："来自纽约的军团……充满着一股大城市罪犯和旧欧洲监狱里囚犯的气息。"[25]

北方对南方平民发起的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屠杀了超过五万名南方平民。北方轰炸了像亚特兰大这种只有平民的城市数日之久，而北军士兵则在南方各地奸淫掳掠。克鲁格曼先生，这确实是"和平的艺术"。

若真如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北军在南北战争中以"谋略"取胜的话，那就让我们看看事实吧：当新奥尔良的妇女拒绝对那些占领他们的城市，屠杀她们的丈夫，子女和兄弟的北军士兵们下跪时，野蛮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下令将整座新奥尔良的妇女掠作慰安妇。巴特勒在 1862 年 5 月 15 日下达了第 28 号军令，称"北军的士兵和军官，受到了新奥尔良妇女……反复的侮辱。因此从今日起下令，凡是在言辞，举止和行为上侮辱任何北军军官及士兵的女

[24] 参见 Iver Bernstein,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25] Lee Kennett, *Marching Through Georgia*.

性，其将承担沦为慰安妇的风险。”巴特勒的命令很大程度上是对妇女强奸的许可令，因此全世界的舆论都在谴责他。这就是巴特勒猪狗不如的“谋略”。

克鲁格曼在他的博客中庆祝南北战争是“民主国家（北方）的胜利”，但战争期间的北方几无民主可言。林肯非法中止了人身保护令，将数千名北方政治反对派未经审讯即投入大牢；林肯当局关闭了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报纸，将批评他的俄亥俄州议员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驱逐出境；罗杰·托尼因对林肯中止人身保护令“违反宪法”的批判意见，而被林肯威胁关进监狱；同时林肯对所有电报进行审查，非法操纵选举；将参选马里兰州议会的代表，巴尔的摩的议员亨利·梅，以及巴尔的摩的市长抓进监狱；非法策划了西维吉尼亚州的分离以令共和党多得到两个席位；违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非法没收了边境州份的合法枪支；以及签署了宣布南方为“叛乱”的法令从而非法入侵南方州份。 因为“叛乱”的定义仅限于发动针对合众国的战争，或是在合众国与敌国的战争中援助敌国[26]，所以这一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

克鲁格曼在这个意义对民主的看法是对的：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大型的有组织霸凌行动，较大的团体欺负较小的团体，以便用税收来掠夺它。“南北战争”证明，当较小的团体不堪重负想要离开

[26] 由于南方州宣布自己主动分离，所以不构成叛乱。——译者注

的时候，较大的团体会采取一切办法——甚至是屠杀数万人、轰炸和焚烧整座城市——来阻止他们离开。林肯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讲中，使用了“武力”、“侵犯”和“血流成河”的词藻来威胁那些拒绝缴纳（两天前刚刚翻倍的）联邦关税的州。林肯不仅发出了威胁，并且最终将威胁付诸实行。克鲁格曼在博客里说道，这就是“我信仰的那种国家”。

第二十六章 大暴君

亚伯拉罕·林肯宣誓就任为第十六任总统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声明，毫无疑问是一次对奴隶制的辩护："对于那些存在奴隶制的州，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它们的这一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利，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他接着援引了 1860 年的共和党纲领，这份纲领基本上说了相同的事情；他保证自己会"在精神上毫无保留地"支持宪法的逃奴条款；他还支持过将**永远**禁止联邦政府干涉奴隶制的拟议宪法修正案（"科文修正案"）。事实上，正是林肯指示威廉·苏厄德[27]负责保证"科文修正案"通过美国参议院——它通过了（众议院也一样）。

在同一次演说中，林肯保证：任何一个拒绝对进口商品征收联邦关税（仅仅在就职典礼的两天前就翻了不止一倍）的州，都会遭到军事入侵并"血流成河"。他继续说道，"我们不需要流血或者暴力，也不应该这样，除非国家当局被逼如此。"就这样，在宣誓保护美国公民宪法自由的几分钟后，林肯就威胁要组织谋杀这些公民中的许多人。

[27] 他曾在 1861 年至 1869 年担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林肯究竟在说些什么？什么会导致一位总统对本国公民——他刚刚才宣誓要保护这些人的自由——发动战争？林肯在下一句话里作出了解释："授予我的权力将用于持有、占有和拥有一切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土地，并且**征收各种关税和税款**；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行动之外，不会有侵略，不会在任何地方对人民或在人民之间使用武力。"他承诺，为了收税会谋杀美国公民。

在林肯心里，实现他的政党选他来做的事情是必要的：颁布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把公共土地主要赠送给采矿、铁路和伐木公司，把大量公司福利慷慨赠予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这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老式"美国体系"，它被林肯的辉格党和最后的共和党坚持了数十年之久。绝大多数南方议员数十年来一直在强烈反对这一切。但现在，大概是林肯认为，为了税收，必需强迫他们接受它（当时，进口关税占全部联邦税收的 90%以上）。

需要强迫南方人（以及北方人）为这个公司福利帝国买单，共和党希望能让这个帝国当权几十年。（它做到了——共和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基本上垄断了国家政治。）这就是为什么在林肯和共和党的心中，必须发生一场战争。他们完全愿意把奴隶制明确写入宪法，但在征收刚刚翻倍的关税上，他们绝不妥协。

这也是为什么必需野蛮镇压北方的反战派，他们的确镇压了，并发明了一套"国家统一"的神话。历史学家威廉·马弗尔

（William Marvel）在他的书《林肯最黑暗的一年：1862 年之战》（*Lincoln's Darkest Year: The War in 1862*）中讲述了许多关于共和党如何参与一场斯大林式政治镇压的故事。（马弗尔是一位著名的林肯学者，林肯奖和道格拉斯·绍舍尔·弗里曼奖得主。）

马弗尔写道，共和党的首个政治欺诈行动是开始把像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杰西·布莱恩（Jesse Bright）这样的人踢出美国参议员的行列——他"对亚伯拉罕·林肯对南方的战争缺乏热情"。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年里，布莱恩参议员就"认识和钦佩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同伴】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共和党利用这个借口，指控布莱克参议员（参议院里最资深的成员）"反动叛国"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将他驱逐出参议院。

《国会环球》（*Congressional Globe*）[28]宣传道，"只有叛徒才会倡导和平"，而北方公开依附于共和党的报纸（在那段时间很常见）引用了这一说法。至于那些不支持对自己的美国同胞发动战争的北方报纸，政府已经开始"通过停止分销、收缴设备和逮捕出版商，消除……最有效的批评。在 1861 年夏天，工会暴徒联合起来压制言论自由，破坏了各家反战杂志的办公室并攻击了各位编辑。

[28] 美国国会的官方会议记录，1873 年后叫做《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还曾经叫过《美国国会的辩论和会议记录》（*The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国会辩论记录》（*Register of Debates in Congress*）。——译者注

马弗尔讽刺地写道，即便是“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29]的孙子，也明白在那片‘自由的土地’上说出不受欢迎言论会有多危险”。这位《星条旗》作者的孙子当时是巴尔的摩一家报纸的编辑，尽管并没有发言批评林肯当局镇压言论自由的行为，还是被暴民们抓了起来“扔进了一座沿海要塞的大牢里”。

“当时主导美国参议院的党派，试图【按照共和党的政治议案】把严肃的异议正式确定为叛国罪。”在布莱特参议员离职后，“大老党”[30]的领导者们便“希望一天尽早结束，以便准备一个盛大的派对——玛丽·林肯对这个派对已经朝思暮想几个礼拜了”。马弗尔写道，白宫的雇员很快便开始称林肯夫人为“美利坚皇后”，根据一名参议员的说法，她参加这场派对时“看起来像戴着一个花盆”。马弗尔写道，许多参加聚会的将军、海军上将、最高法院法官和外国顾问都认为，林肯是“一个粗俗的乡下人，要么缺乏诚意，要么缺乏政治家的品德”。

都不需要修改宪法，共和党就在 1861 年给“叛国罪”发明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对林肯和共和党而言，“叛国罪”就是指反对**他们**。这与美国宪法第三条[31]第三款对叛国罪的确切定义大相径庭：“对合众国（United States）[32]的叛国罪只限于同**它们**作战，或依附

[29] 美国作家，代表作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他也是美国国歌《星条旗》（歌词中含有“自由的土地”）的词作者。——译者注
[30] “大老党”（Grand Ole Party）是共和党的别称。——译者注
[31] 原文误写成了第一条（Article I）。——译者注
[32] “United States”的字面含义是“联合的各国”，因为美国的“State”在中国一直被误叫做“州”，又可以被称为

其敌人，给予其敌人以帮助和鼓励。”所有的建国文档都表明，“合众国”是由各个自由且独立的州（《独立宣言》就是这么称呼它们的）为了它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而组成的一个紧密结合的联邦。中央政府是**它们的代理人**。

宪法中的“叛国罪”仅限于同“它们”（即各州）作战。这正是林肯和共和党在做的。他们对南方的战争正是美国宪法对叛国罪的定义。早在乔治·奥威尔的时代之前，他们就把这个词的意思扭曲得与开国元勋们想指的意思截然相反了。作为宪法所定义的叛国罪罪犯，他们指控**他们的政治反对者**——那些反对同各州作战的人——犯有叛国罪。

马弗尔写道，在就任为林肯的战争部长的当天, 埃德温·斯坦顿“就将演练一种冷酷、独裁的行为”，因为他开始实施叛国罪的新定义。美国政府没有为其战争招募到足够的士兵，尽管它提供了高达 415 美元的征兵“赏金”。尽管极权主义在镇压北方的反战报纸，但在北方的各大城市中，仍然普遍存在对战争的口头反对。马弗尔写道，因此，斯坦顿在 1862 年 8 月 8 日“单方面废除了”言论自由。斯坦顿颁布了一项征兵政策，“任命了一名特别军事审判员来处理异议人士，并对地方和联邦的法律官员发出指令，要求监禁任何‘可能通过行动、言论或书面参与阻碍志愿征募，或者以任何

“联合的各州”。——译者注

方式援助和支持敌人’的人……”。这个命令的模糊性使得政府可以监禁任何说林肯、共和党或他们对同胞公民的战争坏话的人。

马弗尔写道，“有了新鲜血液，主要是共和党背景的美国将军们，开始以‘口头反对总统政策，阻碍自愿参军’的理由，逮捕那些不满的人——几乎全是民主党人。”任何胆敢批评“大老党”的报社作家都会遭到严厉的对待。“在 1861 年 8 月……一群花岗岩州[33]士兵攻击了【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一份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并摧毁了他们的办公室。”“在 8 月 14 日，《迪比克先锋报》（*Dubuque Herald*）的爱尔兰裔编辑丹尼斯·马奥尼……被爱荷华州的美国法警 H.M. 霍克西——共和党州长塞缪尔·柯克伍德（Samuel Kirkwood）的朋友——逮捕。马奥尼几个月来一直在宣扬和平……”“在监狱里，马奥尼见到了艾奥瓦州费尔菲尔德《宪法与联盟》（*Constitution and Union*）的编辑戴维·舍伍德。”“伊利诺伊州的报纸编辑，一些伊利诺伊州法官和一些其他知名反对派被逮捕到华盛顿”，在那里他们被扔进了“旧国会监狱”。显然，来自“林肯之地”的当局批评者必须被关在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特别仔细的看管。

那些依附于共和党的报纸“对当局近期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幸灾乐祸”，这充分说明了在 19 世纪 60 年代把持共和党的恶棍们腐

[33] 新罕布什尔州的别称。——译者注

朽、极权的心态。马弗尔描写了整个北方的“杰出民主党人”如何因为这样的事而被关进监狱的：建议选民投票给和平候选人；嘲笑当地的“家庭保安”公司；或者对林肯做出“尖刻的”评论。

甚至有竞选国会的民主党人在选举日之前被关进监狱，威廉·J. 艾伦便是一例，他是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和平民主党人”，他“因为在一场竞选活动中所表达的观点，在八月中旬的疯狂镇压中被关进牢房”。艾伦当时正在准备连任选举。他的许多民主党同僚“直到在秋季的选举结束前都未【从林肯的劳改营里】获释”。其中一些人甚至一直呆在监狱里，“直到他们放弃了起诉逮捕他们的官员非法监禁的权利”。马弗尔写道，数千名北方公民“感到一些警长或宪兵司令的手正抓着自己的肩膀”（形象地说）。

共和党暴徒不过是在殴打**和谋杀**不同意“大老党”阵线的北方平民。马弗尔说道，一群“【堪萨斯州】特洛伊镇的共和党志愿者用力殴打了一位公民，他们憎恨这个人的政治言论。”“政治仇恨导致另一个人在密苏里州东南部遭到谋杀。”当地依附于共和党的报纸社论赞成谋杀，写道该男子“没有权利”通过主张和平“不忠于政府”，把共和党和“政府”等同起来。这篇文章还指出了其他几位当地公民，他们可以是“可接受的目标”。这就是“大老党”的起源。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数十万的北方男人将被征兵所奴役；数十万欧洲雇佣军将领着薪水向南方各州的美国人发动战争；数百份反对派报纸将被关闭；一名反对的国会议员，俄亥俄州的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将被驱逐出境；纽约市数百名征兵抗议者将在街头被联盟军士兵枪杀；整个宪法将被忽略。

马弗尔写道，所有这些“反征兵、反战，反当局的情绪”导致共和党形成了“秘密社团”，这将在战后年复一年地产生大量的亲共和宣传。“联盟社”（Union League）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共和党宣传机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战争期间制造“国民团结”的神话（即谎言），暗示北方人团结起来对他们的同胞发动全面战争。事实是，是共和党而不是“团结的”北方人对南方发动了战争。（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在联盟军中存在着逃兵危机，经常有整个团在战斗前夕逃跑。）“国民团结”的神话是一个大老党的谎言。

第二十七章 法西斯社会主义：美国的新体制

二十世纪最大的两个人类灾难，便是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它们共同抱有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相信政府的中央计划比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更为优越，从而摧残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就像社会学家鲁道夫·拉梅尔（见其书《政府谋杀》）所说的那样，法西斯和社会主义政府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它们共同屠杀了将近一亿本国公民的同时，也策划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战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长期统治美国的垄断两党制，竟然也采纳了法西斯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并且实践到我们的经济体制中来。这种名为“法西斯社会主义”的体制，不啻于一场国家层面的经济自杀。

经济法西斯主义

经济法西斯主义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和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尽管其允许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的存在，但前提条件

是它们能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且这些私有制下的个体能够被国家所严格管控。“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这句纳粹标语表达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哲学。而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则写道：“雅利安人将会让他的自我从属于大众，并且在恰当的时候甚至牺牲自我。”

当然了，决定“公共利益”是什么的是政府。无需怀疑的是，政府将会决定什么是银行业和汽车业的“公共利益”。而且如果医疗保障能够国有化的话，其或许也属于“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则非常独特。墨索里尼在他的论文《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制度》中提到：“法西斯的个人生命概念，便是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并且只在个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时候接受个体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与 20 世纪早期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相似。比如，墨索里尼在 1935 年曾抱怨道，政府对意大利经济的介入“太过多样化，变动不定，且自相矛盾。对经济的介入……应当覆盖每个方面，只要有需求就应干涉。”他的顾问傅斯托·皮甘尼解释称，在法西斯政府的统治下，一切监管的共同目标便是“将大众团结起来”。

华盛顿当局对大萧条的看法与此如出一辙，政府告诉我们，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太少了，曾经的监管措施太过多样且自相矛盾。因此最好能建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来监管，组织以及控制整个经济体系下的“系统性风险行为”。而唯一值得辩论的问题则在于，究竟是创建一个全新的机构以达成“团结大众”的目标，还是干脆让美联储这个造成前几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来担当监管工作的执行者。

政商联合的“伙伴关系”是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标志。就像安•兰德曾指出的那样，在这种“伙伴关系”下，政府永远是高人一等的“甲方”。傅斯托•皮甘尼在他 1934 年的《意大利合作国》一书中解释称，由于“私营企业的主动性原则只有在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时候才有用处。”，因此政商之间的“合作”对法西斯意大利而言不可或缺。同样，美国总统们扶持了大量的大企业，以令他们“为国家的利益而服务”。

就像意大利的社会批评家盖塔诺•萨文米尼 1936 年在他《在法西斯的斧头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由政府扶持的经济，“为私营经济而负责的是国家，换句话说就是纳税人。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国家竟要为私营企业的错误而买单。”萨文米尼继续写道，“尽管私人企业的主动性依然能产生利润，但政府却将私营企业的亏损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利

润是属于某些个人的，但亏损却是属于大众与社会的”——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萨文米尼写道，墨索里尼曾在 1934 年吹嘘“四分之三的意大利经济受到了政府的补贴”。而今天的美国政府，也在试图加大对社会的掠夺力度。

社会主义

在 1976 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的序言里，哈耶克写道，当这本书第一次在 1944 年出版时，社会主义明确无误地“指对其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经济”。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主义开始指过度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国家的制度。”因此，美国民主党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而共和党却也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有力的反抗，或是干脆蜕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帮凶。

第二十八章 为煽动罪辩护

《时代》杂志的乔·克莱因曾在电视节目上指控格林·贝克和莎拉·佩林有“煽动罪”，因为他们批评奥巴马政府以紧急救助的形式耗费了数万亿美元的公司福利；对汽车业、银行业、学生贷款业和抵押业进行了苏联式的国有化；产生了空前的政府开支和债务；对公费医疗的拥护；及其用高税率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计划。克莱因说，任何批评这种事情的人都应该被关进劳改营。该节目上出现的另一个人是拉什·林博，克莱因尖叫道我们也应该起诉林博的“煽动罪”，因为他犯有批评奥巴马国王的极端社会主义政策的“罪行”。

乔·克莱因告诉我们，煽动罪是对“国家权力”的威胁。但关键的问题是：**做什么**的权力？美国政府是否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去做国家主义政客们梦寐以求的任何事呢？如果他们可以国有化汽车业、银行业和医疗保健业的话，他们是否也有“权力”去国有化日用品业、房地产业、钢铁业和其他行业呢？乔·克莱因显然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来，他支持的就是集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了。

在乔·克莱因和他的“新闻”节目上的其他嘉宾看来，反对极权政府就是“煽动罪”。

美国政府的初始设计是，中央政府唯一的“权力”是在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各个自由、独立且拥有主权的州所授予它的权力。根据第十修正案（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它是美国宪法的基石），所有其他权力分别由人民和各州保留。拥有主权的各州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这些权力授予中央政府，它们通过宪法来任命中央政府为它们的代理人——大部分是关于战争和外交政策的事务。这就是为什么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叛国罪的定义如下：“对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叛国罪只限于同**它们**作战，或依附其敌人，给予其敌人以帮助和鼓励……”就像在所有的建国文件中，“合众国”永远是复数形式，表明各个自由而独立的州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而联合授予了某些列举出来的权力。因此，“同它们作战”的意思是“同各州作战”。对自由而独立的各州发起战争才构成美国宪法下的叛国罪。

正如笔者在《真实的林肯》一书中所写的，林肯的战争带来了一个毫无疑问的好处——奴隶制的废除。但接踵而来的坏处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意图，它加强了华盛顿当局的中央政治集权，并破坏了战前杰斐逊所建立的作为美国宪法基础的联邦主义州权体系。在1865年后，尽管联邦政府的权力依然受限，但其已经成为了唯一制

定决策的机构。就像杰弗逊曾经警告过的那样，若政府在联邦的司法体系中拥有决定性的权力，便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彻底不受限制了。

联邦政府没花掉多少时间来宣布自然权利的观念（杰弗逊式政府哲学的基石）荡然无存——它在 1913 年正式通过了所得税，并创造了美联储这个大规模合法伪造的体制。所得税有效地宣告了所有收入都是国家的财产，国家会通过调整税率来不时地告诉我们可以留下多少自己的收入来生活。美联储和所得税使得政府得以为无限扩张的国家主义提供资金，四年后美国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灾难，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血腥世纪。

所得税和美联储最终把所有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了华盛顿，因为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些事都变得轻而易举：为战争招募数百万人，在没有宪法权力的情况下在福利国家和教育国有化这样的事情上花掉令人难以置信的钱，并通过威胁撤回给州的联邦拨款，轻易贿赂有一丁点异议的州政府。在今天，作为无数联邦补贴的接受者，一半以上的美国人都被以类似的方式贿赂和操纵。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政府厌恶和厌倦了被认为不值一提的限制政府规模和范围的宪法观点。罗斯福谴责宪法是被忘却一代的无关涂鸦，他主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府干预，政府可以借此神奇地“保证”每个人都有高薪工作，农民有高粮价，每个人都有

“体面的家”，所有你想要的医疗护理，免于对老年、疾病和事故的恐惧的自由，当然，还有国家资助的教育。这是罗斯福幼稚的“经济权利法案”愿望清单的本质。当然，如果不没收某些人的收入来买单的话，政府没办法承诺任何人任何事情。除非经济法则失效（这当然永远不可能），它也不能“保证”罗斯福的任何天花乱坠的愿望清单。

自从林肯的战争摧毁了州权，就不再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地制衡罗斯福这种极权思维的政治仆从了。他任命了足够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创造出这样一种境况：到 1937 年，最高法院准备推翻先前几十年用宪法来约束政府的尝试。并且他们成功了：根据《流亡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in Exile*）一书作者安德鲁·纳波利塔诺（Andrew Napalitano），从 1937 年到 1995 年，没有一条联邦法律被宣判为违宪。法学家伯纳德·锡根（Bernard Siegan）在他的《经济自由与宪法》（*Economic Liber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一书中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几代人以来，美国人生活在一种司法上的独裁之下，各种橡皮图章一直在扩张联邦的权力，不管它们可能会与宪法本身有多大的差异。在这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宪法”的主体，不过是一堆拗口的法律措辞，它们的目的在于颠覆和破坏任何残存的对国家中央权力的宪法限制。

总之，华盛顿政府从 1865 年起就不再是一个基于同意的政府了。根据居住在南方各州的美国公民在 1860 年–1861 年的声明，他们不再同意受华盛顿特区管辖，美国政府发动了针对整个南方平民的战争，杀死了大约 35 万美国公民，这比在所有其他战争中丧失的美国人加起来还多。这个数字包括至少 5 万名平民。除此之外，南方各个城市和城镇被烧为平地，被轰炸和被掠夺。战后，这种掠夺在被可笑地命名为“重建”的时期里还持续了十年之久。

美国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们——在表达有可能恢复宪政政府的时候是在欺骗自己。这怎么会发生呢？谁来执行宪法？联邦政府为什么要放弃其垄断解释宪法的权力，回归 1865 年之前的世界：政府的三个分支，和自由、独立并拥有主权的各州的公民一样，对宪法拥有同等的宪法解释权？为了达到这种垄断状态，政府谋杀了数十万本国公民，它绝不会放弃这种垄断。

犯有煽动罪的是华盛顿的当权派，包括乔·克莱因这样的媒体走狗。国家的合法“权力”在美国宪法里写得清清楚楚。是华盛顿的当权派抛弃了这种合法权力并授予自己基本上没有限制的权力。因此，没有什么比**反对中央国家所建议的**将以任何方式扩大其范围和权力的**任何事**更爱国和“美式”了。就像穆瑞·罗斯巴德经常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宪法制约或有意义的公民控制，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另一个犯罪团伙。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团伙这一事实并不会让它更

合法。茶党的抗议者和所有其他反对中央政府压迫的人应该忽视乔·克莱因对世界的幼稚咆哮，提醒自己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当他说道：

> 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

“茶（TEA）党”活动家们宣称他们已经被收够了税（Taxed Enough Already）。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他们有认真对待自己对宪政政府的修辞，他们就会承认，要做的是**降低**至少 90%的联邦税率，而不仅是满足于“已经被收够了”税。

由于这种减税很难通过与华盛顿当权派的合作来实现，所以无论谁当选总统，唯一真正的成功前景是认真对待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的话，并组织许多和平的分离运动。让他们在联邦政府搞自己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吧。我们其他人可以开心地看到他们毁掉自己的小社会，让自己一贫如洗，并陷入第三世界的泥潭——这是华盛顿政府在几百年前就开始做的事。

第二十九章 为了服务国家而歪曲历史

“御用历史学家”指的是把国家主义宣传伪装成“学术”的人。御用历史学家的目的是掩人耳目，美化和捍卫国家和统治阶级。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批评甚至妖魔化公民社会，特别是私营企业制度。 作为回报，御用历史学家通常会在学术界享有特权，并有政府“研究经费”来资助他们的职业，他们有报纸专栏，并跻身电视和广播“名人”。他们是国家的宣传扩音器。

本章将讨论两个尤为臭名昭著的试图改写历史来美化国家的案例——一个是詹姆斯·洛温（James Loewen）的案例，他是一位与名为“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左翼仇恨团体联系紧密的社会学家，另一个案例是前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历史学家威廉·佛斯特森（William Forstchen）的案例。洛温自诩为一个讲述历史真相的人，曾以“你的教授们教给你的那些谎言”为主题出版过多篇文章和一本书。2011 年 1 月 9 日，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南方为什么会分离的五个神话》的文章，这是《华盛顿邮报》纪念美国内战开始 150 周年的一部分。但是，这篇文章里的几乎所有事都与史实不符。

在讨论联邦关税政策对战前南北地区之间政治紧张所起的作用时，洛温提到了 1828 年的“可憎关税”，这导致南卡罗莱纳州使用了废除条例（Ordinance of Nullification），该州谴责进口关税 48%的增长是一种（主要争对南方的）公然掠夺，并拒绝在查尔斯顿港征收这种税。洛温写道，“当南卡罗莱纳州请求否决联邦法律或用分离来抗议的权利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威胁了使用武力。”这是真的。洛温继续写道，“没有一个州参与这次运动，南卡罗来纳州选择了让步。”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

历史学家昌西·鲍彻（Chauncey Boucher）在他的《南卡罗莱纳州的否决争议》（*The Nullification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一书中写道，当时北卡罗莱纳和阿拉巴马州加入了南卡罗莱纳州的队伍，它们的议会公开谴责了可憎关税，同时，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州、印第安纳州和纽约州的议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影响，支持用保护主义关税来掠夺南方。

像洛温那样说“南卡罗来纳州选择了让步”也是不对的。南卡罗来纳州和杰克逊政府达成了**妥协**，在随后的十年里关税税率将会降低。 **双方**都“让步”了，但洛温却误导性地宣传，只有南卡罗来纳州让步了。御用历史学家们在这样改写税收抗议史上有着漫长而可怜的历史。在洛温的案例中，他有一个对历史撒谎的次要动机：他希望美国人相信，不同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其他战争，美国“内

战”与经济冲突无关。他提供了美国历史的卡通化理论：南方种族主义是战争的唯一原因，北方各州种族开明的共和党人对其提起了公诉。

接着，就关税政策在推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洛温散布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他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在 1860 年关税并不是一个问题，南方各州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他问道，“为什么要有意见呢？”“南方人拟定了 1857 年的关税，国家正是在此之下运转的。它的税率要比从 1816 年开始的任何时候都低。”这段叙述的每一个字都是错的。

保护主义关税是共和党 1860 年政纲的一部分，而南方人是如此坚定的自由贸易者，以至于《邦联宪法》中已经明令禁止了保护主义关税。[34]林肯的官方竞选海报，特写是他自己和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汉尼拔·哈姆林的照片，下方是“保护本国工业”的保护主义标题。在即将上台的时候，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对国家来说“没有其他问题”比提高联邦关税税率更重要。这样的话是林肯在贸易保护主义者要求詹姆斯·布坎南总统签署颁布《1861 年莫里尔关税法》的活动中所说的——布坎南在林肯就职前两天签署了。战争一开始，林肯就宣布了对南方各港口进行

[34] 参见 Marshal DeRosa 的 *The Confederate Constitution of 1861*.

海军封锁，并且只给出了一个理由：他说，他的职责就是收联邦关税。

在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宣称他的职责是“征收进口关税”，并且“除此之外”绝不会在任何州发生“入侵”（原话）或“流血”（原话）。他的确是在威胁就征收关税发动战争。亚伯拉罕・林肯不会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那样对南卡罗莱纳州或者其他地方的税收抗议者让步。与洛温的断言相反，对 1860 年的亚伯拉罕・林肯来说，关税政策不可否认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洛温所散布的最恶劣的谎言，是说 1861 年的关税就是 1857 年的关税税率，这实际上是 19 世纪最低的税率。问题并不在关税税率上，而是在**莫里尔关税**税率上，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多**（32.6%比 15%）。在一个关税占所有联邦税收收入 90%以上的时代，由美国众议院在 1859 年至 1860 年的立法会议上通过，并由美国参议院在 1860 年至 1861 年的立法会议上签署的这条法律让税率翻了不止一倍。但在洛温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里，“莫里尔关税”这个词压根没有出现。

洛温宣称，在战争爆发前南方人没有就关税问题发表“任何意见”，这也是大错特错的。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在**其**首次就职演讲（1861 年 2 月 18 日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中，像林肯在他的演讲中一样强调了关税政策的重要性。他说道：

> 一个从事农业的人，他的首要利益是出口每个制造国都需要的商品，我们的真正政策是和平和我们的需求能允许的最自由的贸易。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不论我们要把东西卖给谁，我们要从谁那里买，对商品交易的限制都应该尽可能地少。我们和从事制造或航运的团体，比如美国联盟的东北各州，可能会产生对抗，但这种对抗应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必须遵循这一点：共同利益将带来善意和友好的帮助。然而，如果冲动或统治的欲望蒙蔽了这些州的判断或者激发了它们的野心，我们必须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因此，在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宣布保护主义是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石，他愿意对抵抗的“任何州”发动“入侵”。在杰斐逊·戴维斯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宣布邦联的经济政策恰恰相反：“尽可能自由的贸易”。当他在上面的引文中说道，“我们必须准备应对紧急情况”时，他说的是他知道这一次不同于三十年前的可憎关税危机，北方将愿意为了征税而发动战争，而南方应该“准备”可能的入侵。詹姆斯·洛文却要我们相信，在战前几个月里，双方没有任何人就关税问题发过任何言。

洛温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的其余部分也没好到哪去。例如，众所周知，只有极少部分的邦联士兵是奴隶主。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成了：他们为什么要参战？他们不仅没有拥有奴隶，而且他们

中的许多人是饱受奴隶制之苦的自耕农，因为拥有奴隶的大型种植园与他们进行不公平的竞争。还有更多的人被剥夺了务农的机会，因为大部分工作是由奴隶完成的。

洛温并没有考虑邦联士兵为什么要参战这个学术问题，相反，他编造了一个荒谬的答案来回答并不拥有奴隶的邦联士兵为什么要参战这一问题：他说，他们想的是为了在战后奇迹般地成为富有的奴隶种植园主！这就是在《华盛顿邮报》里被认为是历史“学术”的东西。如果洛温读过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的《他们为何而战：1861 年至 1865 年》（*What They Fought For: 1861–1865*）一书，他就会知道，普通邦联士兵在家书里写过，他正在与入侵的外来政府打仗，这个政府正在侵略他的国家，轰炸和焚烧他的城镇，并威胁伤害他的家人和朋友。

左翼仇恨团体的活动家并不是在林肯及其战争主题上唯一的御用历史学家。新保守主义者们也认为，“慈父亚伯拉罕[35]的神话”是其战争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似乎愿意说任何话和写任何东西来延续他们的神话。纽特·金里奇和威廉·佛斯特森 2009 年 2 月 9 日在最大新闻网（Newsmax.com）上一篇标题为《今天他会对我们说什么？》（What Would He Say to Us Today?）的文章，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这篇文章不过是新保守主义者暗

---

[35] 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称号。——译者注

示如果亚伯·林肯在今天还活着，会批准他们的政治议题的策略的又一次演绎。如果“慈父亚伯拉罕”会赞成，**别人**要怎么反对呢？新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循着这个一般主题的线条写了几十篇（也许是几百篇）文章。（在这场冒险中，新保守主义者们并不孤单；马里奥·库默和哈罗德·霍尔泽写了一整本名为《林肯论民主》的书，提出如果林肯在今天还活着，将会是一名“社民主义者”——也就是和他们一样的社会主义者。）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做出了典型的对林肯的神化，他们称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仿造了希腊的神庙”。这当然是对的：林肯国王确实像宙斯一样端坐在他华盛顿的“宝座”上。（虽然历史学家克莱德·威尔逊更准确地把这个美国国家象征描述为了“坐在扶手椅上的企业说客”）。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把林肯纪念堂称为“我们美国的民主神殿”。当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担心甚至厌恶民主，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篇中把民主称为“派系的暴力”。詹姆斯·麦迪逊或者托马斯·杰斐逊在世界上最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给民主修一座神庙。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篇中写道，宪法的整个意图就是控制和约束民主，或者说“派系的暴力”。

实际上，林肯纪念堂是一座庆祝**毁灭**杰弗逊“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理念的神庙。这种毁灭很难说是民主的。毕

竟，是南方在 1861 年不再同意被华盛顿特区统治。是林肯和共和党认为美国政府**不**是自愿的；认为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说的相反，人民**没有**权利“改变或废除”自己的政府；并认为联邦政府确实有“权利”入侵、谋杀数十万人并把整个美国城市和城镇轰炸和焚烧成平地来实施这一观点。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声称，战争中的所有流血、死亡、混乱和破坏造就了美国的“联合”。他们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联合”定义，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苏维埃**联盟如何“联合”起来的，而不是一开始的美利坚联盟。如果一个人拿着枪指着另一个人的脑袋逼着对方同意他的观点的话，确实可以说他们至少在观点上达成了所谓的“联合”了。

盎格鲁-萨克逊法律的基本信条是，在强迫或欺骗下订立的契约不是合法或正当的。美国联盟在 1865 年之后的时间里就可以说是这样。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所编造的最大谎言，或许是林肯“是一位谨守信仰的人”。对林肯的妻子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及法律伙伴威廉・赫顿律师来说，这会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都曾表示，林肯从未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准备自己的林肯传记时，赫顿曾问过玛丽・托德・林肯这一点，她说她已故的丈夫“没有信仰……他从未加入教会【并且】……他从来都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基督

徒。”[36]无论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有着多么荒谬的论点，林肯的研究者们对此皆心知肚明。比如，在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Goodwin）的《对手团队》（*Team of Rivals*）一书中，她便指出林肯从未信教，同时也为林肯的不信而感到惋惜。

林肯的战争是一场针对南方平民和邦联军战斗人员的全面战争。林肯对所有暴行一清二楚，并且，他还因为在对南方各州公民的全面战争中的精细管理，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表扬。他奖励了谢尔曼和谢里登这样的将军，他们并不以军事战略家见长，而作为恐怖分子对林肯不可或缺，他们谋杀平民，轰炸和焚烧只有平民的城市和城镇，并在他们的军队偷走价值数百万美金的私有财产——从银器到牲畜的一切——时视而不见。林肯还以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和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等美国城市试验火力越来越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著称，在敌军尚未出现的时候，就在短短几天之内降下了数千只炮弹。

当金里奇和佛斯特森写道，林肯“对所有人都有着一种深沉的爱，他甚至在医院里为一位受伤的邦联士兵下跪祈祷”；“他的眼里充满了对他人遭遇的痛苦”；以及他“以对受伤的动物的极端亲切而著称”的时候，他们似乎相信美国人对以上事实完全一无所

[36] 参见 Edgar Lee Masters, *Lincoln the Man*, p. 150

知。他们并没有为这些古怪的说法给出任何参考文献，只是说它们都来自“故事”（但他们甚至没有说明这些“故事”的来源）。

通过宣称林肯“是第一位邀请并在社交场合欢迎非裔美国人代表光临白宫的总统”，金里奇和佛斯特森还误导他们的读者相信林肯在种族问题上是开明的。林肯确实曾在白宫会见过一群自由的黑人，但根据哈佛大学的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教授，这并不是首次这样的会见。这次会见的意图也并不像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所误导性地暗示的那样，是为了发表关于种族平等的宣言。事实恰恰相反：根据《林肯著作和演讲选集》（*Lincoln's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在 1862 年 8 月 14 日的条目，这次会见的意图是为了督促自由的黑人“以身作则”并自愿离开美国。“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的种族，”林肯野蛮地说道。“我们之间的差异比几乎任何其他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还要大……这些身体上的差异对我们双方都是大大的坏处……并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分开……因此，分开对我们双方都好。”

他接着督促这些人前往利比里亚，说明那里已经有一个美国黑人的殖民地了（由美国殖民协会在十九世纪初建立），虽然大多数初始殖民者都已经去世。林肯试图向人们保证，这样的冒险将是有利的，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可能死于疾病或饥饿。林肯推测，如果他们事先开始生育，有朝一日他们的后裔人数可能会超过他们。

自由的黑人明智地拒绝了林肯出钱把他们驱逐到利比里亚的慷慨提议。

林肯及其战争的错误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来支持所谓的“美国例外论”，这种观点反过来也成了美国政府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军事冒险的万能借口或理由。

第四部分 货币与国家

第三十章 中央银行是腐败的发动机

关于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就建立美国首个中央银行——美国银行（BUS）是否合宪的著名辩论，已经有了许多著作。正是在这里，杰斐逊作为国务卿，阐明了他“严格解释”宪法的观点，他向乔治·华盛顿总统表明，由于各州并没有明确授予中央政府建立国有银行的权力，并且由于制宪会议明确拒绝了这种想法，所以中央银行是违宪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则通过发明的“隐含”权力——与宪法中明确授予的权力相反——的概念，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回应。

乔治·华盛顿签署法案建立美国银行，并不是因为汉密尔顿的观点有力，而是因为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国家首都从纽约转移到弗吉尼亚时，华盛顿希望新哥伦比亚特区的边界靠近他在维农山庄的房产。作为对重画特区边界（很可能让他的房产增值）的奖励，他签署了联邦党人创立美国银行的法案。

美国的首个中央银行是一场腐败的政治交易的结果，但是，相比汉密尔顿和他的民族主义同僚们对这个国家的真正企图，这种政治欺骗的手段可谓相形见绌。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银行的秘

密》（*The Mystery of Banking*）中所写的，汉密尔顿和他的政治同僚们（特别是有政治关系的国防承包商罗伯特·莫里斯）希望

> 与奋起反抗的殖民地居民们相反，在新生的美国重建一个类似大英帝国的重商主义和大政府体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高税收和巨额公共债务，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特别是一个强势的总统或国王来作为行政长官。

罗斯巴德所说的“莫里斯方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是“组织和领导一个中央银行，来为他自己和他的盟友们提供廉价信贷和扩张货币。”

汉密尔顿本质上是罗伯特·莫里斯在华盛顿政府中的内应，他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英式“重商主义”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主要会让莫里斯这样的富豪以几乎所有其他人为代价受益。就像《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位编辑，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代尔（Douglas Adair）所解释的那样：

> 汉密尔顿有着狡猾的头脑，他通过设立分级议会，将东海岸的有产者们的利益融合成一个有着凝聚力的管理集体，同时他试图通过给予支持者们大量好处来在国会中主导行政。为了实行他的计划……汉密尔顿财政部的所有金融交易全部变

成投机和贪污的狂欢，被选中的两院议员和全国各地的富有选民都参与其中。

阿代尔教授在这里所讲的，是汉密尔顿如何国有化政府旧债。随着新的政府债券的发行，旧的债务将会以面值退出。约翰·斯蒂尔·高登（John Steele Gordon）在他的书《汉密尔顿的恩典》（*Hamilton's Blessing*）中写道，这个计划在纽约市政府内部和周边的政治内部人士中间很快就变得众人皆知，但这个消息“只能通过马背和帆船，慢慢传到国家其他地方。”

因此，这为纽约或费城的政治内部人士——罗伯特·莫里斯和他的政商伙伴们，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在他的经典著作《杰斐逊与汉密尔顿》（*Jefferson and Hamilton*）一书中，描述了有多少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内部人士通过从老兵们手里仅以面值的 2% 购买这些债券，占了数百名不知情的独立战争老兵的便宜——这些老兵的服役报酬部分是以政府债券的形式发放的。就像鲍尔斯所描写的那样，

> 大量资金出于投机的意图而运到了北卡罗来纳……这些钱在冬季路况极差的道路上颠簸飞扬……两艘由国会议员特许的快速帆船……出于同样的任务而在水面上朝南方前进。

根据鲍尔斯所言，许多国会议员成为了暴发户。罗伯特·莫里斯据说在这个计划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而汉密尔顿本人也有参与。

通过观察汉密尔顿的罪行，杰斐逊得出结论，为了在国会里为其政党的保护性关税、公司福利和中央银行的大政府重商主义计划购买政治支持，汉密尔顿在有意创造一个制度化腐败的制度。在汉密尔顿 1804 年去世之后很久，杰斐逊在一篇写于 1818 年 2 月 4 日的文章中声称，“汉密尔顿的体制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迷惑大众，以排除民众的理解和质询，其二是成为腐化议会的机器。”在有关腐败的指控上，杰斐逊解释道，汉密尔顿

> 公开宣称这一观点，即人只能被两种动机（武力或利益）之中的一种所支配：他所观察到的是，在这个国家，武力逼迫完全不可行；因此，为了保持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一致，必须控制【国会】议员们的利益。令人悲伤且羞耻的是，必须承认他的这套机器并非毫无成效……我们发现一些【国会】议员十分肮脏地将他们的责任让位于他们的利益，并且只顾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

杰斐逊写道，“靠【汉密尔顿这种】领导人的伎俩致富的那些人，当然会追随带领他们致富的领导，并且因此成为其所有计划的积极工具。”

但杰斐逊相信，汉密尔顿所面临的问题，是他通过公共债务的套利骗局所“买”到的政治支持只是暂时的。“随着那些曾经获利的个体【国会】议员们的流失【退休或死亡】，它也会失败。”因此，杰斐逊推论道，“必须发明一种影响更持久的发动机。”他说，这种持久的“影响”（或者说腐败）的发动机，“就是美国银行。” 中央银行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立刻在背后创造出一种更为稳定的政治，并且就会难以摧毁。杰斐逊害怕中央银行会成为政治贿赂和腐败的持久发动机，以便让政府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到超越宪法的限制。托马斯•杰斐逊总结道，“汉密尔顿不仅主张君主政体，而且主张建立在腐败之上的君主政体，”而中央银行就是汉密尔顿想要创建的腐败政权的中心。

根据汉密尔顿的言行，杰斐逊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他 1814 年 2 月 4 日的文章里，杰斐逊回顾了在 1791 年，即美国银行诞生的那一年的一次私人对话，参与者包括他、汉密尔顿、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约翰•亚当斯总统和首席检察官埃德蒙•伦道夫。他回顾了亚当斯总统对英国宪法的评论：“净化这部宪法的腐败，给予各阶层民众平等的代表权，这将是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最完美的宪法。”

汉密尔顿随后反对了这种说法：“净化这部宪法的腐败，给予各阶层民众平等的代表权，这样的政府就会变得不切实际；按现状

来说，即便有许多可能的缺陷存在，它仍然是有史以来最为完美的政府。”

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汉密尔顿而言，英国政府中存在的腐败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因为它有助于把政治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手上。杰斐逊写道，汉密尔顿“被英国的例子迷惑和误导了，以至于彻底相信腐败对一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中央银行的创立就是这种腐败的基本要素。

第三十一章 州权与货币垄断的对决

美国人并不总像今天这般是政府官僚机构的奴隶。这个问题上一个最好的历史案例，是美国人如何利用否决原则和提出异议的杰斐逊主义州权传统，帮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切断了美国第二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美国银行）的继承者——的资金来源。

美国银行原本有一份有效期为 20 年（始于 1791 年）的特许状，这份特许状没有被国会延期，因为该银行所做的正是杰斐逊主义者们害怕它会做的：它在第一个五年里造成了 71%的价格通胀，产生了数次繁荣–萧条周期，还腐化了政治。为了明目张胆地帮助把 1812 年战争的相关债务货币化，国会在 1816 年复活了美国银行。

在美国银行重生的那一年——1816 年——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修改了它们的州宪法，禁止美国银行在其管辖范围设立分行。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马里兰州也通过对州内的美国银行分行施以重税，加入了这场战斗。它们的明显意图便是通过征税来让其歇业。詹姆斯·J. 基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在他的《主权国家：弗吉尼亚的公民笔记》（*The Sovereign States: Notes of a Citizen of Virginia*）一书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联邦政府理解这些税会摧毁美国银行，便起诉了马里兰州（*McCulloch vs. Maryland, 1819*），它们确信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一位崇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亲银行国家主义者，将作出有利的判决。他也的确做了，并著名地创造了这句口号：“征税的权力就是摧毁美国银行的权力”。

但在那个时代，最高法院的意见仅仅被视为最高法院的意见，而不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传承自上帝的旨意。在 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人依然认为政府有三个分支，而非只有一个（司法），并且，三个分支在宪法问题上应该有平等的发言权，有需要的话，各主权州的公民也应该通过否决的法案。毕竟，对于“谁”才是宪法仲裁者的问题，宪法是沉默的，并且也当然没有赋予联邦司法部门单独的责任。

即便马歇尔认为美国银行合宪而各州对美国银行征税非法，许多州仍然继续干扰银行的运作。俄亥俄州对美国银行的两个分行征收了每年五万美元的税款。当银行拒绝缴税时，俄亥俄州审计署就命令代理人约翰·L. 哈伯前去征税。就像基帕特里克解释的那样：

> 9 月 17 日早晨，哈伯最后一次要求银行自愿缴税。在被拒绝之后，哈伯跃过银行柜台，大步走向银行金库，自己取走了十万美元的纸钞和硬币。他将这些钱交给另一位副官……将这批巨款塞进他们周到地带着的行李箱。

俄亥俄州议会认为马歇尔的观点和国有银行的存在，是对所有美国人——不只是俄亥俄人——公民主权的可怕威胁和危险先例。议会起草了一份宣言：“默许这种对各州特权和权力的侵犯，而不努力阻止它们，其会是对本州以及组成美利坚联盟的各州的背叛行为。”

俄亥俄州议会声明称它们知道最高法院应该是宪法的唯一解释者这套“理论”——顺带一提，这是一种由约翰·马歇尔发明的理论。基帕特里克写道，但它也宣称，“它们将绝不会同意……这种学说。”俄亥俄州议会引用杰斐逊的《肯塔基决议》来支持自己，宪法契约的各方有平等的权利来为自己解释宪法。它们宣称，约翰·马歇尔是错误的，并且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默许他的“裁定”。

俄亥俄州议会随后承诺，如果美国银行撤离俄亥俄州，它们将返还这十万美元。否则，议会威胁将用法律禁止“我们监狱的看守人”监禁任何“在美国银行诉讼案中被送到监狱的人”；禁止俄亥俄州法院“承认美国银行参与的任何财产让与”；并禁止“法院，治安法官，法官和大陪审团认定任何种类的涉嫌盗窃美国银行财产的错误指控。”接着，议会谴责了最高法院和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违反宪法的行为。

美国银行也作出了反击，联邦执法官逮捕并监禁了俄亥俄州的财务官。当他入狱时，有人用武力从他手中夺走了州政府金库的钥匙，随后联邦的官僚自己取走了十万美元。这愈发激怒了俄亥俄人，他们继续反对美国银行，和许多其他州所做的一样。肯塔基州和康涅狄格州在银行问题上也采用了俄亥俄州站的立场；南卡罗来纳州对州内美国银行的股东征收了一项特别税；纽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议会则制定了决议敦促银行不得延长特许状。詹姆斯·基帕特里克总结道：

> 面对这场无情的战争，美国银行无法继续存活。1833 年 8 月，在杰克逊总统的命令下，开始撤回美国银行的公众存款；而当曾坚定支持美国银行的宾西法尼亚州州长沃夫在 1834 年 3 月谴责这一机构时，公众舆论不可避免地受影响反对美国银行。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通过了全新决议敦促银行不得延长特许状。接下来的一个月，美国众议院采纳了相同的观点，美国银行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对美国第二银行延长特许状的否决，一般来说都归功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当然他实至名归。但在这场漫长且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中，他得到了不少的帮助，这些帮助来自自由、独立并拥有主权的各州的人民，他们反对任何把货币垄断权授予华盛顿政客的动作。

第三十二章 中央银行如何掩盖战争成本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相信，中央银行所产生的价格通胀是“军国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它导致战争的影响变得更加不明显。如果战争的资金是通过直接收税来提供的话，“厌战情绪”将会更快产生。

美国政客们经常采取将中央银行合法的伪造行为来为战争——所有政府项目中最贵的一项——提供资金。如果民众们能对战争的真实成本有更清晰的认识，他们会更倾向于反对积极干预，并迫使所有战争尽快结束。

政府只能通过三种办法来为战争（和其他所有事物）提供资金：税收、债务和印钞。税收是最明显和最令人痛苦的，接着是用债务来融资，它会挤出私人借贷，导致利率攀升并令纳税人负担本金和利率双重成本。另一方面，印钞则使得战争对一般民众而言似乎毫无成本，相比真正的元凶——政府，民众更可能将中央银行所导致的高物价怪罪到“贪婪的企业”头上。

一般来说，战争持续得越久，经济便会越来越趋向于中央计划和政府管控。并且，这一现象在战争结束后会依然持续。就像伦道

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名言一样，战争乃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国家权力的扩大意味着自由与繁荣的倒退。正如罗伯特·希格斯在《危机与利维坦》（*Crisis and Leviathan*）中所写的那样，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便是：政府与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勾结；对海洋运输和铁路工业的国有化或事实上的国有化；联邦政府对劳动和资本市场、通信业和农业干涉的加剧；以及对有关军事征兵和公民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的长期修改。

通过通货膨胀来为战争提供资金经常导致呼吁价格监管的声音，而价格监管甚至会通过造成商品与服务短缺来对私营企业系统造成更大的损害。国家以自己创造出来的短缺作为借口，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以通过它认为合适的手段来对短缺做出分配。把货币的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手段，时常是迈向采取本质上的经济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步。

据说中国发明了纸钞和印刷术，但美国政客或许是最早使用政府发行纸币的人。它是 1690 年在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政府开始采用的。穆瑞·罗斯巴德在《美国货币和银行史》中写道，马萨诸塞州政府当时惯于对魁北克富有的法国人进行“掠夺式远征”。其中的一些赃物通常便用于支付雇佣兵的薪水，但在掠夺式远征失败而毫无收获，雇佣兵们威胁兵变的时候，马萨诸塞州政府印刷了 7000 英

镑的钞票作为给他们的回报。政府承诺用黄金或白银来赎回这些纸币，却花了**四十年**时间。同时，公众是如此地怀疑这些钞票，以至于它们在发行的第一年就贬值了 40%。

在 1740 年之前，弗吉尼亚州以外的所有殖民地都在马萨诸塞的带领下发行了法定纸币。其结果便是急剧的价格通胀、货币贬值和多次繁荣-萧条周期。在美国革命期间，随着制宪会议于 1775 年发行“大陆币”，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体系形成了。由于大陆币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支持，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贬值，以至于在 1781 年时几无多少价值。“一大陆币不值”成为了一句流行的俗语。

一些州试图通过价格控制法来应对由于猛印大陆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可以预测的结果便是极为严重的短缺，以至于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在宾夕法尼亚州几乎被饿死。经济情况变得极为危急，以至于制宪会议在 1778 年 6 月 4 日督促所有州份废除他们的价格控制法。

罗伯特·薛廷格和伊蒙·巴特勒在《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如何不抗击通货膨胀》中写道，在政策做出这一改变之后，军队在三个月内就获得了足够的补给。

尽管这场经济灾难是由于美国首次尝试中央控制的货币供给所导致的，在美国革命战争的末期，在国防承包商/国会议员罗伯

特·莫里斯对总统的灌输下，国家的首个中央银行——北美银行——成立了。中央银行对一般民众来说或许是毁灭性的，但莫里斯这样的政治界内部人士获益匪浅。该银行被授予了发行纸币的垄断许可，并且，它将大部分新发行的货币用于对联邦政府的贷款。通过这样做，它导致货币急速通货膨胀，以至于在一年内市场便对银行彻底失去信心，而银行也被私有化了。

就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它们的一份出版物中所宣称的那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中央银行的真正建立者。他在 1791 年建立的美国银行，用汉密尔顿自己的话说，部分是为了给像战争这种“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提供资金。1811 年，当美国银行的特许状到期时，其特许状并未获得延期，但联邦政府依然设计了一种把战争债务货币化的手段。它鼓励建立大量私有银行，随后再于 1814 年宣布“暂停硬币支付”。换言之，联邦政府不再要求银行用黄金或白银赎回他们的纸钞了。因此，在美国国会的监督下，银行被鼓励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随意增发他们的通货。在战争期间，价格通胀的水平平均在 35%。

为了还清战争债务，美国银行在 1817 年 1 月重获特许状，并且被授权发行国家纸币，购买公债和接受美国国库资金的存款。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美国货币与银行史》一书中，对美国银行重获特许状的政治做出了如下解释：

> 美国第二银行是通过国会……特别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J. 达拉斯推出的……他是一个富有的费城律师，也是费城商人和银行家斯蒂芬·吉拉德的密友、法律顾问和金融伙伴。吉拉德据说是国内最富有的两个人之一……吉拉德是美国第一银行最大的股东，且在 1812 年战争期间投资了大量联邦政府的战争债务……吉拉德为了摆脱他的公债负担，开始煽动成立一个新美国银行。

罗斯巴德写道，美国第二银行“造成了货币和信贷的急剧膨胀”，外加大剂量的银行欺诈。这迅速造成了“1819 年的恐慌”，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真正的大萧条，城市中首次出现大规模失业。罗斯巴德在他的书《1819 年的恐慌》（*The Panic of 1819*）中记录到，费城手工业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37]从 1815 年的 9700 人下降到了 1819 年的仅仅 2100 人。

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了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延期后，该银行便不复存在，但主张通过中央银行进行中央计划的国家主义者们却从未放弃。他们最终在林肯的任期内通过了《1862 年法定货币法案》，该法案授予财政部长在战争年间发行不可赎回黄金或白银的“绿背”钞票的权力。而 1863 和 1864 年的《国家通货法案》则建立了一个国家特许的银行体系，这个体系可以通过新设立的货

[37] 作者误写成了失业（unemployment），而罗斯巴德写的是就业（employment）。——译者注

币监理署来发行供给市场的货币。该法案也对竞争的州立银行钞票征收 10%的税，以将它们挤出市场并建立联邦的货币垄断。

可预见的结果便是大规模的价格通胀，绿背纸钞贬值到了在一年后对只值黄金 35 分的程度。通货膨胀的所有负面经济效应——私人财富的贬值，从债权人到债务人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对理性经济计算的阻碍——破坏了北方的战争努力，但南方的损失更大。北方大部分内战资金都来源于公共借款，而南方则通过印邦联美元来为战争提供大部分资金。结果便是，邦联的价格通胀平均超过每年 2200%。

联邦储备委员会最终于 1913 年创立，它有助于为美国灾难且徒劳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美联储不仅像在南北战争期间那样印绿背纸钞。它还印了足够的钱来购买超过 40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些债券被用于为战争提供资金。在 1914 年（美联储创立的第一年）到 1920 年的期间，流通的货币翻了一倍。在这些年间物价水平也同样翻了一倍，通过把私人持有的财富贬值一半和减少实际工资，产生了一次对美国纳税人的巨额隐形税收。

美联储对战争的资金支持所造就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场萧条——1920 年的萧条。1920 年的萧条的第一年甚至比十年后大萧条的第一年还要糟糕。从 1920 年到 1921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 24%，同时美国失业人口总数翻了不止一倍，从 210 万上升到了 490

万。不过，得益于沃伦·哈定总统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和税收，1920 年的大萧条只持续了一年。

中央银行在二战之后的所有战争中都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本质上相同的破坏：价格通胀、经济混乱、实际工资的降低、价格控制和其他导致不稳定和贫困的政府控制和监管，以及对资本主义（而非真凶美联储）的意识形态攻击。

亚当·斯密承认通过收税来为战争提供资金好于发行公债，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在使用税收来提供资金时，“一般来说，战争总会迅速结束，并且会更少轻易发生。”“在延绵的战事之中，人民彻底感受到战争的负担，不久便会对战争发生厌倦，而政府为了迎合他们，也会适可而止。”

相比用债务来为战争提供资金，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让战争的成本更加难以察觉，因此，从纳税民众的角度来看，也会导致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十三章 美联储如何创造失业

联邦储备委员会指导下的货币政策有着创造就业**和**失业的悠久历史。究其原因，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一样，一直都是经济中繁荣-萧条周期的发动者。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三部经典著作解释了这样的原因：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F.A.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和《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穆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也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做出了清晰的阐述。哈耶克在 1974 年因为这一工作和其他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美联储扩张货币供给时，它不仅容易制造价格通胀，还通过人为降低利率而播下了衰退或萧条的种子，人为降低利率还可以引发一个虚假或难以持续的经济“繁荣周期”。低利率促使人们增加消费和减少储蓄。但是，只有储蓄和随后由储蓄提供资金的商业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的燃料。

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低利率和信贷泛滥，使得企业在（大多数是长期的）资本项目上，特别是在 21 世纪初繁荣周期的房地产业上，做出更多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在这些行业里就业的增长。但是，由于低利率是由美联储的货币供给扩张而非公众储蓄增加所造成的，那些投资了长期资本项目的企业最终会发现他们的投资并没有足够的消费者需求来支持。（在过去的储蓄减少意味着在未来的消费者需求减少）。此时“萧条”就发生了。

在资源被以上述方式错误配置时，发生在繁荣周期的美联储繁荣-萧条政策会造成对经济的破坏。“萧条”周期实际上是对已经发生的经济错误计算的必要修复，因为各个企业清算掉自己不合理的投资，并开始依据现实的、基于市场的利率来做出决策。为了得到真正的经济复苏，物价和工资也必将同样回归真实。

而救助那些已经做出错误投资决定的企业的政府政策，则只能延迟或阻止经济复苏，同时在未来更加鼓励这样的行为（“道德风险问题”）。这就是短期衰退是如何演变成长期衰退或萧条的。更糟糕的是，为了应对自己在一开始扩张货币供给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美联储甚至会创造出更严重的货币通胀。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轮繁荣-萧条周期。

人为低利率从 2000 年开始成为格林斯潘的美联储的官方政策，它显然在房地产市场造成了短暂的繁荣。数千个新工作岗位事实上

被创造出来——接着被毁灭掉——这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个说法赋予了新的含义。许多在房地产建筑和相关行业找到工作并追求职业发展的美国人认识到，这些工作和职业终究是无法持续的。他们被美联储耍了。因此，美联储不仅要对造成高失业率（官方统计是 10%，但如果把“丧志工人”[38]算成失业的话，就是 17%）负责，也要对劳动市场的错配负责。也就是说，在这些行业里人们获得的所有技能都不再受欢迎；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被迫重新装备和重新教育自己，或是因失业而生活困难或领取福利。

从 1914 年问世以来，美联储一直在不断产生繁荣-萧条周期。从 1914 年到 1920 年，银行总存款翻了一倍多（大部分要归功于美联储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并产生了在 1920 年变成萧条的虚假繁荣，国内生产总值从 1920 年到 1921 年下跌了 24%，失业人口从 210 万到 490 万，翻了不止一倍（正如理查德·维达和洛威尔·加拉韦在他们的《失业》一书中用文件证明的）。这场萧条比十年后大萧条的第一年还要严重。

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证明了，并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他们的著作《美国货币史》中所说的那样，是 1929 年到 1932 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引发了大萧条。

[38] “discouraged workers”是指失业但不积极找工作的人。——译者注

相反，是美联储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扩张性货币操作产生了另一轮繁荣–萧条周期，繁荣破灭后的萧条才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让美联储来负责维持低失业率，无异于让纵火犯来负责扑灭着火的房屋。

第三十四章 美联储“自由主义”的神话

在“大萧条”期间，一个极为荒谬的场面便是许多评论员把崩溃怪罪为美联储“过于自由主义”和委员会缺乏中央计划。商业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John Steele Gordon）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崩溃的原因是托马斯·杰斐逊和他流传至今的反中央银行观点的“有害”影响。华尔街股票经纪人亨利·考夫曼在《金融时报》上写道，“自由主义的教条”导致美联储误入歧途。这种论调被无数人重复着，他们似乎假定了：（1）由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四十年前是安·兰德的门徒；并且（2）由于安·兰德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所以（3）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的美联储没有以任何方式监管金融市场，或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繁荣-萧条周期。

更荒谬的论调没有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这种严肃出版物上发表。想了解这种论调的人只需在网上搜索一份名为《联邦储备体系：宗旨与职责》的美联储出版物。美联储不仅不顾一切地操纵货币供给并导致有时会造成大萧条的繁荣-萧条周期，它还拥有“大范围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权力”。这些职责在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从未被束之高阁。

- 银行控股公司
- 国家特许银行
- 成员银行的外国分行
- 设立或收购《埃奇法》公司[39]
- 外国银行受到美国国家许可的分行，机构及代表处
- 国有银行
- 储蓄银行
- 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子公司
- “储蓄贷款协会”的控股公司
- 财务报告的程序
- 银行的会计政策
- 经济危机状况下的企业“维持”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9] “埃奇法公司”是美国跨国银行根据 1919 年修订的联邦储备法允许设立的最为重要的、经营国际银行业务的海外分支机构形式，它实质上是美国跨国银行的一种海外分支机构，即跨国银行的组织形式之一。——译者注

- 银行的证券交易
- 银行使用的信息技术
- 银行的外国投资
- 银行的外国借贷
- 银行的分行
- 银行兼并和收购
- 创立银行的资格
- 资本的“充足率标准”
- 购买有价证券的信贷范围扩展
- 公平的贷款机会
- 按揭的披露信息
- 银行储备金要求
- 电子资金转账
- 银行之间的负债

- 《社区再投资法》的次级贷款需求[40]
- 所有的国际银行业务
- 消费租赁
- 对消费者的财务信息保密
- 活期存款的支付
- 公平的信用报告行为
- 成员银行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
- 诚实贷款
- 诚实储蓄

这些对金融市场的大规模监管在格林斯潘时代得到了充分的执行。任何一点都很难以任何一种方式被视为“自由主义”或“杰斐逊主义”。美联储是一个中央计划机构，且上述列表不过是其数百种中央计划工具中的一部分。和一切中央计划的努力一样，它只能让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与此同时以廉价信贷、企业救助和其他形式的公司福利来支撑有政治背景的财阀统治。

[40] 《社区再投资法》是一份鼓励银行给社区贫穷和中等收入人群提供贷款的法案——译者注

第三十五章 “独立”美联储的神话

从 1913 年创立以来，美联储就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独立”机构，无私的公务员们运营着这个机构，他们通过货币政策努力对美国经济实行中央计划。但是，事实上，一个不涉及政治的政府企业，就像一只会汪汪叫的猫或喵喵叫的狗一样不可能出现。然而，美联储“独立”且不涉及政治的神话是存在的，而各种经济学教材帮助延续这一神话数十年之久。

从 1948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最畅销的经济学原理教材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它卖出了超过四百万本，被用于教授一代代大学生的基础经济学。除了极个别以外，绝大多数其他教材不过是萨缪尔森的克隆，它们放大了萨缪尔森对普通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萨缪尔森与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合写教材的 1989 年版是这样描述美联储的：

> 美联储的目标是国民产出的稳定增长和低失业率。它永恒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如果总需求过多而使得价格上涨，美联储则会减缓货币供给的上涨，从而放慢总需求和产出的增长。如果失业率过高且商业衰退的话，美联储则会考虑增加货币

> 供给，从而提高总需求并增加产出。简而言之，这是中央银行的职责，它是在所有混合经济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部分。

在萨缪尔森的时代里，销量排名第二的经济学教材或许是坎贝尔·麦康奈尔（Campbell McConnell）的《经济学》，这本书重复了萨缪尔森的观点，认为美联储官僚都是忠实地追求“公共利益”的无私（并且，就算不是无所不知，也是相当足智多谋的）公务员。

> 因为它是一个公共机构，【美联储的】董事会的决定都是基于公共利益作出的……美联储银行并不以盈利为目的，相反，它们执行的是董事会推荐的措施……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帮助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且无通货膨胀的总产出。

请注意，这些教材的作者对美联储的评价，都是根据美联储假定的善意来做出的。任何一本教材都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美联储在达成这些光荣目标上的真实记录。例如，一个人要想找到一张图表来展示，从 1913 年美联储成立以来，截止 1989 年，美联储所造成的几十年的价格通胀造成美元贬值了 90%左右，他只会徒劳无功。上述各种说法仅仅是一些愿望，而非对事实的陈述。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美联储总是操纵在政客们的手里，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并非“公众利益”，公共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定

义，且只存在于坎贝尔·麦康奈尔这种幼稚而崇拜国家的评论员的头脑里。

作为政治工具的美联储

在美联储成立的时候，两个团体控制着它：十二位地区美联储银行行长所组成的行长会议，和位于华盛顿的七人联邦储备委员会。1935 年，美联储遭到重组，几乎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成功地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像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第一次新政（1933-1935）违宪之后，试图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最高法院一样。一个“独立”且不涉及政治的美联储不过如此。

罗斯福把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一个强烈支持不负责任的赤字开支和通胀性金融的人——任命为了美联储主席。甚至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其首次出版于 1936 年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来为这种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政策提供学术正当性之前，埃克尔斯就已经是它们的支持者了。在那些年里，罗斯福的美联储最有可能控制在埃克尔斯的政治导师和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手里，因此最终在罗斯福本人手里。

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很明显的是，总统们总是倾向于通过他们的任命权来将“独立”的美联储政治化：他们会任命那些他们觉得会促进他们喜欢的政策的人，以及更重要的，那些帮助他们呆在宝座上的人来当美联储主席。通过让总统知道他们是否会支持并投票给总统任命的人，国会也在推动美联储与生俱来的政治化上插了一手。

在 1978 年四月刊的学术刊物《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里，经济学家罗伯特·温特劳布发表了一篇关于美联储政治化历史的论文。温特劳布说明了美联储是如何在 1953、1961、1969、1974 和 1977 年这些总统更迭的年份里，从根本上转变其货币路线的。为了迎合总统的偏好，美联储的政策经常发生改变，因为想要被再次提名的话，美联储主席必须这么做。

比如，在公开演讲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表达了他希望减缓货币供给的意图。在他的任内，货币供给量仅仅上升了 1.73%，为十年间的最低点。然后，肯尼迪总统公开宣布他支持更快的货币供给。从 1961 年 1 月至 1963 年 11 月，基础货币供给增加了 2.31%。

林登·约翰逊总统甚至要求更快的货币增长来为他扩张福利国家和伴随越南战争的战争国家筹集资金。在约翰逊任内货币供给量翻了不止一倍，增长了 5%——美联储也迎合了他的愿望，就像迎合他的前任们那样。这些货币大幅增长都发生在同一位美联储主席，

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任内，显然，相比实施一个独立而一致的货币政策，他对取悦他的政治领导人更感兴趣。讽刺的是，在这期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们因为主张货币供给应该以一个固定比率每年增长的“货币法则”而广为人知。这很讽刺，因为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们以身为精明的政治分析家和优秀的专业经济学家而自豪。的确，弗里德曼的同事乔治·斯蒂格勒因其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和其他原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享有如此声望，人们会认为弗里德曼应该承认，相信不涉及政治的美联储可以实施其“货币法则”是一件蠢事。

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继任者阿瑟·伯恩斯是一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坚定支持者，以至于因为支持尼克松灾难性的工资与价格控制（尼克松认为这个花招将会帮助他提高连任的机会，但许多学术经济学家都谴责这种做法），丧失了他的全部职业信誉。即使他的员工在 1972 年的秋季通知过他，预计货币供给将在该选举年的第三季度增加极端通胀性的 10.5%，伯恩斯还是确保了货币供给会增长得比这还快。1972 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年，这也帮助了理查德·尼克森的连任。经济学家们把这称之为“政治性商业周期”——这种现象是指刚好在国家选举之前，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临时提升经济，让公众感觉到更加繁荣的希望，使得他们投票给现任政客。

当福特总统为了应对尼克森总统治下伯恩斯的美联储所引发的价格通胀而要求货币供给缓慢增长时，美联储用 4.7%的货币增长率满足了要求。随后，民主党的吉米·卡特总统公开宣布他想要更快的货币增发率时，伯恩斯把增长率上调到每年 8.5%，又一次达到要求。卡特没有再次任命伯恩斯，但根据罗伯特·温特劳布（Robert Weintraub）的研究，美联储试图像它通过在 1980 年总统选举之前，在五个月内以每年 16.2%的速率增加货币供给来帮助尼克松那样帮助卡特连任。

为了让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知道他支持以较慢的货币增长来应对当时已达 13%的通胀率，里根总统与沃尔克进行了私人会面。沃尔克忠实地照做了，而他的继任者艾伦·格林斯潘，赢得了或许是史上最“配合”（总统的）美联储主席称号。就像罗伯特·温特劳布所警告的那样，忽视总统公开声明的美联储主席只能后果自负。

政客们通常不会单独施压美联储主席来帮助自己连任，也不会亲自动手。他们通常会吩咐所有福利国家或战争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受益于通过货币创造和价格通胀（这常常被怪罪在“贪婪的企业”头上）来资助的政府开销工程。反过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也为政客们提供选票和竞选“捐献”。就像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J. 戈登（Robert J. Gordon）在 1975 年于学术期刊

《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所撰写的一篇有关“对通货膨胀的需求”文章中所写的，加速货币供给（以及随后的价格通胀）“不是任性或自私的政府施加给社会的，而是代表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受益者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的选票最大化反应。”

美联储也与国会和行政部门以其他方式弄权。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Edward Kane）在 1980 年的《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描述道，美联储有时志愿充当政客们的政治替罪羊，以换取允许它们通过其购自公开市场操作的政府证券赚取利息收益，从而积累起巨大的行贿基金。凯恩写道：

> 当货币政策受欢迎时，在位者可以声称他们的影响对政策的出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当发现货币政策不受欢迎时，他们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到固执的美联储头上，然后进一步宣称如果他们没有利用一切机会向美联储官员施压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

“独立美联储”的神话是一个障眼法，它企图阻止公众知道美联储的真正作用：为现任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的政治生涯，以及增强和巩固其权力的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充当金主。经济学家们关于美联储应该如何促进经济稳定的论述，完全与美联储未能稳定物价

或稳定失业的历史记录自相矛盾。往好了说，它是不学无术的胡扯；往坏了说，它是刻意编造的宣传。

第三十六章 为什么政府对次贷危机负有责任

“大衰退”时期发生在“次级”房地产市场的诸多违约和抵押品赎回权取消，是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三十年来强制抵押贷款机构向无信誉借款人发出贷款的政策的直接结果。当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为了应对股市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暴跌，推行了保持利率尽可能接近零的政策时，银行系统不可避免地只得把大量抵押借款借给那些勉强合格的借款人。

在利率较高且没有被美联储人为压低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借款人的信用来发放房屋贷款。但是，在利率被美联储人为压低的时候，新增了一类全新的潜在借款人，也就是说，贫困或低于平均信用等级的人，仅仅是因为低利率让月供变得更低，他们才刚好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一旦发生衰退，他们的收入下降，成千上万名这种处于信用合格边缘的借款人便会违约。其他那些领取可调节利率抵押的人发现，由于他们总是处于无法还清月供的边缘，利率增加一点点都会导致他们违约。

除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刺激了不可持续的次贷市场以外，美国政府 1977 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卡特政府的这个法案强迫银行放贷给那些低收入的借款人，和法案支持者们所说的“有色人种社区”——他们相信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标准，这些人将难以获得抵押贷款，即这些人在经济上没有达到借钱买房的标准。

《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最初支持者是支持卡特政府的死忠、极左份子，特别是像“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以下称为 ACORN）这样的“邻里组织”。巴拉克·奥巴马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就曾为 ACORN 担任律师和“社区组织者”。

通过一个听起来很像合法化敲诈的过程，ACORN 这样的所谓“社区组织”从《社区再投资法案》那里获利甚丰。有四个联邦政府的机构执行了《社区再投资法案》：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储蓄机构管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这份法案建立之后，如果 ACORN 这样的“社区组织”发起了关于《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抗议”，这四家官僚机构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推迟或取消提议的任何银行合并、分行扩张或者分行成立。这将耗费银行大量资金，而各种“社区团体”使用银行的这种顾虑作为手段使自己发财。作为对撤销抗议的交换，他们要求银行给他们数百万（有时候是数十亿）

美元，同时要求银行许诺另外发放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的不良贷款给那些不符合资格的次贷借款人。

一位名为布鲁斯·马克思（Bruce Marks）的人变得臭名昭著，他作为一名波士顿的“社区组织者”，施压当地银行把数十亿美元给他的“美国邻里援助公司”。有一次他对《纽约时报》夸耀，由于《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投诉，他从银行那里“赢得”了总计 38 亿美元的贷款承诺。而这只是一个城市里的一家“社区团体”。

有了《社区再投资法案》，美国所有城市的银行都被迫持有不良贷款的投资组合。为了补偿美联储强加于他们的额外系统性风险，许多银行提升了抵押贷款的收费，迫使那些合格的借款人补贴银行由于《社区再投资法案》导致的不良贷款损失。这些银行出于本能，同时也对那些固有风险较高的次贷收取更高的利息。

而各类社区组织叫嚣称银行的这些手段充满歧视与掠夺意味，并且他们为了禁止这种收费，而试图游说以通过“反掠夺性质的”贷款法。他们在许多州都获得了成功，以迫使银行吞下次贷所导致的损失。

波士顿的美联储公布的一篇标题为《减小差距：机会均等借贷的方针》的文章，揭开了整个《社区再投资法案》骗局的谜底。就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在借款能力上不同的人群是有差距的：一种

是有足够收入的可以承担起特定数额抵押贷款的人，而另一种则是没有足够收入从而没有获得相同贷款的资格的人。当然了，按照这种标准而言，这两种人在是否有车，日用品购买，或者是否有承担两周度假能力上也是有差别的。波士顿美联储的研究威胁称要使用国家的强制权力，通过给抵押贷款的放贷方施加压力，来使他们给那些不具有资格的人发放更多的不良贷款，从而减小这种不同人之间“获得房贷的差距”。

除了制造更多的不良贷款意外，美联储还督促银行在招聘决定中给予少数族裔更多的配额，而想必美联储也认为这些少数族裔的信贷员更倾向于给那些少数族裔的人群发放更多的不良贷款。

波士顿美联储声称这篇文章仅仅提供一个“借贷方面的方针”，但很明显对任何抵押贷款机构而言，若不能服从美联储的“方针”的话将会导致极为严重的金融惩罚。一份有关报告特别着重指明这一点称：

> 对于不能遵守《平等信用机会法》或规则 B 的，其个人或集体将承担实际及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个人将承担高达 1 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集体将承担高达 50 万美元或债权人净资产 1%的赔偿。

所有的抵押贷款机构——银行，独立抵押公司等等——都被告知他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有关《平等信用机会法》（的规则 B），《公平住宅法案》，《住房按揭贷款信息披露法》（的规则 C），以及《社区再投资法案》”等法律和规章制度。一个“尽责的【银行】董事会会承认与不合规相关的潜在责任”。

美联储指示抵押贷款机构在他们遇到“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的时候，忽略传统的信誉评定标准。传统的贷款标准包括类似收入证明一类的“任意或不合理的信誉评定”。但当贷款机构为了“迎合城市低收入非典型借款人的经济状况”时，他们被要求对这些借款人采取“特殊的标准”。比如，传统的贷款标准会考虑类似年龄，房屋地点，房屋状况等要素，但按照美联储的观点，贷款机构在标准面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的时候应该废除这些标准。

美联储指示贷款机构在面对这些特殊人群时，应该忽视传统的针对月收入所制定的抵押还款率。但不必担心，美联储承诺将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来从银行手中购入贷款，之后将贷款卖入“二级市场”来捆绑这些抵押贷款及将贷款变成证券的手段，来清除银行由于大量给无资格借款人发放不良贷款所带来的风险。

当然，美联储同时也指示抵押贷款机构，当遇到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时，忽视他们“缺乏信用历史”的现象。美联储称，

（对这些人而言）“成功参与过信用咨询”便可足够代替真实信用历史了。

对于“普通”的借款人而言，找不诚实的房地产评估师做假评估报告是将会导致刑事处罚。但对于美联储的大爷们——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而言却并非如此。若一位次贷借款人在房地产鉴定上遇到问题导致无法获得贷款的话，美联储将会很乐意帮他们去找“另一位有经验的评估师”，他很可能会帮助这些次贷借款人在评估意见书上造假。

打着提高置业率的旗号逼迫抵押贷款机构发出数十亿美元不良贷款的行为，埋下了银行业危机的种子，而政府为了避免危机爆发，试图采取“证券化”的伎俩。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伊始，国会命令房利美和房地美从抵押贷款机构手中购入《社区再投资法案》的贷款，将其打包在一起以“证券”的形式卖给所谓的二级市场。

2007 年 3 月 30 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一场题为“社区再投资法案：发展与新挑战”的演说中吹嘘这种充满小聪明及道德优越感的政策。根据伯南克的说辞，这篇演说是政府庆祝《社区再投资法案》通过三十周年的一部分。

如同贷款流入二级市场般，将经济适用房贷款证券化的行为愈来愈多。这一现象部分来讲是 1992 年一份要求政府资助的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达到经济适用房目标上付出更大努力的法律的结果。

除了伯南克在演说中所提到的 1992 年的法律以外，1994 年的《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和分行效率法》进一步放松了银行合并的监管门槛，从而增强了诸如 ACORN 一类的极左派“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金钱。就像伯南克所解释道的那样：“许多游说组织基于《社区再投资法案》来凭借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对各大银行做出反击。”换句话来讲，《社区再投资法案》从一开始就鼓励的这种“合法化诈骗行为”开始了进一步扩张。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伯南克称“很多银行开始因此将更多的资源花费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的工程中。”

这还并非全部。1995 年，美国财政部决定，政府应通过纳税人支付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利用可以直接贷款给次贷借款人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来直接介入无资格借款人的不良贷款业务。同时，政府与美联储及其执行机构开始对银行施压，要求他们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不使用诸如存款数额、信用历史、收入验证、及相对于月收入的贷款额度的传统的贷款资格标准。

到 2003 年，一家名为全国银行（Countrywide Bank）的金融机构，因为发放了大量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贷款——超过 6 千亿美

元——而被房利美授予特殊奖项，使其在舆论中成为了其他银行的楷模。但因为发放了大量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贷款，全国银行之后很快就破产了。

第五部分 工人与工会

第三十七章 政府雇员工会的政治经济学

美国许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似乎一直处于财政危机的状态，它们的政客在不断计划提高隐性（和不那么隐性）的税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大部分所谓“服务”，都是通过有工会组织的政府垄断机构来提供的。

和私营部门的工会相比，政府雇员工会的权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的工作单位大多是垄断机构。比如，杂货店的雇员罢工让杂货店或连锁店关门的时候，顾客可以去其他地方买东西，且杂货店的管理者完全可以雇用替代的工人。相反，当一个城市的教师工会或垃圾车司机工会罢工时，只要罢工还在进行，就不会有人教书或收垃圾。这给了政府工会极大的权力去讨价还价，因为民选官员必须应付选民对没人教书或收垃圾的强烈投诉，只好迅速满足工会的需求。

此外，公立学校的教师经常在只工作了两三年的时候拿到终生教职，而且，公务员的规章制度也让雇用替代人员的成本极其高昂——如果还可以雇人来替代的话。因此，在政府官僚罢工的时候，

他们有能力无限期地关闭他们所在的整个部门。这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近十年来疯狂上涨的主要原因。

几十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政府在公立学校的每个学生身上花钱越多，学生的表现就会更差。相似的结果在政府的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就像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写过的那样，政府官僚——特别是加入工会的官僚——就像经济上的黑洞，在这里增加“投入（即花在政府工程上的钱）会减少“产出”（即学生表现、贫困等）。花在公立学校上的钱越多，学生们受到的教育就越少。花在福利制度上的钱越多，贫穷就越普遍，等等。这与自由市场中的正常经济生活是恰恰相反的，在自由市场里，增加投入会让产出和服务**更多**、更好，而不是更少。

在政府里不存在（用利润）奖励改进产品和削减成本，同时（用损失）惩罚成本过高和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的市场反馈机制，因为在政府中不存在会计意义上的利润和损失。事实上，在政府里激励是反的：政府官僚的表现越糟糕，在用“糟糕的表现不是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作为借口之后，他们得到的钱会**越多**。

经济学文献中有许多研究显示，相比同等教育水平的私营部门同行，政府官僚的工资和福利更高。政府雇员工会的庞大权力，有效地把征税的权力从选民那里转移到了工会手里，而这因此显然是

不民主的。因为政府雇员工会可以轻易地迫使民选官员提高税率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是工会而非选民在控制税率。他们是这种特殊的无代表的纳税[41]（并不是说**有**代表的纳税就好一点了）的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州会有法律禁止政府雇员工会罢工。

政客们受制于政府雇员工会的政治束缚：如果政客们对工会的工资要求低头，并加税来为他们的要求提供资金，这些政客在下次选举中被愤怒的纳税人踢出局的概率就会增加。长期以来，“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手段一直是给政府雇员工会稍稍增加工资，但给他们不菲的养老金。这使得政客们可以在迎合工会的同时，把成本推给未来，在自己高升或从政界退休很久之后。

政府雇员工会的首要利益甚至不是工会成员的福利，而是工会自身作为一个组织的福利。工会的头头们主要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运作工会。因此，他们会把公务员的规章制度当做工具，来保护每一个政府官僚的职位——无论这些人有多么无能或失职。对工会的头头们来说，政府官僚减少意味着会费降低，以及获得丰厚的薪酬和福利的可能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当政府试图解雇雇员，甚至是解雇那些有犯罪行为的雇员的时候，政府雇员工会经常发起诉讼（或威胁）。

[41] “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一句著名口号，起源于 18 世纪 50 年代和 18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此口号概述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这也是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译者注

比如，解雇一名不称职的公立学校教师要花上数月或数年之久的法律纷争。政客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明白，更方便的策略是用薪水更高的管理职位来奖励这些无能的雇员，他们会欣然接受这些职位。这解决了抱怨孩子的数学老师不会数学的家长的问题，同时也消除了工会起诉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公立学校的管理层都是自命不凡的官僚主义怪物，这些教师不会教书，反而被授予了“管理”整个学校系统的职责。没有私立学校能在这种有悖常理的体制下存活下来。

政府雇员工会也是“额外雇工”的拥护者——这种由来已久的工会手法会迫使雇主雇用超过所需数量的员工。如果这发生在私营部门，由于竞争，更高的工资成本会让公司利润下降，或者导致其破产。在政府垄断机构里不存在这种事。对政客和官僚们来说，额外雇工是一种“双赢”行为，但对纳税人来说，这却是一种掠夺的来源。工会甚至能收到更多的会费，而政客们也可以通过分发更多的优惠职位来获得功劳。纳税人们却得到了更高的缴税单。

每个政府雇员工会都是一台政治机器，它为了更高的税率、增加政府开支，更多的额外雇工和更多的养老金曾诺而不断进行游说，同时把那些犹豫不定的纳税人妖魔化成对孩子、老人、寡妇、孤儿和穷人等毫不在意的敌人。这是弗里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在他的名著《论法律》（*The Law*）中写过的老式社会主义

伎俩。比如，工会不会把学校私有化的倡导者描绘成对一个失败体制的正当批评者，而是会把他们描绘成憎恨孩子的人。他们不会把福利国家的批评者当成担心福利国家摧毁工作积极性并削弱家庭的人，而是会把他们当成仇视穷人的人。

工会化、政府经营的垄断机构把美国人变成了奴仆而非政府的主人。年复一年，政府花了越来越多的钱，提供的“服务”却一年比一年劣质。它们是社会主义失败的典型范例，应该被废除。它们提供的任何具有真正需求的服务，都可以由私营、竞争性的市场以更好的质量和更低的成本来提供。

第三十八章 工会与生俱来的暴力

想象一下，开一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的咖啡店。 然后想象一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生意的咖啡店出现了，开始以更低的价格与你竞争客户。你试着用这些手段作为回应：谋杀竞争对手，用刀、棒球棍、大棒子和拳头攻击他们和他们的员工，破坏他们的车辆和工作场所，对他们的建筑纵火，给他们的咖啡里投放老鼠药，或当他们离开咖啡店的时候朝他们扔石头，甚至用炸药炸毁他们的建筑。

这些做法会被当成和平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么？很明显不会；上述这些行为纯粹是谋财害命和犯罪行为。它们也是美国工会运动所固有的定义性特征。

只要基本理解初级劳动经济学和工会主义的历史，就能解释为什么暴力一直是私营部门工会的**固有**特征了。在历史上，要把工资提高到高于个体劳资双方竞争出来的水平，工会的主要“武器”一直是罢工或罢工的威胁。但是，为了让罢工有效，为了让工会变得对工人重要，就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暴力和胁迫来让竞争的替代工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就像美国劳动部前首席经济学家摩根·雷

诺兹（Morgan Reynolds）博士在他《权力与特权：美国工会》（*Power and Privilege: Labor Unions in America*）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

> 工会的问题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有组织的罢工者们，为了迫使他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提高到超出自由市场的水平，必须关闭企业，并且对所有人——那些不合作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幻想破灭的前罢工者和雇主——关闭市场。如果公然抗拒罢工者的人太多……那么工会成员就常常会采取暴力手段。除非工会成员可以阻止雇主在劳资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雇用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否则工会成员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实施没有竞争力的工资率的。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工会必然十分活跃地干涉劳工市场的贸易自由。

因此，罢工——和总体而言的工会——代表着参加工会的工人和没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根据雷诺兹，工会对那些非工会的工人（被描述成“工贼”和“叛徒”）所采取的传统策略包括：群众纠察、辱骂、威胁、朝他们扔石头和水瓶、追车、骚扰电话、人身攻击、破坏财产，甚至是谋杀。

实际上，工会的暴力行为比雷诺兹对其的描述还恶劣得多。1983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业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本 540

页厚的书，本书名叫《工会暴力：法院，议会与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记录与反馈》，作者是小阿尔芒·J. 西伯勒特（Armand J. Thieblot, Jr.）教授和托马斯·R. 哈格德（Thomas R. Haggard）教授。这本书提到，雇主也会在处理劳动纠纷时采取暴力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会就对了。有一些书是关于雇主暴力的；而西伯勒特和哈格德用文件证明了，工会暴力行为就像雷诺兹所说的，是工会所**固有**的。

在调查了数十年来的报纸报道和司法记录之后，两位作者写道，工会暴力

> 充满了谋杀、意图致死的攻击、破坏财产，纵火，蓄意破坏，蓄意伤害、枪击、刺杀、殴打、丢石头、炸药破坏、恐吓和威胁——总之，在身体上、言语上和心理上的各种虐待。

在工会是暴力和财产破坏的肇事者时，警察和司法系统常常网开一面。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警察自己也是参加工会的，并且他们会认为罢工的工人是他们的“工会弟兄”。而司法系统在处理工会暴力时就和他们处理其他事情一样低效和腐败。

西伯勒特和哈格德解释了为什么暴力和强迫行为是工会主义的固有特征：它们被用作了一种组织工具；它们被来产生对工会要求

的恐惧和服从；它们被当成讨价还价的策略；它们被用作吸引注意力的工具，人们希望它们能产生压力来达成他们想要的协议；它们被用作维持罢工的执行机制；它们被用来警告那些考虑与非工会同伴签署雇用合同的雇主；它们被用作一种防止罢工期间非工会雇员工作的手段；它们还被当成一种产生普遍恐慌的手段，就像犯罪团伙为了消除任何潜在竞争者一样。

西伯勒特和哈戈德调查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近百个案例，以及数千起几十年间有关工会暴力司法记录和报纸报道，结论是“从这些例子来看，暴力似乎是劳动关系和集体谈判过程中的固有部分，或者说至少对暴力的使用非常广泛。数据库里的 2598 起案例涉及到 131 家不同的工会。”他们进一步总结道，暴力的全部意图是“通过公然的、常常不受惩罚的暴力和胁迫来达成工会的各种目标。”

第三十九章 工会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基础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著作《人的行动》中写到，劳动工会主义以及根据它制定的政府劳动政策，其主要意识形态基础包含了雇主对工人“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这样的错误观念。

在劳工市场中，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确保了工人的报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紧密相关的。更准确而言，报酬取决于其“边际收益产品”，它等于边际物质产品（marginal revenue product）——工人在一段给定时间内生产了多少商品或服务——乘以消费者为这些物品所支付的最终价格。

如果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他们会因此变得对雇主更有价值。而边际生产力提高是由雇主的资本投资（这让劳动更有生产力并因此变得更有价值）、技术进步（通常是雇主投资研发的结果）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各种教育、培训、经验和学习的结果）造成的。

如果消费者需求强劲，提高了工人们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他们也变得对雇主更有价值。这也会增加他们的边际收益产

品，因为对劳动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来自消费者对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里，如果雇主想要剥削他的部分或全部雇员，他只能为他的对手制造盈利机会，从而损害他自己的公司。假如一个雇员的边际收益产品是每周 500 美元，但他每周只能挣到 200 美元，其他参与竞争的企业家就会用 300 美元、400 美元或更高的价格来雇用他，因为这样做他们仍然能够盈利。就像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所写道的那样：“于是，将会有些想利用现行工资率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而谋利的人出来活动。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将使工资率达到由劳动边际生产力所限定的高度。”

即使一些雇主的确在通过支付给雇员比边际收益产品更低的工资来剥削他们，现在也尚不清楚雇主是主要的受益者（如果雇主会受益的话）。产品的市场竞争可能会迫使他们把省下来的这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来压低产品价格，最终通过提高工薪族的实际工资来让他们受益。

要剥削工人，可以想象的唯一方法是出现一个雇主的普遍卡特尔，这个卡特尔经营着一个牢靠的卡特尔，各位卡特尔成员无法作弊，所有雇主都同意只支付剥削性的工资。这种场景——普遍的剥削工人——的唯一已知案例，就是国家作为垄断雇主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下这不曾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原因是总所周知卡

特尔成员们总是会互相欺骗。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写道：“我们曾经论证，在自由市场经济里面的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绝不会发现这样的卡特尔存在。”

“资本家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这一谎言的支持者，也同意“劳动”是同质的这一谬论。米塞斯也解释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 在劳动市场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提供某些特定劳务的特定劳动。每个企业家是在寻找适于完成他计划中的特定工作的那些工人。他必须把这样的专门人才从他们当时的工作部门拉出来。要达成这个目的，唯一的方法是给他们较高的工资。一个企业家所计划的每个创新……都要雇用当时已在别处受雇了的工人。

实际上，与“更大的议价能力”这一断言截然相反的是，工会代表经常伤害工人们。一方面，工会只能造福它们的部分会员——那些没有被高于市场的工会工资水平挤出市场的工人。其他工会成员，通常是那些工作经验最少、资历最浅的人，将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当他们在其他包含非工会劳动力的领域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尽量压低自己的工资。一般来说，工会工人的利益几乎都建立在非工会工人的损失之上。

工会化的一般后果是降低工资的分散程度，因为付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工人的工资被拖向了中间值，而生产力最低的工人的工资被推向了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水平。工会化因此在惩罚那些最努力的、最雄心勃勃的工人，同时补贴那些生产力更低、毫无斗志的工人。这是雇主有时会大力避免工会化的许多原因之一：奖励平庸而惩罚优秀的工作表现是企业失败的秘诀。

第四十章 是市场而非工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而安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人的行动》里写道，在他的时代，工会一直是反资本主义宣传的首要来源。一张保险杠上的贴纸让笔者想到了这一点，这张纸上写着："工会运动：给你带来周末的人"。

实际上，在工会开始为最大工作时间立法游说之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一直在减少了。是资本主义而非工会主义让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 1870 年的 61 小时减半到今天的 35 小时左右（根据美国劳动部）。就像米塞斯所解释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每人平均投资额有个稳定增加的趋势。……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率以及工人的生活水准，趋向于继续上升。"

当然，只有在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和经济自由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这才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主要是因为承担企业家风险和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技术进步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劳动力（并不是因为逐步拉低美国人水平的公立学校）。工会一如既往地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同时追求那些

试图阻碍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这些制度正是其自身繁荣和存在的原因。

更短的工作时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明，因为随着资本投资导致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随时间增加，生产同样产出所需的工人变少了。或者说，同样的付出将生产更多的产品。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雇主将通过为最佳雇员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来争取他们。那些不提供更短工作时间的雇主要么在竞争的压力下提供更高的补偿工资，要么在劳动力市场里变得没有竞争力。

资本主义竞争也是导致童工减少，或（在一些社会里）完全消失的首要原因。年轻人原本是因为自身和家庭的生存问题而离开农场到艰苦的工厂工作。但是，随着工人们拿到更高的工资——感谢资本投资和随后的生产力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把孩子留在家里让他们上学。工会支持的禁止童工立法，是在童工已经开始减少之后才出现的。

此外，促进设立童工法的动机常常是工会想把不属于工会组织的年轻工人们踢出就业市场，而不是“保护”他们。在今天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童工的替代选项是行乞、犯罪、卖淫或挨饿和无家可归。工会提倡童工法，同时假装是为了儿童的幸福，没什么东

西比这更伪善了。他们的动机是以年轻、不属于工会的工人为代价，让工会的劳动垄断劳工力市场。

各个工会也吹嘘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里，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支持了安全监管。美国人的工作环境的确比上个世纪更安全，但这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竞争的力量，而非工会所激发的立法或监管。

对雇主而言，一个不安全或危险的工作环境是代价高昂的，因为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补偿差额（即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工人。因此，雇主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去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在工资经常占总成本的主要部分的制造业更是如此。此外，雇主也必须承担损失工时、训练新雇员和政府规定的工伤赔偿的成本。更不用提昂贵诉讼的威胁了。

对技术的投资，从有空调的农用拖拉机到在汽车厂中使用机器人，也都让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安全。工会**反对**了多项这样的提高安全的技术，理由是它们会“消灭工作”。

工会一直在游说加强对企业（即对资本）的监管和征税的前线上。监管和征税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降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把管理者的注意力从管理转移到填写政府文书工作上，因此，导致所

有人——包括工会成员——在经济上都变得更糟。也就是说，除了因这种监管而获利的政府官僚之外的所有人。

工会所支持的对企业的监管和征税导致生产力提高变慢，这导致经济产出的增长率降低，反过来造成许多行业的价格变得比本来应该的价格高。所有这一切都会通过减少“工人们”（这些工会宣称要“代表”的人）的真实工资来伤害他们。反资本家的宣传也是反工人的宣传。

第四十一章 工会针对沃尔玛员工的阴谋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无数大学生（和其他人）开始相信沃尔玛是一家邪恶的企业，正派人不应该与其做生意。演讲嘉宾们出现在全美各大校园，谴责沃尔玛对穷人和工薪阶层所谓的压榨。它是工会所组织的主要针对非工会沃尔玛**雇员**的抹黑运动的一部分。它也是一次施压沃尔玛加入工会，或者将其作为高价工会商店的低价竞争对手一举摧毁的尝试的一部分。

看起来永不停歇的反沃尔玛宣传运动，在对工会的学术文献中被称为“全体运动”（corporate campaign）。现在，工会已经几乎不再组织罢工，因为罢工的工人们可以轻易地被其他工人所取代。所谓的“全体运动”取代罢工成为了工会的可选武器。

全体运动有几大原因。第一，它们是一种不涉及工人的劳动力工会化方式，因为工人可能会不希望被工会化。这种想法是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增加公司的成本，并用负面宣传（把公司描绘成某种犯罪团伙）来吓跑它的顾客。一种策略是向监管者发出数千起对公司的投诉，监管者肯定就会调查这些投诉，让公司花掉巨额的法律费用。工会也会发布关于该公司遭到大量投诉的新闻稿，却绝对不

会提到它——工会——就是这些故意投诉的源头！如果名声足够糟糕，一个公司会损失很大一部分顾客。在 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另一家非工会连锁超市雄狮食品（Food Lion）的全体运动导致这家连锁超市关闭了数十家分店。在顾客们发现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UFCW）对雄狮食品的诽谤不实的时候，雄狮食品的分店也随之重新开业了。

在马里兰州，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对沃尔玛的妖魔化使得州议会有了足够的“借口”来通过一份法律迫使沃尔玛——而不是在州内运营的其他企业——提高其为员工提供的医保额度。

全体运动（就像针对沃尔玛发起的这次）的终极目标，是在甚至没有雇员参与的情况下让公司签署工会的合同，这个过程被研究工会的学者称为“按钮工会主义”。

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充当针对沃尔玛的全体运动的先锋，是因为沃尔玛的杂货价格比所有工会化杂货店都低得多。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所面临的“问题”是越来越的顾客选择去沃尔玛购物，杂货业的就业也将从高价的工会连锁店转移到非工会的沃尔玛，导致工会损失会员和（最重要的）工会会费收入——这是工会头领昂贵的工资和额外收入所必需的。

第四十二章 “血汗工厂”是如何帮助穷人的

关于资本主义，一个最古老的神话是这样一个印象：工厂为穷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吸引他们告别街头（和乞讨、偷窃、卖淫或更糟糕的生活），或是抛弃辛劳繁重的农活，不知何故却让他们更加贫困并且剥削他们。这些人为了“仅能糊口的工资”，工作在被称之为“血汗工厂”的地方。这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主张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提出来的，今天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这种看法——这些人大多从未亲自干过任何体力活，没在工作的时候流过一滴汗。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工会的贪婪和自私表露无遗：如果不以某种方式禁止来自非工会劳动力的竞争，工会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工会开始谴责那些没加入工会的工厂是“血汗工厂”。

美国的各家工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穷人的困境没有一丁点关心。它们关心的是各自工会组织的财政状况。如果工会的企图得逞，那么第三世界里那些在美国公司经营的“血汗工厂”里工作的工人，

将会失去工作，沦落到靠乞讨、偷窃维生或更糟糕的地步。工会在全美各大学校园成功煽动起“反血汗工厂”的运动、研讨会和抗议，而这就是它们所自我标榜的“道德高地”。

经济学家本·鲍威尔（Ben Powell）和大卫·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2007 年在《劳工研究期刊》（*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上发表一篇论文，这篇文章调查了 11 个第三世界国家里的“血汗工厂”，揭露了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欺骗性本质。在 11 个国家的 9 个当中，位于那里的外国“血汗工厂”工资高于平均水平。在洪都拉斯，近一半劳动人口每天靠 2 美元维持生活，而“血汗工厂”的日薪是这个数字的六倍——13.10 美元。根据鲍威尔和斯卡贝克，在柬埔寨、海地、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血汗工厂”的工资至少是全国平均工资的 2 倍以上。

从来都不是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的工人在抱怨非工会工厂的存在——这样的工厂让他们的收入立即翻了 5 倍。由于有更多（和更便宜）的消费品在这些国家销售，人们作为顾客和工人都会受益于这样的状况。这种资本投资远远好过另一种选项——“外国援助”。所谓的外国援助总是政府之间的资金转移，这让受援助国的政府——甚至是那些腐败和专制的政府——有了更大的权力。基于市场的资本投入总是会比政治化的资本再分配好得多。

对第三世界的外国投资，也有潜力向那些原本缺乏商业知识的国家转移商业知识。外国投资转移的不仅仅是技术，也是有关商业实践的知识和整个资本主义与创造财富的文化。离开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应对贫困上取得进步。

外资工厂在穷国的存在，创造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集聚经济”。工厂的建立会使得各种各样的公司在工厂附近萌芽，它们为工厂本身充当原料供应商，以及为工厂的雇员提供服务（比如餐馆等）。因此，被创造出来的不仅仅是工厂的岗位。对穷国的成功投资，也会向其他潜在投资者发出信号，表明这里投资环境稳定，进一步带来更多的投资、就业，和更大的繁荣。

外国投资者对穷国的的资本投入，也会通过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让工资上涨。阻碍这样的投资是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目标，只会适得其反，造成工资增长的停滞或萎缩。

在第三世界存在“血汗工厂”的最大好处，是它们削弱了美国工会的权力。除了极少数例外，工会一直是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急先锋，也是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政府干预主义的支持者。因此，工会越弱，美国工人的处境也会越好。

作为一个普通人，支持第三世界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多购买设立在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第六部分 关于市场的真相与谎言

第四十三章 关于“强盗大亨”的真相

19 世纪末常被称为“强盗大亨”的时代。把这个贬义词和约翰 • D. 洛克菲勒、康内留斯 • 范德比尔特这样的人物，以及格伦威尔 • 道奇、利兰 • 斯坦福、亨利 • 威拉德、詹姆斯 • J. 希尔等 19 世纪铁路经营者联系起来，是各种历史书的一大主题。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企业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窃，以顾客为代价让自己发财。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贪婪、剥削的资本家形象，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

虽然“强盗大亨”这个说法非常常见，但大多数使用这个术语的人都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并且，没有做出这个重要的区分——区分可以被称为市场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的两种人。一个纯粹的市场企业家（或资本家）通过在自由市场中销售更新、更好和/或更便宜的产品来获得财务上的成功，而不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政府补贴。他作为资本家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取悦顾客的能力，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最终在经济上发号施令的是顾客。相反，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靠影响政府补贴他的企业或工厂，或者靠立法和监管来损害他的竞争对手。

美国经济总是包含着市场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的混合——自力更生的人与政治同谋者和操纵者同在。有时，在人生的一个时刻通过市场企业家精神获得成功的人会在人生的另一个时刻蜕变成政治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而政治企业家精神不是。后者利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掠夺顾客和竞争对手。它是“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在他 1776 年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42]中批判的政治制度类型——的一种形式。

修铁路对被修铁路

许多商业史学家假定，离开政府的补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将永远无法建成。这种理论声称，自由市场将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本。这种理论的证据是在美国内战多年后建成的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每一英里都以低息贷款和大规模土地补助金的形式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补贴。但这里并不需要因果关系：修建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并不需要补贴。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正如 19 世纪初许多道路和运河都是私人出资的，一位名叫詹姆斯·J. 希尔的市场企业家修建了自筹资金的洲际铁路——大北方铁路。在没有任何政府补贴，甚至没有公共土地通行权的情况下，希尔修好了大北方铁路，他对此非常自豪。他花钱为自己的铁路买下了通行权，连印第安土地的通行权都买下来了。

[42] 即《国富论》——译者注

希尔强烈反对把政府优惠授予他的竞争者。在《詹姆斯·J. 希尔与西北的通路》（*James J. Hill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west*）中，传记作者阿波罗·马丁（Albro Martin）引用了希尔的话："除了大量的土地补贴之外，政府也不应该为了让那些公司能与不靠公共财政补助的公司开展业务竞争而为它们提供资金。"

詹姆斯·J. 希尔不是"大亨"或贵族。他的父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他因而辍学去杂货店打工，并用每个月四美元的收入来帮助他的寡母和兄弟姐妹。年轻的时候，他在农场、航运、轮船、皮毛贸易和铁路公司工作过。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学会了经商之道，存下了资金并最终成为了他自己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

在政府资助的北太平洋铁路搞垮了明尼苏达铁路之后，希尔和他的几位合伙人收购了破产的明尼苏达铁路，从而投身了铁路行业。银行家杰·库克（Jay Cooke）在美国内战时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资助者，北太平洋铁路原本是政府回报他的"奖赏"。但库克和他的北太平洋铁路同事们却鲁莽地修铁路；由于政府的补贴和赠地是以铁路里程为基准的，所以库克和他的同伙们就有了尽快修路的财务动机，这只会鼓励草草完工。结果，北太平洋铁路在 1873 年破产。根据《詹姆斯·J. 希尔：西北的帝国建造者》（James J. Hill: Empire Builder of the Northwest）的作者、历史学家迈克尔·马龙（Michael Malone），在铁路建设所在的明尼苏达和达科他，人们

认为库克和他的同伙“往好了说是一帮游民，往坏了说是一群小偷”。

希尔和他的合伙人们花了五年时间，买下了铁路（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和马尼托巴），这段铁路成为了他最终一路修到太平洋的铁路的核心。希尔看不起库克和北太平洋铁路的不正当买卖和腐败，他很快就展现了他在铁路建设上的天才。在希尔的掌管下，工人们铺轨的速度是北太平洋铁路工人的两倍，并且，即便以这样的速度，他还是修出了让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品质最高的线路。希尔小心谨慎地降低成本，而他的成本削减以更低费率的形式传递给了他的消费者。希尔明白，农场主、矿工、木材商和光顾他铁路的其他人将与他荣辱与共。他的座右铭是“要富一起富，要穷一起穷”。

为了践行这一哲学，希尔鼓励他的铁路沿线的农民尽可能进行多样化种植，教育他们依赖单一农作物经济风险。他为遭受干旱和欠收的农民免费提供谷种甚至家畜。如果移民承诺在他的铁路附近耕种，他只收 10 美元就肯把他们运到大平原；他还捐赠土地给各个城镇用于公园、学校和教会。

希尔的费率一年年逐渐降低，而在农场主们开始抱怨在铁路沿线缺少存储谷物的空间时，希尔让他公司的管理者们修建了更大的谷仓。伯顿·福尔瑟姆（Burton Folsom）在《企业家对国家》（*Entrepreneurs versus the State*）里写道，希尔拒绝参与和其他铁路

主一起固定价格的商业阴谋，并且揭示了“价格屠夫和【这种】联合协议破坏者的作用”。

福尔瑟姆这样描述了希尔对追求卓越的强迫症：

> 希尔痴迷于尽可能短的路线、尽可能低的坡度和尽可能少的转弯。1889 年，希尔通过找到传奇的玛丽亚斯山口征服了落基山脉。刘易斯与克拉克在 1805 年描述了一个穿过落基山脉的低位山口；但后来似乎没有人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如果它确实存在，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希尔非常追求最佳的坡度，所以他雇了一个人用数月的时间在蒙大拿西部找这个传奇的山口。他确实找到了这个山口，欣喜若狂的希尔把他的铁路线路缩短了几乎一百英里。

由于这样的行为，历史学家迈克尔·马龙写道，大北方铁路是“世界所有主要铁路中建造最佳且盈利最多的一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补贴的洲际铁路是一场腐败和低效的狂欢。对每一英里轨道，政府都会给它设立的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政府赠地和低于市场利率的贴息贷款，在平地上修建的轨道是每英里 16000 美元；丘陵上是每英里 32000 美元；山区里是 48000 美元。结果，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建造了大量曲折和迂回的铁路来侵吞更多的补贴。根据伯顿·福尔瑟

姆，两家公司重视建设速度而非工艺，并且经常使用最便宜的建筑材料。福尔瑟姆写道，它们是如此腐败和低效，以至于在几尺高的冰雪上铺架轨道，“在春天这些线路理所当然要重修。”

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的管理层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缩短路线，并促进铁路沿线的经济繁荣，相反，他们更喜欢在车厢里用华而不实的大餐宴请政客和官僚，并常常在饭后从车上猎杀水牛。

作为赞成补贴的条件，许多国会议员要求把单独的铁路线路修到他们的选区，导致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的路线图看起来像一碗意大利面。此外，由于政府对企业的任何补贴都常常伴随着监管，离开美国国会的直接干预，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的管理者几乎无法做出任何重大商业决定。结果是恶劣的经济低效、腐败和破产。

希尔在几十年里继续降低费率，并擅长为他最大的顾客提供大量的折扣。低效、政府补贴的铁路为此非常恨他，因为希尔的降价暴露了他们的低效和无能。政府用 1887 年的《州际商业法》报复了希尔的降价，这份法案禁止了像大量折扣这样的“价格歧视”，随后是 1906 年的《赫本法案》，这份法案使对不同顾客收取不同费用的行为变得非法。他们禁止了降价，换句话说，就是强迫所有人都

付同样的高价。因为希尔和他的顾客是大北方铁路减价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他们是新立法的最大损失者。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铁路业的自由市场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抢劫”。真正的恶棍是受政府补贴的铁路公司的经营者，以及他们在国会和政府行政机构里的政治庇护人。

第四十四章 关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真相

一个古老的经济学神话是：在 19 世纪末——一个价格**通缩数十年**的时期——美国工业的垄断十分猖獗。就像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他的《反垄断经济》（*Antitrust Economic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据说当时“卡特尔化猖獗”。根据“主流”观点（但不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这种“猖獗的”垄断，和所有形式的垄断一样，都会导致产量减少和随之而来的更高价格。据说消费者成了垄断横行的自由市场的牺牲品。

这种神话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联邦政府介入其中，且通过实施 1890 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相当英勇地从贪婪的资本家手中拯救了美国消费者。因此，反托拉斯法据说是一种符合“公共利息”的法律，以应对作为一种“市场失灵”的垄断。但这些故事的每一句话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在一篇发表在 1984 年 6 月《法律与经济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上的文章里，笔者表明

了美国工业在 19 世纪末期的实际上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且《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真实意图是扼杀而非保护竞争。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弟弟）和他的国会同僚们开始指责各行各业的“限制交易”和对其产品收取垄断价格的行为。实质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禁止了“限制交易的阴谋”。整个第 51 届国会的《议事记录》上全是这样的指责。这些行业包括盐业、锌矿业、钢铁业、烟煤业、钢轨业、制糖业、铅矿业、烈酒生产业、纱线业、螺母与螺片生产业、蓖麻油业、棉籽油业、皮革业、亚麻籽油业和火柴业。

在 19 世纪 90 年代《谢尔曼法案》通过之前，这些行业全部被指控参与了“限制交易”或为了抬价而减产的阴谋。得益于《美国历史统计数据》（*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样的信息源，我们可以很稳妥地总结出这些指责全部子虚乌有。《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之前的十年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 1880 年到 1890 年增长了 24%。美国经济的规模在这十年结束时增长了四分之一，这很难说是“猖獗的”减产和限制贸易的迹象。

相反，那些被指控为垄断的行业，其（调节通货膨胀后的）产量数据在这一期间增加了 175%。换句话说，这些被谢尔曼和其他人

指控为“限制贸易”的行业，其贸易额度**增长**比经济体中其他同样生机勃勃的行业**快了七倍**。在这些行业里，根本不存在所谓“贸易限制”的阴谋或其他手段。这些快速扩张却被滑稽地指控限制贸易的行业包括：钢铁业（258%），煤矿业（153%），钢轨业（142%）和石油业（79%）。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后的十年里，这种趋势也依然在持续：这些“垄断”行业继续以比其他产业更快的速度发展。

在物价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谢尔曼法案》通过前的十年是一个价格通缩的时代，当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 1880 年到 1809 年下跌了 7%。在所谓的“垄断”行业里，物价下跌甚至更快。比如，钢轨的价格在此期间下跌了 53%；精制糖的价格从 1880 年的每磅 9 分钱下跌到了 1890 年的每磅 4.5 分。铅的价格在 1880 到 1890 年期间下跌了 12%；而锌的价格在此期间也下跌了 20%。

总的来说，历史证据表明，根据政府自己对于垄断的标准——限制贸易和哄抬价格——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之前的十年里，美国根本不存在垄断问题。那些不大成功的酸葡萄商业竞争者游说特殊利益团体，唆使政府干预主义威胁阻挠当时美国业界最有活力的公司非凡的生产扩张、新产品创造和降价策略。这正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真实意图。

《谢尔曼法案》的真正意图

《谢尔曼法案》的一个功能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一个更确切的垄断权力源头，即政府自身——特别是由来已久的共和党贸易保护主义高关税——转移开。根据弗兰克·陶希格（Frank Taussig）的《美国关税史》（*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在 1857 年——即将持续 50 多年的共和党霸权开始的前夕——平均关税是 15%。在林肯当政的中期，平均关税接近 50%，在 1913 年采取联邦所得税以前，尽管略有浮动，关税税率一直保持在这个高的贸易保护主义范围。“反垄断的”《谢尔曼法案》并没有提及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会如何限制贸易，尽管至少从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出版《国富论》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会减少贸易就已经是全世界的经济常识了。

在关于《谢尔曼法案》的国会辩论中，谢尔曼本人抱怨道，在前述行业里的增产和减价“托拉斯”们“破坏了被设计来保护……美国工业的关税系统”。想想吧。由于关税的整个意图是“保护”消费者免于低价，所以唯一可以“破坏”贸易保护主义关税系统的是更低的物价。关税对美国工业的“保护”是**免于**竞争。因此，《谢尔曼法案》天生就一直是一部反竞争的法律。

比谢尔曼的话更糟糕的是这一事实：《谢尔曼法案》才被国会通过三个月，谢尔曼就赞助了被记者们称之为“竞选捐助者关税法案”的立法。这就是把平均关税税率从 38％提高到 49.5％的《麦金

莱关税法案》。1890 年 10 月 1 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道，“竞选捐助者关税法案现在正在总统那里等待签署……而受到优待的制造商即将开始享受这项立法——它们中许多企业都参与了影响其产品的【关税】税率的提议和制定。”

这导致原本支持《谢尔曼法案》的《纽约时报》改变了它的立场。在同一篇社论中，《纽约时报》写道：“通过所谓的反托拉斯法是为了欺骗民众，并为制定这部……和关税有关的法律开路。推出这一法案是为了党报可以对关税敲诈和保护联合的反对者说，‘看吧！我们已经攻击托拉斯了。共和党是所有这些圈子的敌人。’”

换句话说，《谢尔曼法案》是一块政治遮羞布，它旨在愚弄民众，让他们相信为了贸易保护主义、中央银行和公司福利而创立的共和党，不知何故已经改变了其存在的根本目的，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亲消费者的组织了。就像《纽约时报》在当时解释的那样，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第四十五章 “自然”垄断的神话

每个上过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大学生都学过：从 20 世纪初开始，所谓的公用事业（电力、供水、天然气等）就已经是政府监管的垄断机构了，因为政府为了让美国人免于自由市场或“自然”垄断的不幸而介入了市场。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些有着巨大固定成本（比如修建一座发电厂的开支）的行业里，一旦工厂建成投产，服务每位顾客的成本将急剧减小。这被叫做“规模经济”。据说这对 20 世纪初的所有公共事业都是成立的。

据说的问题是，一家大公司可能会实现这种低成本（和低价），它就可以把所有其他的竞争者赶出市场，从而变成一种“自然”垄断。这时候，它就会收取垄断性的高价。这种“市场失灵”理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政府介入并故意创造出有牌照的“特许垄断”，从而“为了民众的利益”监管价格，这意味着价格会达到一个非垄断的水平。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从来就没有任何朝着自由市场或“自然”垄断的方向演变。公用事业的垄断都是政府一手创

造出来的，为的是政府自己和它在电力、供水、天然气以及其他行业的盟友的利益。

在《效率、竞争与公共政策》（*Efficiency, Competition, and Public Policy*）一书中，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引用了经济学家伯顿·根林（Burton Gehling）的话：

> 1887 年，纽约市创办了六家电力公司。1907 年，芝加哥有 45 家电力企业可以合法运营。在 1895 年之前，明尼苏达州杜鲁斯由五家电力公司供电，而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在 1906 年有四家……在 19 世纪晚期，竞争在这个国家的燃气业里是很普遍的。在 1884 年以前，有六家相互竞争的公司在纽约市运营……在电话业，竞争也是普遍和格外持久的……在 1905 年，巴尔的摩、芝加哥、克里夫兰、哥伦布、底特律、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费城、匹兹堡、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大城市，都至少有两家电话服务商。

经济学家乔治·T. 布朗（George T. Brown）在 1936 年出版的《巴尔的摩的煤气灯公司》（*The Gas Light Company of Baltimore*）一书中说明了公共事业垄断如何出现的真实故事（与入门经济学教材所说的谣传相反）。这本书研究了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产生公共事业垄断的案例，但它的教训也适用于全美的所有城市。

巴尔的摩煤气灯公司的历史是，从 1816 年创办开始，它就一直在与其他竞争者斗争。除了在市场中竞争，它也在为了拒绝给竞争者发放公司执照而游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当局。或许在业内存在规模经济，但规模经济并没有禁止激烈的竞争。

布朗引用了 1851 年《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宣称“竞争是商业的生命”，该报也称赞了煤气灯行业出现几家新竞争者的新闻。到 1880 年为止，巴尔的摩有三家煤气灯公司，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极为激烈。布朗写道，他们曾在 1888 年试图合并以垄断者的身份运营，但第四名竞争者摧毁了他们的计划，当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威胁到了所有的煤气灯公司”。从此以后，在煤气灯公司与电灯公司之间出现了竞争。

出现垄断完全是因为政府干预。比如，在 1890 年，马里兰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合并后的煤气灯公司向城市缴纳每年一万美元的费用和 3%决议分派的股利，以换取 25 年的垄断特权。”换句话说，公共事业垄断的产生，是政客与公司以倒霉的纳税人和消费者为代价，分发垄断战利品的计划。一些经济学教材已经把这一计划委婉地称作了一种“间接征税”的形式。

消费者支付了垄断价格，得到了糟糕的服务——一切政府经营或政府支持的垄断机构都以此著称。责任由那些“贪婪的企业”来

承担，只要政客们在怪罪它们的同时能让它们维持垄断，它们也乐于背负这个骂名。乔治 • T. 布朗在他的书中总结道，“马里兰州公共事业监管的建立是其他州经历的典型。”

另一位怀疑“自然垄断”论调的经济学家是霍勒斯 • M. 格雷（Horace M. Gray），他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副院长，曾于 1940 年在《土地与公共事业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公共事业概念之死》（The Passing of the Public Utility Concept）的文章。格雷观察到，“在 19 世纪”，一些人相信，在许多行业“授予私人和公司特权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当然了，就是这些个人和公司在散布荒谬的谣言，说他们的特权其实是“公共利益”而非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

这种“公共利益”胡说的支持者也支持专利、直接补贴、保护性关税、把土地划拨给铁路和授予“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权。在这个分发垄断战利品的计划中，全美国数百家公司获得了垄断经营权，就像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马里兰州的那家公司那样。格雷写道，从那时候开始，“公共事业的地位就成了所有想搞垄断的人的避风港，他们觉得仅仅通过私人行动来保证和维持垄断过于困难、过于昂贵，或过于危险。”

格雷有趣地指出，在美国几乎每个想搞垄断的人都声称，不管他涉足了什么企业，都是“公共事业”，因此国家应该授予其垄断

地位。举几个例子，这包括了收音机业、房地产业、乳业、航空业、煤矿业、石油业、以及农业。实际上，“整个《全国复兴法》实验，可以被视为大公司确保其垄断做法得到法律认可的尝试。”格雷在这里指的是这一事实：1933 年的《全国复兴法》，是一次通过在每个制造业都创造政府强制的卡特尔企业，用数千名执行政府价格下限监管的价格代码警察来**提高**物价的尝试。

“主流”经济学家在整场计划中的作用，是为“私人特权和垄断的阴险力量”创建出格雷所说的“混乱的合理化”。直至今日，所有的入门经济学教材仍然在教授这种“混乱的合理化”。

并不是美国的所有城市都参与了“监管”公共事业垄断的分发垄断战利品计划，也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成为了这一计划的辩护者。在《直接公共事业竞争：自然垄断的神话》（*Direct Utility Competition: The Natural Monopoly Myth*）一书中，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家沃特 • J. 普莱姆欧克斯（Walter J. Primeaux）描述了电力行业几十年来的直接竞争。他引用了数百页的统计分析来支持他的论点，普莱姆欧克斯总结道，跟垄断的城市相比，在那些存在直接、面对面竞争的城市（与那些一家公司服务半个城市，另一家服务另一半的市场分割计划相反）里，竞争十分激烈，成本和价格更低，也不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他总结道，自然垄断在各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竞争存在了几十年；价格“战”并没有对公司的生存构

成威胁；消费者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消费者自己也更喜欢竞争而非垄断，这与公共事业管理层的通常看法截然相反。意外吧！

经济学家托马斯·哈兹雷特（Thomas Hazlett）基于对有线电视业的研究所得出结论也是类似的。在 1990 年《法律与经济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里，哈兹雷特用文件证明了，尽管有线电视在当时被定义为一种“自然垄断”，但在 36 个城市里依然允许有线电视业的竞争。相比垄断经营的城市，在这些允许竞争的城市里，价格平均低了 23%，在提供了更多电视频道的同时，顾客服务也更好。

自然垄断的理论是一种经济上的杜撰。霍勒斯·M. 格雷（Horace M. Gray）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正确的：“通过一个令人宽慰的合理化过程，人们得以在总体上反对垄断的同时却赞成一些特定类型的垄断……【并且】由于这些垄断是‘自然’的，而自然是有益的，从所以它们是‘好的’垄断”，而“政府因此证明了建立‘好的’垄断是正当的”。

第四十六章 税收“漏洞”的优点

美国的两大主要党派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减税问题上采取社会主义左派的花言巧语了。按揭利息的降低、州税和地方税的削减以及其他减免，通常都会被诋毁成需要怦然关闭的“漏洞”或者无尽混乱的源头。

几十年来，对于“税收漏洞”每位总统都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比如，布什政府曾在 2004 年宣布，它希望通过取消许多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税务减免来“简化国家的税法”。把这种华盛顿语言翻译一下，“特殊利益集团”意思是指勤劳的纳税人。此外，只要一谈论税制改革，华盛顿的当权者就会将其包含在“税收中性”的话语里。“税收中性”意思是在何种情况下，联邦政府一年年的税收都不能减少一毛钱。公司可能会利润减少或者发生亏损，个体家庭可能会遭受失业和收入降低，但无论如何政府都不应该“遭受”掠夺自劳动阶级的金钱的减少。

所有这些说法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对创造出来的所有收入都拥有“权利”，而“税收漏洞”剥夺了国家对某些收入的“权利”，因此必须被消灭。这事实上就是各种直接税背后的前提。就像弗兰

克·切多罗夫（Frank Chodorov）在他的《所得税：一切罪恶之源》（*The Income Tax: Root of All Evil*）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国家基本上就是在对公民们说："你的收入不仅仅属于你，我们对其也有所有权，并且，我们的所有权高于你的；我们允许你保留一部分，因为我们承认你有需要，而不是有权利；但是，是由我们来决定给你什么。"此外，"你能留给自己的收入数量取决于政府的需要，并且你对此没有发言权。"

切多罗夫写道，在 1913 年正式通过联邦所得税修正案的时候，"对财产的绝对所有权在美国受到了侵害。"并且"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精髓。无论哪种社会主义……其第一原则都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从卡尔·马克思开始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提倡所得税，越多越好。"

学术经济学家们——即便他们中有些人自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为税收政策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智识上的支持。他们提出的最重要论点是，减税会诱使纳税人浪费时间去学习如何从减税中获利，这常常需要雇用税务师和律师。

更糟的是，存在减税将滋生对更多减免的游说。学术经济学家们声称，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是，相比一个简单税制的理想世界，这产生了巨额的"无谓损失"，也被人称为"社会成本"或社会浪

费。花在避税上的所有时间本来都应该花在生产商品和服务上，因此这消耗了国家的经济，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

这种花言巧语在意识形态上是别有用心的，尽管经济学界坚称它在科学上是客观的。其基本前提是政府从人们的收入中拿得太少了，以及“简化”税法并收更多的税更“有效率”。

但是，个人花自己的钱通常会比政府官僚花他们的钱更有效率。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论点的荒谬前提恰恰与事实相反，即通过让政府官僚花更多人们辛苦赚来的收入，可以达到这种“效率”。

人们花在合法避税上的时间，实质上是对他们时间的一种有益投资：这种投资能让他们保留、花掉和存储他们的个人收入。人们依然年复一年地大规模持续进行这种活动，这一事实说明在纳税人的头脑里，这种活动天生就是有效率的。

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行动的逻辑 II》（*The Logic of Action Two*）一书中所指出的，

> 每一种逃避税收和监管的经济活动，都不仅仅是在促进自由和财产权；它也是又一个生产力从剥削性的压制中自由流出的鲜活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欢迎每一种新的税收漏

洞、避税、抵扣或免除，并致力于把它们推广到每个人身上，而非关闭它们……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 1952 年朝圣山学社的会议上响应了这种观点，他说道："那些可敬的绅士们所说的税收漏洞依然存在，让我们感激这一事实吧。托这些税收漏洞的福，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工人们还没有降低到他们的苏联同事们的那种地位和不幸。"

减税的反对者们不止否认私有财产所有权——这正是社会主义者的定义——他们也呼吁平均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二要素。他们抱怨这一事实是"不公平"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从减税中受益了。如果不是人人都受益，就没有人应该受益，这是他们的口头禅。

罗斯巴德也回应了这种论点，称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不应该抱怨所谓的减税的不公平，相反，应该努力看到更多公民能够享受它们。罗斯巴德也准确描述了"主流"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谬误，他们称如果减税只针对一些行业而非全部，那么，相比在一个不存在减税的真正自由市场里的情况，这些政策将导致这些受益的行业使用更多资源。

罗斯巴德称，“主流”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要点。他问道：“如果禁止对投资、能源和其他方面的【税收】抵免和减免，替代选项是什么呢，资源不会自动流入生产力更高的行业；相反，它们会通过更高的税流向政府”并且“会被简单地浪费掉，扔进那些生产力低下且挥霍无度的政府开销无底洞中。”

“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彻底忽视这一论点，他们甚至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经常忽视政府预算的整个花销方面。这使得他们可以假装“科学”和“客观”，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

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他支持任何时间、任何原因的任何形式的减税。在这个问题上，弗里德曼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与罗斯巴德和米塞斯所持的观点是一样的。

第四十七章 宏观经济学家探索经济学并再次拆穿罗斯福新政的面具

把自己视为经济学界精英的宏观经济建模者们花了数十年时间，终于发现了入门级经济学原理，并以此发现最终拆穿了罗斯福新政的面具。（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亨利·黑兹利特这样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就认识到了新政的真面目：它让大萧条变得更为严重、更加持久。）

学界中的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在 2004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里刊载了经济学界精英的新发现。这篇题为《新政政策和大萧条的持续：一次一般均衡分析》（“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的文章的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哈诺德·L. 科尔（Harold L. Cole）和李·E. 欧翰南（Lee E. Ohanian）。他们写道，“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 1933 年大萧条低谷期比趋势低 39%，在 1939 年仍然比趋势低 27%。”并且“类似地，个人工作时间在 1933 年低于趋势 27%，在 1939 年仍低于趋势 21%。”换句话来讲，新政

和终结大萧条连边都不沾，这跟几代人以来教给美国公立学校每个学生的政府宣传相反。

科尔和欧翰南——以及宏观经济建模派的其他人——似乎对这一认识感到惊讶（如果不是震惊的话）。但对任何研究过大萧条真相（而非研究经济衰退数学模型）的人而言，这并不会令人惊讶。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经过罗斯福政权七年的“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资本主义”，1939 年的官方失业率依然处于 17.2%的水平。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39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1929 年的还低（847 美元对 857 美元），个人总消费开支也是如此（676 亿美元对 789 亿美元）。此外，从 1930 年到 1940 年，净私营企业投资**减少**了 31 亿美元。

因为“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是如此的令人迷惑和毫无意义，连经济学界精英都对自己发现新政真相的姗姗来迟感到不知所措。在罗斯福当政期间，从大萧条中的恢复是“非常疲软的”的（一次轻描淡写），科尔和欧翰南把这一事实标为“令人震惊”。这对他们来说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这些数据与新古典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消磨在了一篇又一篇的期刊论文上，这些论文根据的却是想象出来的数学“模型”，常常跟经济事实毫无关系。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数十年并从他们在经济学界里的物理学嫉妒者同事们那里收到无数奖项和

荣誉之后，他们终于走出去观察外面的世界，试图发现一些关于经济世界的事实。看吧，他们终于发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知道了 70 年之久的东西——新政的干涉主义让大萧条**更糟糕**了。

对科尔和欧翰南来说，“新古典”的大萧条理论毋庸置疑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在发现这一点之后表现出了震惊。这种理论用的英语也绝对是搞笑版的。它可以被想象成一种弗兰肯斯坦怪物版的萧条理论。就像科尔和欧翰南所解释的那样，“【从大萧条中的】缓慢复苏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导致了 1929 年到 1933 年经济下滑的各种负冲击——包括货币冲击，生产力冲击和银行业冲击——都在 1933 年后变成了正面。”因此，根据“新古典”理论，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就有点像一个亲国家的弗兰肯斯坦怪物，而经济学家们扮演的则是疯狂科学家的角色，推荐由政府赤字开支的爆发来“电击”怪兽，让它重获新生。如果通过电击不能让怪物重获新生，或许可以通过对其注射血清来达到这个目的。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建模者们的话来说，“注射”政府开支和廉价信贷这样的动作或许可以让经济“强劲”反弹。

两位作者写道，“从 1939 年到 1933 年，货币基数的增长超过了 100%”，为这种“货币冲击”应该能让经济恢复常态提供了理由。他们援引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伦纳德·拉宾（Leonard Rapping）的权威，这两个人曾宣称“正面

的货币冲击将产生强劲的复苏，就业率在 1936 年之前回到其正常水平。”但是，事情当然并非如此。

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是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经济中的泡沫，这个泡沫最终破裂，造成了大萧条。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允许清算那些过度资本化的企业，削减税收和开支，并且去除监管。相反，美联储创造另一个泡沫未果，却增加了 100%的货币供应，同时总统和国会实施了一系列政府干预主义政策。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用政府干预主义而非政府缩减开支来应对经济衰退，而结果是一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大萧条——史上最糟。

据说，科尔和欧翰南决定，他们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科生教授的课程不仅是无用的建模练习，而是可以被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经济事件的东西。他们特别回忆了初级微观经济学讲到，卡特尔是通过集体同意限制市场上的供给，试图人为抬高物价一帮企业。他们也意识到，奥地利学派早在 1933 年新政伊始就明白，“第一次新政”（1933-1935）是一次用政府施加的产量限制和高于自由市场水平的固定价格，将所有制造业和农业卡特尔化的企图。

他们写道，“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是缓慢复苏背后的关键因素，它对实际产量和趋势产量之间 60%的差距负有责任。”把这种经济学术语翻译一下，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对经济体中的商品和服务

实施限制，经济体中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雇员将变少。因此，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导致了比本来应该的水平**更高**的失业率。“主流”经济学界用了七十多年的时间才得出这个简单的认识，这实在令人惊讶。

相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传统是在经济学、历史、哲学和其他学科进行广泛阅读），经济学界“主流”的心胸狭窄得令人难以置信，典型的学术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一个琐碎的数学建模练习的一些琐碎的方面。他的经济学“知识”往往只是其琐碎专业领域内顶级期刊近几年的文章。他很少（如果有的话）读完一整本书，更不用说写一本了。关于科尔和欧翰南的发现，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他们甚至没有引用该主题的开创性研究，即理查德·维达和洛威尔·加勒威在 1993 年首次出版的《失业：20 世纪美国的失业与政府》（*Out of Work: Unemployment and Govern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一书。维达和加勒威与科尔和欧翰南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维达和加勒威的细节要丰富得多，并且，他们的方法要有根据得多。他们估计，由于新政的干涉主义，到 1940 年为止实际失业率比应有的水平高了 8%，并总结道，“受新政项目的影响，大萧条变得更加持久、更加严重。”除了第一次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维达和加勒威还解释了在最低工资法、允许工会的法律和为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而收的工资税的作用下，“第二次新政”是如何导致劳工对雇主来说变得昂贵得多的。由于需求法则永远都不会作废，

显然强迫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政府政策将导致就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因为它使得生产力不够高的劳动力无法就业。科尔和欧翰南对维达和加勒威的书避而不谈，往好了说是治学疏忽，往坏了说是丑闻一桩。

科尔和欧翰南得出的结论在本质上与维达和加勒威的相同，却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用晦涩的语言而非《失业》那样用平实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结论。他们总结道，

> 新政的劳工与产业政策并未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相反，提高劳工议价能力以及把合谋和支付高工资相联系的联合政策，通过制造寻租和显著提高工资并限制就业的无效率内-外摩擦，阻止了经济的正常复苏……废除这些政策的时候，正好出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强劲经济复苏。

最后一句话也是另一位受奥地利学派启发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希格斯的研究主题，科尔和欧翰南同样忽视了罗伯特·希格斯。至少，经济学界“主流”终于开始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政府干预主义导致了大萧条，而战后的资本主义治愈了它。

第四十八章 社会主义会让你更快乐吗？“幸福研究”的特诺伊木马

现在，没有一个在思考的人还会相信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主义能做摧毁繁荣之外的事，全世界的极权主义者都在改变他们的论调，声称繁荣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多幸福。并且，他们认为，政府可以使我们变得非常非常幸福。因此，他们宣称，不应该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会限制我们的幸福。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左派学者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受联合国委托在 2012 年编辑的《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的主题。这份报告指出，弹丸小国不丹是第一个采用“国民幸福总值”指数（1972 年）的国家。联合国似乎认为，政府的**国家**着装规定[43]和针对非本地出生不丹居民的制度化就业歧视，是让不丹人格外幸福的原因。联合国的报告也认为希腊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即便在这份报告发布的时候，希腊政府已经破产并且在雅典的街道上有暴乱发生。

[43] 必须穿戴传统服饰。——译者注

在这个所谓的“幸福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文献，并且，这些研究被用作了回归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依据。这些研究基于一些早已被经济学界当成胡说八道抛弃掉的臆断。这些臆断是：“效用”或者一个人对福利的感知是“基数的”或者是可测量的；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以及得出一个客观、可测量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幸福指数”是可能的。

人们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在组织生产和经济活动上优于资本主义这个论点，但一些研究“幸福”的人现在宣称，富裕实际上是一种“疾病”，它导致社会中产生大量的不快乐。关于这一主题甚至出现了名为《富贵病》的伪科学著作。

对所谓幸福研究者有能力最终衡量效用的断言忽略了为什么效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的，并且是不可衡量的理由，而经济学界已经接受这些理由几十年了。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一篇名为《重建效用与福利经济学》（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Utility and Welfare Economics）的文章中所写的：

> 表现偏好的概念就是这样：实际选择显示（或表现）一个人的偏好；即他的偏好是能根据他在行动中的选择推断出来的。因此，如果一个人选择在音乐会而不是电影上花一个小时，那我们推断他更喜欢前者，或在他的价值排序上前者排

> 名更靠前。……这个植根于真实选择的偏好概念，构成了经济分析（特别是效用和福利分析）的逻辑结构的基石。

罗斯巴德进一步解释了依赖民意调查的愚蠢，这与经济决策者的实际表现偏好截然相反，他说道：

> 一个最荒谬的方法基于一个恒定性假设【即人们不会改变他们的偏好】，试图不通过观察实际行为，而是通过调查问卷得出消费者的偏好表。**在真空中**，一些消费者被详细问到相对于其他抽象组的商品，他们会偏好哪个抽象组的商品，等等。这不仅犯了恒定性错误，而且当人们不是面对实际选择时，对他们的简单提问也就不可信。不仅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在他实际选择时和他在谈论时会有所不同，而且也无法保证他说的是实话。

“幸福”的研究者也不太可能对他们的问卷受访者进行测谎（不是说测谎就 100%正确）。

苏黎世大学教授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是堪称幸福研究领域领袖的经济学家。在 2008 年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笔者曾问他如何看待用问卷调查来替换真实表现偏好这个由来已久的批评，他的回答是他的数据“不会比 GDP 数据差”。换句话讲，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许多幸福研究的数据比 GDP 数据差多了。

经济学领域之外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弗雷并非其中之一）在他们的幸福研究上甚至走得更远。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写了一本欧洲畅销书，题目是《精神水平：为什么平等对所有人都有益》（*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这本书是这两位英国流行病学家滥用统计数据的一个绝佳范例。之所以说它滥用统计数据，是因为整本书是对一国物质不均程度和许多其他变量之间简单关联的调查。作者甚至没有尝试多元回归分析；相反，他们展示人为的统计相关性，暗示（很可能是由于欧洲福利国家更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所导致的）物质更加平均会让社区生活、精神健康、药物使用、身体健康、肥胖率、智力、未成年怀孕、垃圾回收、暴力、入狱、社会流动、社会功能失调、焦虑和自尊问题得到改善。一份对该研究的批评通过发表一份图表嘲笑了这种"如果你拷问数据足够久，它会招供"的方法论，这份图表展示了废物利用率和自杀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出结论一个人废物利用越多，他就越可能自杀。

根据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研究"，20 世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莫过于苏维埃帝国（包括所有战后东欧和中欧各个共产主义卫星国）的公民，因为"平等"是一切形式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就像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评论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永远都是平均主义；只有手段随着时间变化，从政府对

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变成了通过福利国家和“累进”所得税进行收入再分配。

这些幸福的研究者从来没有丝毫提及过福利国家所产生的证据充分的病症，比如工作伦理的毁灭，家庭破碎和减少劳动人口的福利国家所导致的紊乱加剧等。

布鲁诺·弗雷并不被视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在 2002 年发表在《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一篇标题为《经济学家们能从幸福研究中得知什么》（与阿洛伊斯·施图泽合著）的关于幸福研究的调查文章中，弗雷和阿洛伊斯·施图泽在为他们眼中社会福利函数观念的复活而欢欣鼓舞。在文章中他们写道，“看起来，迄今为止还缺少经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最终重获新生。”他们引用的“研究”声称，尽管在二战之后收入出现了显著增长，但“幸福”却并未增加。他们的暗示是这样一个荒谬的想法：工作、储蓄、投资和企业家精神这些经济繁荣的要素并不生产幸福，人们却为了在这些任务上取得成功而日复一日地不懈努力。

社会主义者经常拥护社会福利函数和人际效用可比较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劫富济贫（自己留一点“管理费”）的话，那么“社会福利”应该得到提升。这应该是出于边际递减效应的经济法则。一个富人有很多钱，因此，他会赋予刚挣到的一块

美元相对较低的边际（或额外）价值。另一方面，一个穷人没有很多钱，他对拥有另一美元有着较高的边际价值。因此，这种论点称，（合法）抢劫富人一美元或许会导致其损失比如说一“单位”（util）[44]效用，但把这一块钱给一个穷人或许会让他的效用增加十个单位。最终结果是九个单位的净收益，或者说“社会福利”的增加。经济学界早已抛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胡说，但弗雷和施图泽看起来却对复活伪装成“幸福函数”的社会福利函数观念感到兴奋。

弗雷和施图泽引用的这篇研究“幸福”的文献还有另一个荒谬的结论，即更富的人会对更穷的人施加负的外部效应，而非相反。这种所谓的“负的外部效应”便是穷人的嫉妒。但是，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而非穷人是平均主义的首要倡导者。大部分穷人都想变得更富。是知识阶级常常着迷于嫉妒和憎恨那些在财务上比他们更成功的人。他们可以操纵调查问题让平均主义看起来来自“穷人”而不是他们自己，但这并不会让以上说法失效。

此外，事实上福利寄生虫们才对他们更努力工作、更有生产力、纳税更多的寄主们——那些被国家以福利国家主义之名掠夺的人——有着真真切切的负面效应。

[44] 作者在此特意把单位 util 加上引号，是为了提醒我们效用是无法衡量的，所以它也不应该有单位。——译者注

弗雷和施图泽也宣称，幸福研究也可能会巩固凯恩斯主义的中央计划。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涨”或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增加时，经济学界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者们从未基于任何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对此作出解释。陈旧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45]模型——人们用它来论证政府开支可以以更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购买”低失业率——已死。

弗雷和施图泽看起来对基于幸福研究复活菲利普斯曲线中央计划机制的前景感到非常激动。他们写道，“如果失业率提高 5%，就必须降低 8.5%的通货膨胀来保持民众感到同等的满足。”这种说法中的错误假设是，政府终究可以通过某种按钮来改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

幸福研究也告诉我们，“应该增加补偿给大家庭的福利费”，他们写道，“以便维持家庭的主观幸福。”他们又一次没有提到福利国家主义对工作伦理、家庭、自尊等方面极为负面的影响。他们也没有提到对被掠夺的纳税阶级的幸福的影响，这些人必须缴纳更高的税来为更庞大的福利国家提供资金。对幸福研究者来说，富裕是一种疾病，所以“社会”越不富裕就越健康。

[45] 一种表示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之间相互关系的曲线。——译者注

弗雷和施图泽还把工作积极性、储蓄、投资和企业家精神称为“社会浪费”——如果它们只能导致一些人变得比另外一些人更成功的话。他们写道，“作为这些竞赛的赢家，高收入者应该缴纳更高的税。”他们总结道，“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并不是提高所有人的幸福，”但提高一个人“相对其他人的收入可以提高他的幸福。”毫不奇怪，弗雷和施图泽也认为，可以把终身社会主义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视为幸福研究“之父”。

许多听起来像伪科学的幸福研究结论都是极为头脑简单和滑稽透顶的。让我们看看弗雷和施图泽文章中的一些例子：

- “收入更高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得到他们想要的。”
- “英国的彩票中奖者……据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精神上更幸福。”
- “相比收入水平，主观的满足程度更为重要。”没人对此有争议。
- “平均来说，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比那些生活在穷国的人更幸福。”因此，我们应该对富国征税并把钱转给穷国的政府，任何一个幸福研究者都会这么总结。
- “失业者的幸福感比有工作的人的低得多。”
- “经历失业让人非常不愉快。”

- “自由与快乐是正向相关的。”
- “幸福的人在社交中笑得更多。”
- “得到一笔遗产的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精神上更幸福。”
  震惊。
- “收入更高的人……可以购买更多物质上的商品和服务。”
  震惊。

克里斯托弗·斯诺顿（Christopher Snowdon）在《精神上的妄想：对左派万物新理论的真相核查》（*The Spirit Level Delusion: Fact-Checking the Left's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一书中对幸福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批判。他总结道：

>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未能提供和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的同等的生活标准和自由，它的辩护者制造了无数的借口。近来，极少有人能厚颜无耻地声称生活水平降低和自由缩减是想要的结果，更不用说人们在更低的生活水平和更少的自由时更幸福。在此意义上，《精神》这样的书代表的是和左派的决裂。限制选择、减少财富和降低欲望现在居然被他们作为值得追求的目的公开提倡了。

因此，“幸福研究”是劝说公众贫困和国家奴役优于繁荣和自由的运动的一部分。它是20世纪共产主义者在极权共产主义垂死之际所说的“有笑容的社会主义”的全新版本。

第四十九章 “信息不对称”的谣言是市场失灵之源

关于“市场失灵”的绝大多数文献不过是在罗列成千上万个涅槃谬误（Nirvana Fallacy）的实例——把真实世界的市场比作一个无法达到的乌托邦理想（完全竞争），从而指责市场不符合乌托邦或者涅槃——的实例。在“证明”了市场“失灵”之后，分析家接着在政府不会犯这些错误的**假设**之上主张政府干预。市场或许不完美，但政府却被假定为是完美的。尽管有了公共选择“革命”及其对政府失灵经济学的强调，这种分析方法仍然十分普遍。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早已理解，这种分析方法由于多种原因而具有深刻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个完全竞争/完全信息机制简单地忽略了大多数或所有的实际市场过程。在完全竞争中不存在竞争，正如哈耶克在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有了完全信息的假设，真实世界中竞争的所有特征，诸如广告、创新和减价，都被排除在外了。

关于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刻缺陷，一个尤为臭名昭著的例子是首先由经济学家布鲁斯·阿克劳夫（Bruce Akerloff）所提出的信息不对称概念。由于卖家通常比买家有更多关于待售产品和服务的信息，该理论便宣称卖家可以通过销售“劣货”来轻易欺骗消费者。这个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它正好把经济世界搞反了：信息不对称实质上是“分工劳动”——贸易与交换和市场**有效**的整个基础——的另一种说法。

在《人的行动》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恰当地将劳动分工（和总体上的人类合作）称之为“基本之社会现象”。米塞斯写道，由于这样几个基本事实，个体之间的合作比“自给自足的个体”更有生产力、更有效率：所有人类在他们工作能力上的先天差异；“地球上由自然界所赐予的非人力之生产机会”的分布不均；以及几乎所有生产流程都需要某种靠单个人无法完成的团队合作这一事实。

在描述在市场过程中分工劳动和专业化的演化时，米塞斯进一步描写了它是如何“强化人先天的不平等”的，因为“特定工种的训练和实践，使人调整至更适合他们的职业的要求；人们天生的才能，有的得到发展，有的则受到抑制。……人们变成了专家。”对米塞斯而言，分工劳动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罢了。“人类之所以

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他能够洞见分工合作的利益，”离开分工合作的利益，普通人就会活得像“原始的野蛮人”。

米塞斯在机器时代写下了这一切，那时候“分工劳动”这种话是恰当的。体力作为生产中的主要人力投入，还没有像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这样被脑力所日益取代。哈耶克的一生也几乎处于机器时代，但他预见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并且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研究和写作上。因此，对于哈耶克——以及今天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所有人——“知识分工”这个词可能会比“劳动分工”更准确。就像哈耶克自己在其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解释的那样：

> 我们只需牢记：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在接受完理论培训之后，我们都必须学习许多其他的东西；学习和掌握各种特定工作的知识，实际上耗用了我们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各行各业中，有关人的知识、有关当地环境的知识、有关特定情势的只是，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一个几乎只知道稍纵即逝的机会的地产掮客，或者一个从商品价格在不同地方的差价中获利的套利人，都是以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其他人并不知道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特殊知识为基础而在社会中发挥极大作用的。

问一下自己这些问题：谁更懂修房子——修房子的人还是买房子的人？谁更懂供应鲜肉给杂货店——牧场主和农民还是普通消费者？谁更懂汽车的生产——汽车生产商雇用的汽车工程师还是买车的人？谁更懂生产和营销服装——服装生产商和分销商还是买衣服的人？

这些反问的要点在于，由于社会中知识（和劳动）的分工，在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关于一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信息都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在上面各项职责中都有着对称的信息，上述企业和职业就都将不复存在了。每个人都拥有对称的信息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的。改一下米塞斯的话，区别人和动物的，是在社会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知识分工的条件下进行合作的优势的洞察。

实际上，米塞斯批评过信息不对称是所谓市场缺陷的说法，尽管他的原话并不是这样。“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内，即每个行动者都能够以同等程度的洞见，准确地认识市场情况”，他写道，“那么价格的随机调整就可以一蹴而就。但除非存在一个超人力量的介入和襄助，这种审时度势能力的一致性是无法想象的。”米塞斯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人都从天使那里知道了已经发生了的市场情况”。此外，即便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拥有相同的数据和信息，他们也必然“对其有不同的评价”。

事实上，信息上的差异——以及每个人对信息的含义和重要性的不同解读——是贸易和交换的唯一原因。贸易和交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不同个体对同样的商品（或服务）有着不同的评价。这些不同的主观评估源于买家和卖家的头脑里信息的差异——换句话说，源于信息不对称。

和大多数其他“市场失灵”模型一样，信息不对称和劣货模型刻意忽视了真实世界的市场。甚至阿克罗夫被广泛引用的“劣货”论证——因为消费者不信任二手车贩子，所以二手车市场会最终消失——也是大错特错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忽略了真实世界中二手车市场里产品保修的存在。阿克罗夫宣称，二手车市场将逐步被质量越来越低的车占据（如果市场没有完全消失的话），因为二手车销售员可以轻易地把“劣货”卖给不了解情况的买家们。但是，即便在阿克罗夫首次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20 世纪 70 年代），30 天的担保在美国二手车市场上也已经是非常标准的做法了。30 天的时间足以让消费者决定一辆车是否是一辆“劣货”了。实际上，今天像极车（CarMax）这样的公司已经对售出的所有二手车提供七天无条件退货的政策，从而根除了劣货问题的可能性。在阿克罗夫（和其他经济学界主流）发现“劣货问题”的时候，自由市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受阿克罗夫启发的信息不对称文献同样忽略了竞争的动态本质的影响。如果一个二手车贩子落得了不诚实的名声，他就为竞争对手创造了盈利机会。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更诚实的二手车贩子会从不诚实的那里赢得市场份额，这与阿克罗夫所预测的结果恰恰相反。对任何企业而言，品牌名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或许是最有价值的资产——但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文献却忽视或低估了这一点。竞争不会消除不诚实的行为，但它会惩罚不诚实的行为，同时奖励在做生意时诚实的行为。此外，口碑、像《消费者报告》这样的各种出版物以及无数的在线信息来源，都让消费者更容易了解今天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的卖家。

真正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不过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与劳动分工的另一种说法。当潜在的问题出现，比如二手车贩子一方在信息上的优势，市场竞争会如上文所说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政府那里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政府那里信息不对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是一个确立已久的事实，即作为选民，人们倾向于对政府的几乎所有作为都“理性的无知”。实际上，政府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在一个像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里，没有人可以理解其政府行为的 1%。因此，特殊利益集团主导了所有民主政府；政府开支、税收、借款和监管权力基本上不受限制；并且

寻租横行。近年来，这一切的结果是史无前例的预算赤字，甚至是整个政府——从加州到希腊——面临破产。

外交政策是政府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例子：可能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战争的所有谈判、讨论和战略会议，都总是由政府行政机构的少数几个人在对所有公民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公民因此必须依赖政府发言人所给的任何信息来分析导致战争的原因。比如，整个世界现在知道了，美国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所给出的原因——萨达姆•侯赛因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企图用其来攻击美国——是错误的。与世界上最不诚实的二手车贩子相比，理性的无知毫无限制地给了政客更大的撒谎空间。

在市场中，不诚信的商人很快就会遭到损失生意或破产的惩罚。（除了失去顾客以外，供应商们也会放弃与这些不诚信的企业来往。）在政府这里情况却恰恰相反。罢免一位不诚实的国会议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美国国会是如此地弄虚作假，在职者授予了自己如此的垄断优势（许多工作人员基本上是纳税人的钱支撑的永久竞选人员；免费邮寄的特权；许多小组委员会被用来发放政治拨款开销，等等），以至于在美国，再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比率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平均超过 90%。[46]

[46] www.opensecrets.org/bigpicgture/reelect.php

即便上述说法并不正确，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任期两年；参议员任期六年；总统任职四年。相反，如果消费者觉得一家公司的广告是骗人的，他可以立即更换别的产品。真正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一个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

第五十章 美国真正的伦理问题

根据一种可疑的主张，即大萧条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贪婪（好像贪婪并不是一直存在一样）造成的，美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行业：在大学里教授“商业伦理”。然而，这种课程就像在让泰格•伍兹[47]来指导婚姻忠诚，或者让杰弗里•丹墨（Jeffrey Dahmer）[48]来教授高级餐饮。

尽管有一些例外，但商业伦理课程倾向于在商业世界中挑选出几个孤立的不道德行为案例，并暗示这样的行为是**所有**商业中**与生俱来**的。这忽视了市场如何运作的真相，误导了学生。不诚实的商人会受到财务上的惩罚，因为顾客会倒向他们的竞争者，而供应商会拒绝和他们做生意。而在一些渎职的情况下，比如石油泄漏，首席执行官通常会失业，公司遭到起诉，公司的股价暴跌。这些市场反馈机制并不保证道德的行为，但它们会用顾客的忠诚——和利润——来奖励道德的行为。政府中却不存在这种反馈机制——但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多得多的伦理问题。

[47] 美国著名高尔夫球运动员，其出轨事件轰动全球。——译者注
[48] 美国著名食人连环杀手。——译者注

商业伦理课程通常会把反商业的说教和提倡政府对商业施加更多监管以及随后对社会的进一步政治化结合在一起。这样做他们实际上在**鼓励**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天生**不道德的是政治，而不是市场。开国元勋们深谙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需要“用宪法的锁链捆住”政府。对詹姆斯·麦迪逊而言，需要宪法来“抑制派别的暴力”。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乔治·华盛顿警告了那些想主导政治的“狡猾、富有野心且毫无原则的人”。托马斯·潘恩则将政府视为顶多是“必要之恶”。

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呢？好吧，他们明白，当政府运用其合法的垄断来强迫没收一个人的财产并将其交给另一个人，这就是一种通常称之为“盗窃”的行为。把这种不道德的行动叫做“民主”、“多数决”或者“累进税”并不能将其变得道德。在民主制度下，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没收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收入，并将其再分配给各种支持者。政府自己也从这些没收的财产中获利甚丰。根据美国劳动部的数据，今天普通联邦官僚的工资和福利是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行的两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僚则是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行的一倍半。

为了给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政客必须承诺从那些赚钱的人那里偷钱（即收税）并将其交给那些在法律或道德上对其并没有权利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政客们必须做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遵守的承

诺（即撒谎）。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没有有道德的人被选上政治职务。最成功的政客都是那些最不受道德原则束缚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特权和收入，他们对没收他人财产最没有顾虑。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 F.A. 哈耶克在其 1944 年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中，在名为“为什么最坏的上台了”的一章中描述了这个现象。

成功的政客因为膨胀的自我形象、被放大的重要感和被误导的攻击性而倾向于极端自负。之所以是被误导的，是因为它并不像在市场竞争中那样受服务民众的引导，而是受服务**他们自己**的引导。这简直是七宗罪的展示：**傲慢**战胜了谦卑；**嫉妒**毒害了每个从事“收入再分配”的人的内心；**愤怒**是一个人反对当权精英时会经历的东西；**懒惰**长期和政府官僚联系在一起；对控制他人的**贪婪**是政治的化身；华盛顿当权派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显而易见的财富常常展示出**贪食**；因为桃色事件比尔·克林顿遭到弹劾和努特·金里奇辞去白宫发言人职务，再一次证明华盛顿当权派的领袖并没有和七宗罪之**色欲**绝缘。（他们更大的罪是控制其他人——和其他政府——的欲望。）

总之，各个大学帮了倒忙，它们相对忽略了美国的真正伦理问题——社会的政治化和政府的膨胀——同时大大夸大私营企业的伦理问题。

第五十一章 政府创造就业的神话

数百万美国人在“大萧条”的几年里处于失业状态，因为我们的政客们坚持着一个危险的神话——政府可以创造就业的神话。政府开支不能创造净就业；它只能为了创造政府职位而摧毁私营部门的就业。为了给政府创造就业提供资金而进行的税收、政府债务或者美联储的通胀性货币创造，压制了私营部门，并为了给政府职位提供资金摧毁了私营部门的岗位创造。这是抢劫彼得来付给保罗。

政客们坚持着这个政府创造就业的神话，因为普通选民可以看到创造出来的政府职位，却看不到被摧毁（或是从未被创造出来）的私营部门的岗位。另外，政府的间接成本经常高的离谱，为了给一个三万五千美元年薪的政府职位提供资金，要从私营部门榨取十万美元。因此，为了创造一个政治恩惠式的职位，政府摧毁了好几个私营部门的岗位。

政客发钱给民众来换取他们的选票是非法的，但是，政客安排选民得到政府薪水来换取他们的选票却不是非法的。在一个政客的眼里，每个政府职位都值好几张选票，因为该雇员的配偶、成年子女和亲属都肯定会投票给那个分发工作的政客。当一个政客吹嘘称

一个项目“创造了二十万个（政府）职位”时，他真正想的是这个项目或许在竞选期间制造了五十万张**选票**。

总的来说，政府开支**从未**降低过失业率；恰恰相反——它总是在**提高**失业率，因为它挤出了许多私营部门的就业制造。1929 年，赫伯特·胡佛总统把 13%的联邦预算划给了“紧急”公共事务开支。按预算的百分比来算，这是奥巴马政府“刺激性”开支的两倍。但这只是在让事情变得更糟。

即便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新政花了不少钱，包括在政府职位上雇用了大概一千万人，官方失业率在 1940 年（二战前夕）仍然是 15.7%。这是 1929 年大萧条伊始时 2.9%失业率的五倍多。二战期间政府开支的爆炸性增长也没有导致失业的消失。在 1940 年，美国依然有 550 万人失业。到 1943 年有 800 多万人被征入军队，在此之后还有 200 万人入伍。是征兵令，而非战争的“刺激”，在战争年代终结了失业。

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总是会创造经济繁荣并刺激制造就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邦预算从 1945 年的 984 亿美元降低到 1948 年的 330 亿美元，同时约一千万人从军队退役。这创造了战后的经济繁荣。由于这种政府开支的大幅削减，国内生产总值的私人部分——包括个人消费和投资花销——在 1946 年增长了 30%，为美

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增长。战时价格监管的终结和商业税的削减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政府的“刺激性”开支从来都只是一次大型的贿选计划。美国参议院竞选开支委员会在 1938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许多州，公共事业振兴署的职位对就职人的入职条件是注册为民主党员，宣誓投票给民主党，甚至将其工资的 2%捐赠给罗斯福的连任竞选。共和党多年来无疑也在玩同样的把戏。

在《新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Deal*）一书中，经济学家威廉·舒格特（William Shughart）和吉姆·库奇（Jim Couch）对新政的开支模式进行了统计学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开支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该开支有多大可能让罗斯福连任。因此，相比那些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连任的有着“大城市机器、有组织劳工和其他选民”的地区，美国最穷的地方（坚定的民主党南方）得到的援助相对较少。经济复苏的方案正好与大多数政府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所做的相反，应该遵循哈里·杜鲁门的例子，大幅削减政府的规模和范围。

第五十二章 男女“工资差距”的神话

在挣钱能力上，婚姻对男女双方的影响是不同的。虽然存在一些个例，但总的来说，由于要抚养小孩和做（大多数男人都会推卸的）其他家务，妇女更可能退出劳动一段时间。因此，女性在人力资本积累、生产力和**工资**上落后于男同事。这一点（而远非歧视）才是导致男性工资**平均**超过女性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的《为什么男人挣得更多：工资差距背后触目惊心的真相——以及女人对此能做什么》（*Why Men Earn More: The Startling Truth Behind the Pay Gap—And What Women Can Do About It*）和詹姆斯·T. 本内特（James T. Bennett）教授的《美国女权主义政治学：当代社会的性别冲突》（*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Feminism: Gender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两本书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沃伦·法雷尔曾三次当选全国女性组织纽约市分会的董事会成员。法雷尔的书的前言作者卡伦·德克劳（Karen DeCrow）是全国女性组织的前任主席，她曾是一名就业歧视律师。她声称，“男性并没有参与压低女性工资的恶毒阴谋。”

在《美国女权主义政治学》一书中，本内特教授列举了超过 20 条男人比女人挣得更多的原因，在《为什么男人挣得更多》一书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讨论与描述。逐渐地，他们为解释“工资差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本内特和法雷尔都不相信性别导致的工资歧视完全不存在。工资差距也并不局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根据对许多统计数据的**概括**，工资差异的原因是：

- 探索技术和自然科学的男性比女性多。
- 相比女性，男性更可能从事有害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收入高于更轻松、更安全的工作。
- 男性更愿意在恶劣的天气环境下工作，并会因此得到补偿（用经济学的话说是“补偿性差异”）
- 男性倾向于从事压力更大的工作，这些工作并不是“朝九晚五的”。
- 相比更高的工资，许多女性更重视工作中的个人成就感。（比如，育儿师）
- 一般来说，男性能承受比女性更大的风险。而更高的风险导致更高的报酬。
- 最糟糕的工作时间报酬也更高，而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在这些时间工作。
- 危险的职业（挖煤）薪水更高，也更加受男性主导。
-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升级”他们的工作资格。

- 男性更倾向于工作更长时间，而每周 40 小时之后的每小时都会让工资差距变大。
- 女性更容易在职业生涯中产生“间隔”，主要是因为养育小孩和照顾小孩。经验越少就意味着薪水越低。
- 女性出于“家庭原因”离职的几率是男性的九倍。资历更浅意味着薪水更低。
- 男性每年的工作周数多于女性。
- 男性的旷工率是女性的一半。
- 男性更愿意接受通勤距离很长的工作。
- 男性更愿意为了更高薪水的工作搬到不喜欢的地点。
- 男性更愿意从事要求经常出差的工作。
- 在企业界，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像金融和销售这样的工资较高的领域，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像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这样的工资较低的领域。
- 当男性与女性职位相同时，男性的责任倾向于更大。
- 男性更倾向于按佣金工作；女性更倾向于寻求工作上的安全感。前者有更赚钱的潜力。
- 相比男性，女性更看重灵活性、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和是否有时间陪伴孩子和家庭。

法雷尔对女性的一条建议是，如果她们真的想挣更多的钱，她们应更注意高薪的这些决定因素，而不是参与那些妖魔化男性雇员

却对她们毫无帮助的“同工同酬立法”或“多元化培训”这样的唐吉坷德式抗争。这是一条一流经济学家会提供的实践建议，但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建议却常常被政治正确的私刑暴徒淹没，这些暴徒就像本内特教授说女权学家的那样：“发现简单地诽谤那些指出工资差距的虚幻本质要简单得多。”

作者把本书视为一本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文集——一本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现实研究的集合。

——托马斯·J. 迪洛伦佐

